张伯驹这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难以忘记。

清灵 · 高远 · 孤寂 · 不染凡尘

生是长穹一抹风

民国公子张伯驹

王忠和 荣进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历名山大川，对金樽檀板，满路花绿野堂，旧雨春风，骏马貂裘，法书宝绘，渺渺浮生，尽烟云变幻，逐鹿千年何足道，俊才老词人，浊世佳公子。

认清冰洁玉，证絮果兰因，粘天草红豆树，离肠望眼，灵旗梦雨，泪帕啼笺，绵绵长恨，留秋碧传奇，求凰一曲，最堪怜，还愿为鹣鲽，不羡作神仙。

——张伯驹自挽



ISBN 978-7-216-065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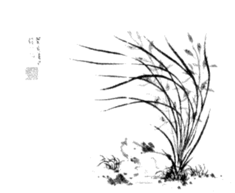
9 787216 065849 >

定价:27.00元

生是长穹一抹风

民国公子张伯驹

王忠和 荣进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是长穹一抹风:民国公子张伯驹/王忠和,荣进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216-06584-9

Ⅰ. 生…
Ⅱ. ①王…②荣…
Ⅲ. 张伯驹(1898~1982)—传记
Ⅳ.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988 号

生是长穹一抹风:民国公子张伯驹	王忠和　荣　进著
出版发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670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165 千字	插页:10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27.00 元
书号:ISBN 978-7-216-06584-9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录



第三章　一生聚散救国粹 / 045

他卖掉豪宅，变卖夫人的首饰，为的是收藏距今1400多年的《游春图》、“中华第一帖”《平复帖》，为的是收藏李白的真迹、杜牧的字、范仲淹的手卷……历经跋涉离乱，他如性命一样地保藏这些收藏。

他即使被绑架，也决不让卖掉他收藏的法书名画，为的是避免国宝流失国外。因为张伯驹的出现，多少珍贵文物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运！



第四章　谈救京剧于传统 / 075

中国戏曲实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几千年历史的高度提炼。张伯驹热爱传统戏曲到了痴迷的地步。

1937年，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陪他唱《空城计》，真可谓"艺坛绝唱"，被誉之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晚年的张伯驹回忆道：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五尺峰。

第五章　说真话者大沉沦 / 103

解放前国民党派人去他府上游说，劝他飞往台湾，他没有同意；后来又安排他到美国定居，他毅然拒绝。解放后他把自己的大量收藏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一生繁华落尽，归于平淡。在反右运动中张伯驹落难了，

但他不以个人得失而惶惶不安，依然沉迷在他所衷心热爱的文化事业之中。

命运垂顾于张伯驹，使他历经磨难终于迎来了历史的公正。这一切看来似乎都是宿命。

张伯驹既无贵显之位，又无盖世之功，但人们一直在怀念他，这是张伯驹为人的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魅力，是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那种神奇力量的魅力！

第一章

张生父辈自有趣

他出生于显赫的官僚家庭，其父张镇芳是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妻弟。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开始腾达。曾任总领北方盐业的长芦盐运使，他在盐运使任内为国库增收56万两的盐税。民国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

一、为人处世皆低调

——生父张锦芳

张伯驹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河南项城县秣陵镇阎楼村。他本名张家骐，生父为张锦芳。张伯驹有一同父异母弟张家骏，同母妹张家芬。

张锦芳（1872—1942），字絅庵，清末廪生（秀才）出身。所谓廪生乃是从秀才中经过多次考试选取的优秀者，送到县学或是府学中读书，并由政府给予一定补贴者。由此可见，张锦芳的学问不是泛泛之辈。据说，张锦芳自幼聪颖好学，为人诚实谦恭，而且性情慷慨豪爽，救济危难，唯恐人后，深受邻里称赞。

清末，张锦芳曾任度支部郎中。鼎革后于民国二年（1913）任众议院议员、道尹等职。其本人已是身份显赫，且其兄张镇芳曾代理过直隶总督，并官至河南督军，也算是一方大员，更可谓煊赫一时。但是，张锦芳在乡里生活却很是低调，管束子弟极为严格。一次，他的次子张家骙与同学张文钰聊天，张家骙问张文钰："你是哪儿的张？"张文钰答曰，是北街牌坊底下的张（意谓住在牌坊下面）。张文钰反问张家骙："你是哪儿的张？"张家骙却答道："我是牌坊顶上的张。"明显有压人一头的意思。张文钰不服气，二人便争吵起来。原来这张文钰也不是无名之辈，他的先辈曾捐资修建县文昌宫，做过文昌宫的山长。一般文昌宫都是县学的所在，所以文昌宫山长就是一个县的教育学院院长。张锦芳听说了此事，便首先教训了张家骙一顿，随即套上马车到张文钰家，向他们赔礼道歉。为此，乡邻们都称赞张

锦芳识大体，不以势压人。

民国元年，袁世凯任命张镇芳为河南督军。此时，正是辛亥革命风潮方兴未艾，各路豪杰争雄未已。革命党人不甘心由袁世凯做共和国总统，准备与之一争高下，各地的青年学生风头正健，充当了暗杀、爆炸等激烈行动的先锋。河南的青年革命党人也密谋炸开封的火药库。张镇芳作为一省之长，为稳定局势，不能坐视，便实行戒严，大肆搜捕，牵连无辜之事也就时有发生。可是张锦芳却反其兄之道而行之，保护、救助了许多青年学生。如因为项城阎子固一案，株连牵扯多人。张锦芳勇于任事，极力为之辩白，使许多无辜青年得以解脱。

张锦芳能诗善文，文学功底不薄，有诗集《修竹斋引玉咏》问世。但他却虚怀若谷，绝不以家世骄人，也不以学问傲世。他听说豫东名士朱飞仙诗书画都有很深造诣，便慕名造访。第一次未遇，遂留下名片而返。第二次又去亲临朱宅，见朱飞仙正在灌园种菜。那朱飞仙知道他是张督军之弟，无意与之攀援，也没有客套，便开口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张锦芳答："听说先生的诗做得好，想来与先生和诗。"朱问道："你的诗属哪一家？"张锦芳谦虚地回答："我不过是杂学乱凑，谈不上哪一家。"朱冷冷地说："你既然不入家，还与我和什么诗？"说罢，转身又继续灌园去了。张锦芳并未恼怒，反而叹道："真乃名士也！"

张锦芳死后，乡里口碑很好，汝南知府张子晋所撰之《絅庵先生碑》中说他："自清末逮民国初元，汝南改办一切公益，得公赞助之力居多，其他排难解纷造福于汝人者，殆不可数计。"

二、落寞本随显贵来

——嗣父张镇芳

张镇芳本来妻妾不少，但两个子女早殇，遂致无后。按照那时通常的做法，张锦芳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将自己的儿子张伯驹过继给兄长为嗣子。

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号芝圃，两榜出身。据说其先人系于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至项城。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积累日丰，成了小康之家。张镇芳祖父张致远饱读诗书，曾藏书万卷。因世道黑暗，不愿出仕，遂抱定“求仁唯克己，羞趋邑宰门”的决心，终老乡里。其父张瑞桢，“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50多岁才考中光绪甲午科（1894）举人。其母刘氏是兵部侍郎衔、漕运总督刘永庆的姑母。

张镇芳幼年时，受到父母的良好教育。他8岁入塾读书，21岁考中廪生，次年以乡试第一（解元）中举。光绪壬辰年（1892），29岁时中进士。开始分发户部任主事，官阶六品，在任8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张镇芳微服遁出京都，追随两宫至西安，任陕西司行走。两宫回京时，张镇芳在直隶遇见袁世凯，袁劝他外调地方，还建议他与自己到山东谋发展。张权衡一番之后没有答应。回京后，清廷以其护驾有功，赏以四品衔，留在户部农曹任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遂奏调张镇芳至北洋差委。张镇芳和袁世凯有点远亲关系——他是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妻弟。靠着这种

亲戚关系，张镇芳也陡然发迹起来。他于1902年任银元局会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升转长芦盐运使，并主办中英合作的开滦煤矿，还兼任了渔业公司、森林公司等事宜。他在盐运使任内为国库增收56万两的盐税，显露了理财的特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室亲贵发起“丁未政潮”，削弱袁世凯的兵权，将他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此期间张镇芳一度署理过直隶总督——总之，这都是些阔差使。尤其是盐运使更是肥得流油，一个县的盐政每年都可拿到十万多的进项，何况总领北方盐业的长芦盐运使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摄政王载沣本打算杀掉袁世凯，在别人的劝阻下，只把他开缺赶回原籍。袁仓惶逃到天津，满朝文武、亲信故旧无人敢问津者。这时，张镇芳不但亲往利顺德饭店探望，还资助了老袁一笔巨款，并担保照顾他的家属，这样一来和老袁成了患难之交。

民国肇建，袁世凯做了大总统。

民国元年（1912）正月，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发生壬子兵变，殷实的商铺、住户等无一幸免。当时张镇芳已擢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仍在长芦盐运使任上，遂将30万两库银全部解往北京交给了袁世凯，为自己捞取了政治资本。

不久，袁世凯任命张镇芳做了河南都督兼民政长，执掌一省军政大权。张在任内，全面恢复了清朝时代的旧秩序。民国二年（1913），宋教仁被刺身亡，河南革命党人在开封召开追悼会，国民党河南支部机关报《民立报》登载其编辑敖瘦蝉写的挽联，谓：“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若逢张振武，说我即来。”因为国民党指责袁世凯有称帝野心，所以讥讽他为拿破仑；张振武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功臣，因黎元洪与之有矛盾，黎假袁之手将其杀掉。对联将矛头直指袁世凯。张镇芳认为有“指桑骂槐”之嫌，立将敖瘦蝉捕杀。《民立报》对轰动一时的“宋案”、“罢免三督”等热点话题多有评论，张镇芳很是

不满，继而发生开封火药库爆炸，遂认定是《民立报》鼓动所致，便派军警包围《民立报》报社，竟将报纸编辑部主任罗瑞青等四人捕杀。张镇芳还成立了“军警联合会”，到各县缉捕可疑人员。太康县学生李纯被捕后，警察逼迫其承认是孙文、黄兴所派，李纯对孙文、黄兴的名字闻所未闻，竟至被枪毙。策划开封火药库爆炸案的同盟会会员、省议会议员朱丹陛，也被张镇芳逮捕枪杀。另有城乡客人28人集聚在开封一所宅院里烧香结拜，被人告密，说他们聚众准备闹事，旋即被军警联合会逮捕，28人全部被枪杀。

1913年秋，正当袁世凯顺利对南方用兵，一举平定二次革命后，豫南地区出现了一支号称白狼军的农民起义队伍。白狼原名白朗斋，河南汝阳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善骑术，曾任吴禄贞的参谋。吴被刺后，他对当局怀恨已极，便回到河南想号召党羽自成一军。但是所谋不成，遂集合散兵游勇拉起杆子，上山当了土匪。民国元年，白狼的党徒约有千人，他们喊出的口号竟然是——为清廷报仇。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人为了反抗袁世凯，便与白狼军搭上了关系。随着国民党军事行动的节节败退，许多国民党军也加入到匪帮之中。加上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入伙，白狼军如滚雪球似的壮大起来。白狼军神出鬼没，转战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地，把袁的政府军拖得疲惫不堪。这场官匪之战一直进行了一年多，直把袁政府军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913年，张镇芳因剿办白狼不力，被袁世凯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为由撤了职。对张镇芳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从政治生涯的巅峰跌落，基本上断送了仕途，仅担任一总统府顾问的闲职。不过，正如西谚所云，“上帝关上一扇门，必会打开一扇窗”，政坛的失意，倒让张镇芳有机会开创一项影响深远的事业。被撤职后，在北京闲着没事的张镇芳开始琢磨一件大事：中国北方竟然没有一家中资商业银行。正在兴起的民族工商业，只能跟外国银行打交道，他敏

锐地感觉到，这里蕴含着极大的商机。但他知道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办银行，琢磨再三，他向袁世凯提议以盐税结余办一家官商合股的银行，起名“盐业银行”。

1915年3月，由袁世凯批准，经财政部核准，盐业银行正式成立，商定由盐务署拨款200万元为官股，张镇芳及银钱业知名人士任振采、岳乾斋等集资作为商股。按照张镇芳的设想，盐业银行的发展策略十分稳妥，该银行是盐务专业银行，“以辅助盐商，维护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便民食为宗旨”。这套说辞的实质，是想“傍”着当时最有钱的行业，做稳赚不赔的买卖。开业之后，盐业银行与长芦盐商建立起大宗往来，并在盐务产销区先后设机构为盐务提供服务。

银行原定总股款500万元，其中官股200万元，私股300万元，而实际上由于财政官员们的抵制，官股只交了10万元，后来这10万元也转给私人了，所以盐业银行实际不过是个有官方背景的、私人性质的商业银行，股东都是腰缠万贯的清廷旧僚，如那桐、张勋、王占元、袁乃宽、张怀芝、倪嗣冲、刘炳炎等等。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举国反对，不久在忧愤交加中病逝。袁世凯一死，盐务署不仅不再拨官款，还将以前所拨资金全部抽回，经收盐税之事也不了了之，盐业银行在盐务区的业务也开展得不畅。张镇芳不得不裁撤盐务区网点，转为普通银行，并全部改招商股。这样一来，盐业银行的大部分官股，全都落入张家。

盐业银行创建之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之间斗得火热，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难得的发展空间，盐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很快在天津、上海、武汉、杭州等地建立分行。

1917年，中国上演了一出所谓“丁巳复辟”的闹剧。张镇芳也涉足其间，蹚了一回浑水。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了大总统，其实不过是傀儡，掌实权的是

手握军权的段祺瑞。张镇芳与新贵们的关系冷淡，只好隐居津门，沉寂了一阵子，实际上是在揣摩时局，以待再起。其实早在 1916 年春天，袁世凯实行“洪宪帝制”闹得天怒人怨的时候，北洋系的某些权要就在“太傅”徐世昌倡导下，大做复辟梦，准备推出小皇帝溥仪；张镇芳正是其中极为活跃的一员。

此时，黎、段互不服气，黎看不惯段的专横跋扈；段也一直将黎视为北洋圈子里的外人。北洋系群龙无首，更是复辟的绝好时机。张镇芳自然明白，要想复辟，首先要设法将民国解体；这要从黎、段两人身上做文章。张镇芳与段祺瑞素来不睦。因为张镇芳是段祺瑞所看不上的人，段说他是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经常喊他是“黄带子”、“大管家”。张镇芳心里窝火，借机挑拨黎、段的关系，挑起所谓的“府院之争”。很快，黎元洪携印出逃，张勋带兵进京，成立不久的民国已是风雨飘摇。

在张勋主导下，1917 年 7 月 1 日，复辟闹剧终于开锣。张镇芳被封为议政大臣、度支部尚书等要职。可是几天后，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组成讨逆军，向北京的张勋发动进攻。

虽然张勋兵力不支，连吃败仗，张镇芳仍然干得挺起劲儿，他不管天气炎热，天天戴了花翎，挂上朝珠，全副冠带，到部办公。张镇芳是度支部大臣，度支部的司员还得每天早晚在门口站班迎送。张镇芳到部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庶务科换厨子。把他平日赏识的前门外河南“厚德福”饭庄的大师傅安插了进去。

7 月 8 日那天，讨逆军攻入北京，小皇帝下了最后一道上谕，将张勋、张镇芳、雷震春等要员都开了缺。张镇芳与雷震春都气得不行，彼此商议道：“皇上既然不要咱们，咱们还在这里干啥呢？正好咱们的老把兄陆建章叫咱们，不如回天津找小段去。”小段者，段芝贵也，是讨逆军东路司令。

7 月 10 日那天，张、雷二人带着几个随从来到前门车站，大模大

样地坐上头等车厢，向天津驶去。不料，火车才出永定门，冯玉祥的军队上来检查。士兵回去后报告冯旅长，说有一个河南口音的人，自称张大人，叫咱们回来问候冯旅长，还说他们是拜访段司令去的。冯玉祥一听，这不是张镇芳吗？复辟的要犯想要见讨逆司令，这真是出了新鲜事啦！说着，给驻丰台的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宋哲元摇了一个电话："把他们给我押来！"

张、雷在火车中远远见一队民国军人怒气冲冲地向这边跑来，心知事情不妙，就想跳车窗开溜，谁知那车窗太高，两人都把脚崴伤。张镇芳一路大哭不止，和那穷横的雷震春恰成有趣的对比。两人在洪宪帝制时期就都是帝制犯，这次又是榜上有名，成了实至名归的"双料帝制犯"。

张镇芳、雷震春二人被押到天津。雷震春经过由蒋雁行、陈文运、贾德耀等五人组成的军事法庭会审，判以无期徒刑。实际上不到一年，就被释放出来了。张镇芳因属文人，归大理院审判。大理院的官员们板起面孔，以颠覆现政权的罪名判他死刑——其实，那时军阀们打仗多是如同狗打架，向来是不记仇的。别看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到了牌桌上面还是好兄弟。何以这次却动了真格了呢？原来，这其中还牵扯到张镇芳、张作霖和段芝贵之间的一段恩怨。

清末时，张镇芳和段芝贵本是把兄弟。1906 年，段芝贵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不过是个候补道，因把当红女伶杨翠喜献给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一下子擢升到黑龙江巡抚，成了二品大员，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后被御史赵启霖弹劾，撤职查办，还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潮。张镇芳为此很看不起小段，等到小段自东北灰溜溜回到天津后，一直没给他好脸色看。可是段芝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加紧巴结袁大总统，终于在 1915 年又被封为镇安上将军、奉天将军，兼管东三省军政事务。那时张作霖是第二十七师师长，他早有独霸东北的野心，恰巧因为袁世凯要做皇帝，分封不均，惹得张作霖闹开了情绪。

张作霖因劝进老袁登极有功，以中将的身份破格封了一个二等子爵——按说以他的资格也只能得个轻车都尉之类五等之外的爵位。老袁以为很照顾他了，但张作霖却不买账，他认为王占元和他都是将军，王占元却封了侯爵，凭什么只给他个子爵？还是二等！便请起了病假，段芝贵亲自登门探视，他也挡驾不见。人们都知道，那时军人一请假，即意味着不负责约束手下，紧接着就是兵变，就是独立，谁受得了？实际上，张作霖还真的密嘱袁金铠等人，筹设“奉天保安会”，来个变相独立。段芝贵闻知大惊，连忙密电老袁，再次破格给他封了个侯爵，他这才销假上班。谁知，张作霖得寸进尺，既然要干，就来个彻底的。要做东北王，自然容不得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于是，他向张镇芳抱怨说，小段在奉天行为恶劣，丧尽人心等，列了小段一大串罪状。张镇芳本来就十分讨厌小段，遂说，那就把他赶走算了，大总统跟前有我替你解释。一天早晨，张作霖率领一班关东大汉，雄纠纠来到段芝贵的督署，隔着窗户向段芝贵喊话说：“洪宪皇帝马上登基了，大帅是开国元勋，特来请示大帅何时动身进京，好为大帅饯行。”段一听来者不善，他也机警得很，忙说：“明天晚上就走。”临走时，还将前任张锡銮留下的几十万军费盈余全部装入自己腰包。从此段芝贵跻身洪宪十三太保之列，一心筹划帝制之事去了。洪宪帝制失败，他又在老段手下混了些日子，直到皖系败于直系之手，他才息影津门，1926 年因脑溢血去世。

再说，张作霖硬逼着段芝贵回到北京，自己做了奉天将军。为此，张作霖十分感激张镇芳，二人还拜了把子。事后，小段知道了其中的内幕，对张镇芳恨之入骨，这次正好找机会报仇。小段的赌友们串通了大理院院长姚震以及律师等人，做起手脚，便判了他极刑。

后来因京畿发生水灾，熊希龄为赈务督办，托人给张镇芳捎话：何不出点儿血，既赈灾又可免刑，何乐而不为？张镇芳只好以其子张伯驹的名义捐资 40 万元，老熊用此款项赈灾有余，还办了一个“香山

慈幼院”，收养无家可归的逃难儿童。张镇芳改判无期徒刑，只隔两天，以病为由保外就医，实际上一天牢也没坐。1917 年年终，张镇芳被当局发往军前效力，他和雷震春一起到湖北报到。湖北督军王占元设盛宴招待这两个罪囚，二人只在武汉停留三天，又北返回家享清福去了。

获罪之后，张镇芳于 1915 年创办的“盐业银行”也被段祺瑞接收，交给自己的心腹、皖系的智囊吴鼎昌去办了。以后，他多住在天津，偶尔回老家项城小住，寄情诗酒，再也没有涉足政治。

民国九年（1920），皖系失败，奉系张作霖邀请张镇芳赴奉天。张镇芳提起“盐业银行”被人攘夺一事，恨恨不已。此时，直系掌权，奉系与直系走得热络，张作霖便令吴鼎昌交回银行董事长职权还给张镇芳。张镇芳被北洋系称为有头脑的人，遂向张作霖献计道：“陕西地处关中，既可雄视中原，又可控制西北，如能掌握，是个左右时局的好地方。”张作霖听信了他的话，遂起了觊觎关内、抢夺地盘的野心。果然，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在打败了直系之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做了北京的主人，自任“安国大元帅”。张作霖想起，正是张镇芳当初的一番话语，成就了今日的局面，遂想请他出面组阁。张镇芳与张伯驹商量是否再次出山，张伯驹劝阻说：“您的政治上生命早在丁巳复辟时就已经结束了，而且南方革命军的胜败正难预料，还是一动不如一静吧。”张镇芳遂婉拒了张作霖，没再出头露面。

1933 年，张镇芳去世，得年七十。

要说张镇芳终生没干好事，也不尽然。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提出开办三级制新式学堂。张镇芳立即将其付诸实践，率先在保定创办了“优级师范学堂”，为强国育人做出贡献。张镇芳还努力为家乡培育人才，凡是从陈州所属七县来的学生，食宿学费都由他承担。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旨废科举，兴学堂。张镇芳于 1907 年斥资 3 万两银子


张镇芳

创办了项城柏庄（百冢）铺师范学堂。学堂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且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学堂开设文、实两科；文科有文学、修身、教育学、英语、历史课程；实科则有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理、习字、图画、体操等。教学形式采取讲大课与分班讨论结合，自学与辅导结合，比起原有的私塾教育有了极大的进步。张镇芳又另捐银3万两，存在银行，以其利息作为学堂经费。学堂招生400人，对发展地方教育有所贡献。1911年，他还捐资，聘请名士主笔，续修《项城县志》。至今，这部县志还是项城地方极珍贵的历史文献。



第二章 平生苦乐有谁知

张镇芳一生处于政治漩涡之中，按照他的愿望，张伯驹最大的可能是进入军界、政界，或者金融界，但张伯驹偏偏爱上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成为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

他九岁就会作诗，有神童之誉，在后来的生活中，张伯驹几乎到了无物不诗、无物不词的境界。与他的诗词相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

一、九岁人称小神童

自从1903年，六岁的张伯驹过继给张镇芳为嗣子之后，便开始入塾读书。

张伯驹生来聪明伶俐，尤其是记忆力很好，七岁就能背诵《增广贤文》，九岁就会作诗，有神童之誉。他的诗作还曾被编入其父张镇芳等人组成的“丽泽诗社”所编的《丽泽诗社诸家诗》中。

原来，项城马丽轩与张镇芳既属同乡，又是同僚，还是诗友。二人曾结诗社，即“丽泽诗社”。张镇芳、张锦芳、张伯驹等兄弟子侄经常参与其中。据说，张镇芳的诗“如大将登坛，旌旗改色，纶巾羽扇，指挥如意”；马丽轩则拔帜自成一队，与之旗鼓相当。而张伯驹英年挺出，欲过前人，其诗，激昂慷慨、魄力沉雄，有倚天拔地之概，虽老于诗者，未必能及。马丽轩称赞他“素有大志，豪迈可喜”。

1905年，张镇芳调任长芦盐运使。七岁的张伯驹省父，遂留在天津——虽然张伯驹自幼游走于京津，乃至全国各地，但他那一口河南乡音始终未变，并自称中州张伯驹。不久，张镇芳就开始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新式学堂纷纷兴起，张镇芳大量捐款兴办新学，但对自己的儿子，他仍愿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张伯驹记忆力极佳，几乎过目成诵，老师看到他聪颖异常，又特意增加了《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等书，但他仍很轻松。这位塾师不由得对张镇芳赞道：“此子聪慧过人，日后必成大器！”尚是少年的张伯驹就熟读了《古文观止》，二十岁左右就将《二十四史》读了两遍，《资治通鉴》也是如数家珍，许多唐诗宋词更是印在脑子中了。



20世纪20年代的张伯驹

那年，他跟着大人去天津南市“下天仙”茶园看戏，是杨小楼主演的《金钱豹》。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京剧，年幼的张伯驹被那花哨的服饰、优美的唱腔、热闹的场面所吸引，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和这门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张镇芳任职的长芦盐运使署位于天津鼓楼东侧，附近多有茶园、戏楼，童年的张伯驹时常光顾。那时，梆子、皮黄还是同台演出，后来张伯驹回忆起那段观剧生涯，曾有：“梆子皮黄共一班，永龙关胜众人传，元元红与小荣福，钟鼓楼东别有天。”有时他去北京探望生父张锦芳，也忘不了到茶园观剧，不过只是兴趣，尚未入门，所以连谭鑫培是谁都不知道，“回思观剧在童时，谭字高标纸上题，朱粲但看花脸好，不知谁是叫天儿。”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事起。俗语云，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张镇芳将张伯驹送至项城老家，继续在家塾读书。这时袁世凯子女大部分都在项城，革命党人放出话说，将要对他们有不利行动，袁世凯遂将子女从项城移居天津，并将子女教育之事托付给老友严修（范孙）

与张镇芳。为了与袁世凯套交情，张镇芳让张伯驹离开项城私塾与袁世凯的第四、五、六、七诸子一起在天津“新学书院”读书。新学书院乃是基督教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60年后办的新型学校，校舍完全按照英国牛津大学的模式建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给新学书院捐了一笔巨款，所以他的几个儿子、许多孙子后来都在这所学校念书——袁克文之子，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袁家骝就是新学书院毕业的。该校还存有一块袁世凯赠送的巨匾。

张伯驹和袁氏兄弟放学后，即到严范孙先生的别墅“戒酒楼”去吃午饭。严不时来看望他们，考问功课，训勉有加，对张伯驹的勤奋好学影响至大。

民国肇建之后，张镇芳被袁世凯任命为河南都督，张伯驹进入河南省城开封陆军小学学习。

二、心高少年受笼络

张镇芳卸任河南都督之后，又回到北京。

张镇芳又开始为儿子的前途费心思。身在政界高层，张镇芳敏锐地看到，在乱世之中，军权高于一切，军界是当时最佳就业领域。于是他为儿子谋划在军界的发展。

1914年，袁世凯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他自己以总统身份亲任团长。此举显然是为了培养私人实力，长期控制军队。模范团的军官，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批毕业生中精选，均降级使用。士兵则精选忠诚可靠、身强力壮、当过正职军官、有过战争经验者。

张伯驹这年刚刚16岁，显然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张镇

芳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模范团的骑科。

说起来，这个模范团的建立还有一段内幕。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之后，决不敢对军事稍有放松，尤其是当他谋划帝制之时，看到自己对北洋旧部的一些骄兵悍将已经有些玩儿不转，便想在北洋军之外再建立一支嫡系部队。开始时，他在总统府内成立军事处，以控制全国军事。袁把他的日本顾问板西调来，经常和他研究，如何在军事处的基础上扩大组织新的统率机构和新的军事编制，以架空那不听指挥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

1914 年春，老袁派袁克定到正定把王士珍接到北京。5 月 9 日，袁在公府内设立“全国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德国的丁克满少校、法国的白礼苏中校任顾问；袁乃宽办军需，直接由上海供应军火。除了参谋、陆军、海军三部总长为当然办事员外，袁又选派王士珍、荫昌、萨镇冰三人为大办事员。在杨度的一番游说下，袁把蔡锷也放在办事处里任办事员。并内定他为将来的总参谋长，代替从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再调他为陆军总长，以取代跋扈不驯的段祺瑞。办事处成立后，总统府军事处被取消，段祺瑞退为办事员之一，遵照袁的指示，把陆、海军部的许多公事都移交办事处，陆军部成为名存实亡的机关。因此段极为不快。他向袁提出，旅长以上军官的任命可以由总统主持，但团长以下的由陆军部办理，明白地与袁争权，袁却不理会。段祺瑞干脆不再上班，消极怠工。有一次，段奉召入府，袁问段某件公事，段回答“容回部查复”，袁瞪起眼说：“怎么，我刚刚看了陆军部送来的公文，你这个总长却不知道？”原来这呈文是徐树铮代行呈上的，段并未阅过。事后，老袁叹道：“咱们团体里越来越不像话了，芝泉在家里做总长，老不到部……”

一直以大太子自居的袁克定早已不满暮气沉沉的北洋军，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北洋老前辈们不听指挥。仿照德国皇帝把兵权集中在皇室手中的做法，他向袁世凯建议，成立一支由大总统直接统率的模范军，

掌握天下的兵权。这正与袁世凯培植新势力的想法不谋而合。但觉得模范军规模太大，惹人反感，决定建立模范团。1914 年 10 月 23 日，在北海团城成立模范团本部，袁世凯自任团长，陈光远为团副。模范团的士兵来自北洋军的下级军官；模范团的下级军官则由北洋军的中级军官担任；中级军官则是清一色的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是少年精英和勋旧子弟。每期训练半年，即可产生四个旅的军官。袁的设想是，将来由模范团训练出十个师的军官，建立一支听命于袁家的武装力量，以取代北洋军。

张伯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模范团的。

1915 年元旦，张伯驹遵从父命到中南海居仁堂给袁世凯拜年。当他见面给袁磕头时，袁双手将他扶起，并满面春风地问他，愿不愿意到府里（总统府）来当差？张回答说，正在模范团学习呢。袁高兴地说："好好学习，毕了业，到府里来。回去向你父亲问好。"张伯驹见年长自己近四十岁的大总统如此礼遇自己，心里很是受用。当他回到家时，见袁的礼物已经先送到了，有金丝猴皮褥子两件，狐皮、紫羔皮的皮袄各一件，书籍四部，食品四包。张伯驹自己承认，十八岁的他正是眼睛长在头顶的时候，从来没有服气过谁，不过这次他的英气全消，彻底被袁笼络住了。同年，他还认前清八个铁帽子王之一的豫亲王福晋为义母——这大概也是张镇芳为何为清廷复辟卖力的原因之一吧。

张伯驹从模范团毕业后，到陕西都督陆建章部下任职，1916 年，因洪宪帝制遭到全国各地的抵制，陆建章被属下陈树藩赶走，张伯驹又回到北京。次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张伯驹到蚌埠倪嗣冲的"安武军"营务处任提调。不久，安武军改为陆军，倪嗣冲改任长江巡阅使，张伯驹任长江巡阅使府谘议。倪嗣冲后因精神失常而辞职，张伯驹也随之赋闲。

三、脱却军袍换布衣

再说复辟之役，张镇芳逃过一死，出狱之后，对政治兴趣全无。

张镇芳在狱中时，段芝贵为了报复当初的一箭之仇，以京畿卫戍总司令名义褫夺了张镇芳在盐业银行的职务，委派吴鼎昌接任盐业银行总理。次年，吴鼎昌成立董事会，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仍任张伯驹为监事。

当时，盐业银行号称北方四行——即盐业、金城、中南、大陆之首，因为张镇芳的政治背景，所以那些北洋大佬们都愿意把钱财存在盐业。加上吴鼎昌是个理想的理财能手，所以其业务蒸蒸日上。

说起这个吴鼎昌也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怪杰。

吴鼎昌（1884—1950）是贵州人，其父吴赞廷在四川绥定府给人当幕僚，他于1903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银行系；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个革命党人；1910年回国后第二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吴鼎昌与梁士诒有交情，留学日本归国后，托梁为他谋事。梁士诒把他荐到袁世凯那里，袁听说是日本留学回来的，便破格召见。他见到袁后，滔滔不绝地大谈天下大势和他的理财抱负。吴鼎昌本想大展宏图，可是袁世凯事后却告诉梁士诒说，这个人绝不可用。原来老袁还懂得一点麻衣相法，说吴鼎昌说话有声无音，脑后见腮——是个魏延式的反叛型人物。梁士诒也没有办法，只好委屈他到别处谋个饭碗。吴鼎昌人极精明，他在赌场上有“常胜将军”之称。他在赌局中，如同居官治事一般，有条不紊、稳扎稳打、轻重得失、洞若观火。他在北戴河一场牌九中，一口气赢了王克敏一百三十万，结果王把北戴河的一幢别墅押给了他。还有一次，他和段芝贵打牌，

逢场必胜，小段输急了眼，在大庭广众之下抡起巴掌掴了他一个耳光，他自然不敢惹这当红的军头，只好自认倒霉。

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败北，但奉军元气未伤，便退守关外疗伤，以待来日报仇雪恨。此时正是直系军阀耀武扬威的时候。张伯驹先是在河南暂编第一师挂了一个参谋的头衔；那时曹锟任川赣两湖四省经略使，又委任张伯驹当了经略使府谘议，这也不过是个名誉衔，只领干薪不干事。曹锟又将他推荐给了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吴派他在参谋处当差，但张伯驹并未到任。

1921年夏天，二张父子到沈阳拜见张作霖，张作霖委任张伯驹为奉军总司令部总稽查，不过只挂名不管事不支薪。张伯驹终是咽不下盐业银行被别人夺去这口气，便趁机向张作霖报告了银行如何被吴鼎昌夺去的经过。绿林出身的张大帅最讲究义气，十分恼怒地道："这还像话吗？我可以替你说话。"之后，张伯驹让渡给张作霖五万元的银行股份，使他变成盐业银行的股东之一。然后张大帅去电质问吴鼎昌道："你并不是盐业银行的原始股东，为何当董事长、总经理？"吴鼎昌虽然不想让出总经理的位置，但又不敢得罪张作霖，最后由股东之一的张勋从中斡旋，让张镇芳仍然回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吴鼎昌则留任总经理。但实际上张镇芳并不管事，一方面他看出来吴鼎昌确实是办银行的好手，另外自己落得清闲，于是双方取得谅解，吴鼎昌主管行务，张镇芳则在家养老，每年除股金红利之外，另有一笔红利，可分到三万多，直到1933年张镇芳去世，他们都相安无事。

1923年，京畿水灾结案，赈灾总办熊希龄因张伯驹捐献四十万赈灾款，授予他二等大绶嘉禾勋章。以简任资格分发陕西，在西安陕西省军署任参议。这次他真的去西安到了职，这也是他和西安有些渊源的由来。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下了台，直系从此一蹶不

振，奉系掌握了北方乃至全国政权。因为有前面所述的那段因果，所以张镇芳、张伯驹父子和奉系来往得很密切。

1925年，奉军进驻北京，张作霖成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政坛上风云变幻如同儿戏一般，张伯驹眼见政治黑暗，一腔报国热忱无处发挥，也看不惯官场上腐败堕落的作风、欺上瞒下的嘴脸、尔虞我诈的行径、敲骨吸髓的恶习，叹道："内战军人。殊非光荣！"遂毅然决然地脱下军衣，离开了军界。

1927年，张伯驹正值而立之年。一次，他到北京西河沿儿的盐业银行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儿旁边溜达。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宏。据懂行人评论说，清代十帝中只有康熙帝的书法可入行家的法眼，虽然此时张伯驹对于收藏尚未入门，但由于深厚的旧学根底，其眼力已是不俗。张伯驹没费思量就以一千大洋的价格将其买了下来。回去后，张伯驹愈看愈爱，遂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这就是他一生中收藏生涯的开始。从此，张伯驹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可是，在他母亲看来，他是个不成器的叛逆："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随他去吧。"所以家里的人都不喜欢他。

这年，张伯驹三十岁，曾填词一阕：

八声甘州——三十自寿

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　　玉管珠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肠断，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愁怅、有华筵在，仗酒销愁。

张绪（422—489），字思曼，南齐时吴郡人。为人清心寡欲，忘情利禄，为朝野君子所重。

在上半阕中，张伯驹感叹政治无情，自己在官场中虚抛十余年的光阴，一事无成。但他并未悲观，坚信自己来日方长，所以在下半阕中表示了有意向张绪看齐，诗酒风流打发一生的意愿。

四、盐业银行暂栖身

张伯驹退出军界后，张镇芳有意让他接自己的班，继承盐业银行，于是将他安排在银行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总稽核，每年负责清查各分行账目。从此，他经常奔波于京、津、宁、沪的分行之间。

吴鼎昌主管盐业银行之后，的确把业务管理得头头是道。张伯驹虽然是掌握了大半股份的老板，却完全是个甩手掌柜。吴鼎昌有事找他，他一百个点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绝对没有脾气，即使心里不乐意，脸上也不带出来，恭维他的说是"喜怒不形于色"，和他熟悉的便说他是"冷血动物"。钱财他是不缺的，所以也不屑去干那斤斤计较、毛票换大洋的委琐俗务。银行里的差事也是有一搭无一搭，根本不放在心上，而把全部的精力和财产全都投入到他的个人兴趣之上。

20世纪20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最混乱、最无序的时候。虽然张伯驹因有特殊的家庭背景不至遭到危险，但他奔波于南北之间，看惯了烽烟战火，心情无疑是沉重的。在一阕《扬州慢——归故都感作》中，他叹道：

云驿星津，雨轮风楫，倦游早计归程。豁迎眸一发，认

故国山青。向谁洒、伤时涕泪，洗戈银汉，何日销兵？敛西风残照，余晖，犹恋高城。　　少年俊侣，奈如今、潘鬓堪惊。纵万里乘槎，千金买赋，难慰深情。回首十年前事，疏帘外、酒醒钟声。只愁如春水，无人随去随生。

1926年，张伯驹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1934年，张伯驹担任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四行储备会成立后，张伯驹任监察委员。

1935年，上海日益成为全国金融重镇，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来上海，地址就在北京西路860号。

1937年夏，张伯驹与潘素去北京歇夏避暑，适逢卢沟桥事变，一时交通断绝，二人被阻于北京。很快南京盐业银行迁往重庆，张伯驹只好在北平诗酒自娱。每日在家与汪孟舒学习古琴，每月还到郭则沄家聚餐一次，席间，与会者吟诗填词打发时光。在此期间，潘素则师从汪孟舒、祁井西学习绘画。

1939年初，张伯驹偕同潘素转道香港前往上海。一路途经河内、昆明、重庆，到达贵阳去见吴鼎昌。当时，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但仍兼盐业银行总经理，所以张伯驹要向他汇报银行运作情况。

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各银行的关键人物都避往后方，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和上海分行的经理都不在上海坐镇，业务自然一落千丈。总经理吴鼎昌左思右想，要张伯驹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

1939年，张伯驹经香港、河内转往重庆，在四川游览了峨眉、青城诸胜迹之后，返回平津，不久又前往上海处理银行业务。当年5月，张伯驹伉俪抵达上海。上海分行经理因为投机购买美国期货生意，买进大量的橡胶、小麦，结果血本无归。张伯驹受到严重打击，患病，回北方。

1940年，张伯驹去上海照顾总管理处事务。春节回到北平。



张伯驹20世纪30年代于丛碧山房花园

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绑架，监禁八个月。染上疟疾，回京后卧床三个月方愈。

1942年10月，张伯驹与潘素携带所有珍藏的书画去西安，筹办秦陇实业公司，并担任总经理。

1943年，张伯驹去重庆、贵阳，面见吴鼎昌，告知上海分行累赔的情形。之后回到西安。在避居西安的三年中，他多次去兰州办事，收女徒王则昭，悉心教诲，加之王的努力，使王成为继孟小冬之后著名的余派老生。他还去过成都。与张大千一同观赏川剧。张伯驹对地方戏，如湖南湘戏、山西蒲州梆子腔都有兴趣，而且将一些优秀剧目移植到京剧中。他当时曾应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之邀，参加宴请蒋经国的宴席，张伯驹对小蒋不假颜色。他还参加过蒋纬国和石静宜的婚礼，席上蒋纬国心血来潮，邀祝绍周力请潘素夫人为之抚琴助兴，遭潘严拒，使祝、蒋颇感尴尬。

1944年，因为秦陇实业公司的大部分资金投到福豫面粉公司，以至流动资金短缺而结束。

1945年，抗战胜利，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北省主席孙连仲，聘

请张伯驹为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议、河南省政府顾问。12 月，张伯驹去上海开盐业银行股东会，辞去南京分行经理职务，南京分行旋即裁撤，张只任常务董事。

1946 年，张伯驹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南京美术会北平分会副理事长、华北文法学院文哲系教授。

1947 年，张伯驹担任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委员。与古琴名家管平湖、杨葆元、汪孟舒、溥雪斋等人发起成立北平古琴学会。

1948 年，张伯驹任北平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徒步往返于北平城里与海淀之间，斡旋北平和平解放事宜。

1949 年，张伯驹任民盟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受聘于燕京大学语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

1952 年，张伯驹任公私合营盐业银行董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同年，张伯驹组织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任副主任委员。

1953 年，银行重新估算财产，改造董事会，张伯驹以没有股票为由，退出董事会。从此彻底脱离银行界，专心文化事业。担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长。

1954 年，张伯驹应邀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1956 年，张伯驹与溥雪斋发起成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张任副主席。

五、家有欢乐亦有愁

张伯驹 15 岁时，由家庭包办和安徽亳州的李月娥氏结婚。

因为张伯驹是张镇芳过继的独子，所以张镇芳对张伯驹的婚礼非常重视，场面也极尽豪华。张伯驹的结婚礼服是民国时代标准的元帅

服，黑呢子料，领口、袖口和大襟都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肩上有金线编织的肩章，裤缝处也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帽子上面也有一支高耸的“鸡毛掸子”。李月娥穿的是清末民初显贵家庭妇女常穿的那种绣花短袄与盖到脚面的拖地长裙。

据说，李氏端庄美丽，她的父亲曾任职安徽军中，曾经和伯驹的祖父在一起共过事。李月娥虽然出身显贵，但是作为一个旧式女子，没受过多少教育，从小缠足，后来虽然放开，但还是小脚；因自幼被父母宠爱，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差，更不用说照顾别人了。如同那时的风俗一样，张伯驹的这件婚事完全是听从父母之命，与李月娥毫无感情基础，婚后似乎也没有培养起感情。大概二人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多，所以一直没有生育。

不过，看来李月娥对于这段婚姻还是充满憧憬的。终其一生，她一直保留着和张伯驹结婚时的礼服。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张伯驹始终不待见这位元配夫人。

由于张镇芳晚年定居天津，所以李月娥跟随公婆也住在天津。

张宅二楼东边的两大间和一个亭子间是李月娥的房间，只有保姆与她同住。张伯驹回天津时一般都住在其后续的三太太屋里，很少、甚至几乎不去看李月娥，也从来没有去她屋里坐一会儿、聊聊天的事情。李月娥精神不快乐，只好以鸦片麻痹自己，身体也不好，整天不出屋门，连按礼节每日应该下楼给公婆请安的常礼儿也都免了。家里，不但张镇芳夫妇体谅她，全家也都很尊重她，称其为少奶奶，但很少有人到她屋里看她，只有张伯驹的三太太常去看看她，了解她的需要，照顾她的生活；三太太生的儿子张柳溪也要按照礼节时常去给她请安。李月娥就这样了却了她的一生，她死于1939年，当时天津闹水灾，张伯驹在北京。她的丧事全由三太太负责料理，张伯驹竟没回天津。

由于张伯驹不满这桩婚事，后来自己又娶邓韵绮氏为妻。

当时张伯驹经常住在北京，先是按照其父的安排在官场做官，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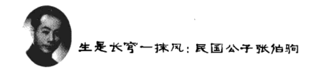
来又在盐业银行任董事之职。他在北京时住在西四牌楼东大拐棒胡同内弓弦胡同 1 号的宅子里，那是张镇芳在北京做官时置办的产业。那个年代，一些富家子弟都是在大家庭里已有妻妾的情况下，再另外买一所房子娶一个女人，成立一个外宅，张伯驹也不例外。邓韵绮原是北京唱京韵大鼓的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起的。这里面肯定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说不定，张恨水的《啼笑姻缘》还是从那里得到的灵感呢。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韵大鼓风靡一时，尤其是女演员登台更是引领潮流之先。邓韵绮当年是相当走红的鼓书艺人，后来到了四五十岁时仍断不了哼唱几句。要说她的长相不算娇艳，甚至穿着打扮也不比别人出色许多，她完全是靠着一副好嗓子唱红了的。大家闺秀自然不会去唱大鼓，邓韵绮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张伯驹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妥妥当当，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张伯驹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他满意的丰盛菜肴——这全是邓韵绮安排得当的缘故。

邓韵绮虽然不是很圆滑，但是也能处理与各方人士的关系，当时在北京的各种场合都是她陪伴张伯驹，所以与张伯驹来往密切的人都知道邓韵绮。当年也是她陪伴张伯驹去各地游山玩水，1934 年，张伯驹曾有《鹧鸪天》一阕：

甲戌正月下旬，偕韵绮，同西明，夜至无锡，借笼灯入梅园宿。次日冒雨登鼋头渚，望太湖，归谱此词。

为惜疏香此小留，碎阴满地语声柔。花光照眼还如雪，湖水拍天欲上楼。　风细细，雨飕飕，计程明日又苏州。客中过了春多少，只替春愁不自愁。



还有一阕《秋霁》也提到了韵绮。

中秋同韵绮、鹤孙、西明泛舟昆明湖赏月，迟景荣吹笛，王瑞芝操弦和之。

千里婵娟，与玉阙琼楼，共一颜色。寒似层冰，皎如圆镜，照来水天双激。一叶剪碧，荇飘翠带鱼盈尺。隔树阴蛩语，长桥横卧少人迹。　　歌板暗诉，怨抑沈沈，夜阑秋声，都入瑶笛。倚兰桡、临流顾影，人间未应有今夕，疑是广寒天上客。素娥何处，应似桂殿同游，满身清露，去时还湿。

这两首词都是张伯驹带着邓韵绮和朋友一起游玩时，偶有感触诗兴大发时所作。即便后来他调任上海盐业银行任职期间，每到春暖之后、秋凉之前，仍然经常会回到北京避暑，和在北京的文人雅士聚会，吟诗填词作画度曲，也都是邓韵绮陪伴左右。

张伯驹的三太太王韵缃是苏州人，其父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张伯驹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她，就在北池子一带买了一套小院，给了其母一笔钱之后，便娶了王韵缃，这个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与邓韵绮一样中间都有个韵字。不久，王韵缃怀孕。张镇芳夫妇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把她接到天津家里与自己同住。生下儿子之后，为了让她照顾好婴儿，也为他们能随时见到孙子，就没有再让王韵缃回北京，而留在了天津家里。

王韵缃也是出身贫寒之家，家里主要靠其父亲干活来维持生计。不过在这个家里，父母关爱女儿，女儿也孝敬父母，姐妹相处友善，日子过得也算其乐融融。生长在这样家庭里的王韵缃知道孝敬长辈，体谅同辈，办事首先考虑对方，所以和张伯驹及公婆一家都相处得很

好。在这个大家庭里，张镇芳夫妇的规矩和礼节很多。王韵缃每天早上都要去给老辈请安，王韵缃对李月娥也十分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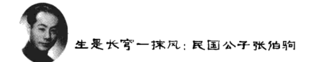
由于王韵缃性格温顺，又生下孙子，所以张镇芳夫妇对她是宠爱有加，另眼看待。但她从不恃宠而骄，更不会贬低别人，不计较名分地位，也不争财产，因此，张镇芳更认为王韵缃为人忠厚老实，可以信赖，便把管家的大权交到了她的手里。

王韵缃与李月娥的关系很好，李月娥住在二楼东面的两大间和亭子间，王韵缃则住在对面西间的两大间和亭子间。李月娥体弱多病，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王韵缃几乎天天上她屋里看她。李月娥也把王韵缃生的儿子张柳溪视为己出，有什么好吃的都叫他去吃，还经常给他买那时稻香村制的约一尺见方的盒里的蛋糕，还常给他些零花钱。李月娥生病时都是王韵缃为她请医生，送她去医院，照顾她的一切，直到她去世。

王韵缃与邓韵绮的关系也很好，邓韵绮也把王韵缃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总之，王韵缃一直尽着相夫教子、孝敬长辈、照顾好全家生活的责任，把张伯驹身上的担子都挑了起来。

王韵缃在天津家里安排好长辈、孩子生活的同时，也常惦念张伯驹的生活。张伯驹当时在北京，上海盐业银行的薪水有限，生活开销却比较大，王韵缃常把盐业银行的股息转账给他，以保证他的开支。张伯驹逢年过节回天津，也都是王韵缃给他安排一切。

20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本来准备由王韵缃随他去上海，但是张镇芳夫妇不同意。由于舍不得孙子，张镇芳夫妇既不允许王韵缃带着孙子离开他们去上海，也不允许王韵缃只身去上海，怕留孙子在家没有妈妈的照顾。再说张镇芳已经把银行股票交由王韵缃管理，并由她管理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也不允许她离去，所以王韵缃没有能够随张伯驹去上海——谁想这一决定改变了张伯驹的后半生，也改变了张伯驹的家庭。



张伯驹只身到了上海之后，于1932年在上海又娶了潘素。

潘素多才多艺，见过世面，接触过社会上各方面的人物，她能够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和对待各方面的人物，她和张伯驹在上海霞飞路建了家。因为在王韵缃生下孙子以后，张镇芳曾经告诉张伯驹不能再娶妾，所以张伯驹娶了潘素之后并没有敢告诉乃父。王韵缃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担心公婆年纪大了，怕他们生气，也就没告诉公婆。所以，张镇芳在世之时，潘素没有到天津见过张镇芳。开始潘素一直和张伯驹留在上海，直到张镇芳去世后，王韵缃按照张伯驹的想法，把他娶了潘素的事告诉了家里的长辈，这样潘素才进了张家，回天津参加张镇芳的葬礼。这以后她也是一直陪着张伯驹住在上海、北京，交往的都是一些银行界的人士，只有到每年的旧历年，才按家里的老规矩随张伯驹回天津与全家团聚，住些日子。1948年邓韵绮和张伯驹离了婚，1952 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他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王韵缃和张伯驹离婚后，张镇芳夫人仍留她住在天津家里。直到其子张柳溪结婚，才到石家庄为儿子安家、照顾孩子。张伯驹之子张柳溪毕业于辅仁大学，后在石家庄工业局工作。但是，王韵缃每年都要去天津和婆婆住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直至1961年婆婆去世。张伯驹得知消息，从北京赶来，与王韵缃一起料理了后事。张伯驹与王韵缃离婚后，与其子张柳溪的关系似乎也很冷淡，以至伯老死后，其婿楼宇栋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却少有张柳溪的声音。

另外，张伯驹与李、邓二人不谐的原因，可能与她二人都有吸食鸦片的嗜好有关——说起来，那时的富家女人整日无所事事，除了打麻将，就是抽大烟。因为吸鸦片的缘故，李、邓二人手头总是很紧张。张伯驹倒是能供得起，可是之间感情上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而且，张伯驹的父母因为李、邓二氏都不生育，对她们也不大满意，因此对他

续娶三房王韵缃一事实际是鼓励的。

总之，张伯驹与这几个妻妾的关系复杂，后来基本不大来往了。

张伯驹的《丛碧词》集中曾有一阕《念奴娇——中秋寄内》：

> 无人庭院，坠夜霜，湿透闲阶堆叶。月是团圞今夜好，可奈个人离别。倚遍云阑，立残花径，触绪添凄咽。满身清露，更谁低问凉热。　　记得去年今日，盈盈双袖，满地明如雪。只影那堪重对此，美景良辰虚设。玉漏无声，银灯息焰，总是愁时节。谁家歌管，任他紫玉吹彻。

《丛碧词》的起止年代为1927—1954年。不过，这里张伯驹并没有注明写作年代，也未说明是寄给哪个“内”，当然不能排除写给李氏、邓氏或王氏的可能。但是从他与李、邓、王三人关系并不协调的情况，估计可能写给潘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从结婚起，潘素一直陪伴张伯驹度过一生。

张、潘二人伉俪情深，俱不是惹花引草的人物。一次，张伯驹到上海，实业银行的刘总经理，邀请了几个同好者和张伯驹一起票戏。这位刘经理有个外室姓陈，原是舞女出身，和张伯驹共演了一场《游龙戏凤》。演罢，刘请众人去饭店宵夜，那位陈女士非要与张同坐一车。次日，刘又在家中宴请张伯驹，那陈女士更加流露出对张的一片柔情蜜意。过了两天，张伯驹即北返回京，不久接到陈的来信，表示要到北京去学戏，还托张伯驹为她找个老师。张看出她学戏是借口，托付终身才是目的。张伯驹连忙找上海的另外一个朋友，请他设法阻止此事。过了不久，那个朋友写信告诉他，陈与刘已经离婚，自己回到芜湖原籍去了，后来回沪上重操旧业，又当她的舞女去了，才算了断这件公案。

六、沪滨遭遇惊险事

30年代初，张伯驹初到上海时，先去找了他的盟兄弟孙曜东，这个孙曜东乃是清末大学士孙家鼐之曾孙、孙多禔之子、孙仰侬的弟弟。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孙家鼐的门生，两家的祖辈就有渊源。原来孙曜东和张伯驹还有一段深厚的交情。

张伯驹到沪后不久便结识了潘素。

潘素，是苏州人，在沪上高张艳帜，有“潘妃”之誉，是个当红的倌人。潘素长得清秀妩媚，谈吐不俗，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她不同流俗于一般的烟花女子，也是个被人视为“怪”的人物。原来，上海的花界也有分工，有些只接待官场上的客人，潘却专门招徕沪滨的白相人。她还和那些白相人一样，在胳膊上面刺了一朵花，作为招牌。虽然天天有人在她那里摆筵席，吃花酒，她却照样出堂差。张伯驹一见潘素，立时为其倾倒，惊为天人，并立撰一联：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如琵琶。

将之比为王昭君，誓要娶她。潘素也欣赏张伯驹的落拓不羁，二人很快定情并论及婚嫁。可是，潘素却已经被一个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军官看中，那人是个中将，名叫臧卓。这位中将知道了潘素另有新欢，胃中反酸，便把她软禁在一个叫“一品香”的旅店之中。张伯驹虽然曾经显赫过，不过已是明日黄花，怎斗得过一个手掌军权的当红大员，只好去找孙曜东商量办法。孙曜东也是上海滩上的玩家子，拿上海土话说是个“一只顶”。尤其那时他年轻气盛，好打抱不平，颇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概，便设计买通臧卓的手下，将潘素偷偷接了出来。1932年潘素与张伯驹正式成婚，那臧卓也无可奈何。后来，孙曜东投靠了汪伪政权的红人周佛海，成了周的机要秘书，那个臧卓也在伪军中混事，两人见面心照不宣，这段往事也就不提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平津一带的银行纷纷向南方转移。吴鼎昌先是到了后方，任蒋介石的实业部长，后来又转任贵州省主席，虽然仍然挂着盐业银行总经理的衔，却管不了多少事情了。这时平、津、沪三个分行的人事需要一番调整。上海分行总经理朱虞生调到北平，以加强吴鼎昌走后的力量。上海分行只剩下副经理萧彦和襄理李祖莱，萧彦是个不管事的好好先生，李祖莱却是个头脑活络、手腕灵活、联系广泛的角色。他自忖朱虞生走后，按资格自己该递升副经理，萧彦不过是傀儡，大权无异操之在我。但是，吴鼎昌并不看重李祖莱，主要因为他和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李士群、吴四宝来往密切。李士群、吴四宝那时是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们一个是特务，一个是开汽车出身，根本不懂生意经，所以还得靠李祖莱为他们打点，李祖莱也甘心为他们效力。所以，吴鼎昌力主由张伯驹亲自去主持上海分行。张伯驹百般不愿意，可是为了银行不致落在一个和汉奸勾勾搭搭之人的手中，这个差事他一定要答应下来。而且他多年收藏的大部分藏品都放在银行里，他即使再不情愿也只好勉为其难了。张伯驹以总稽核的身份，

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每周去一趟上海。1941 年的一次上海之行，让张伯驹陷入险境。

再说，张伯驹到了上海掌管了盐业银行的上海分行，挡了李祖莱的升迁之路，惹恼了李祖莱。李眼看到手的副经理与自己无缘，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便把一肚子的恼火发泄在了张伯驹的身上。他勾结“七十六号”机关，导演了一场绑票的荒唐剧。1941 年春的一天，张伯驹刚走出陕西北路培福里寓所的巷子口，猛地被一伙强人绑架而去，绑匪把汽车中间掏空，将张伯驹藏在其中，躲过租界警察的检查扬长而去。绑匪狮子大开口，要潘素拿二百条金子来赎人（一条为十两），否则撕票。张伯驹哪里受过这个，大少爷脾气上来，便绝食抗议，好几天不吃饭，人便消瘦下去。绑匪们见了也有点担心。

潘素和孙曜东的太太吴嫣本是北里中的姐妹，孙曜东知道此事后，便把事情捅到了周佛海那里。周平时在南京，每个星期回上海一次，他曾特别指示孙曜东要好好联络北方银行界南下的人士，以吸收资金，稳定金融。如今绑架了盐业大老板张伯驹，岂不是自断财路？所以周佛海立即追问李士群，责令他立即破案。绑票本来就是他的手下所为，

当初潘素被拘禁在其中的
上海“一品香”旅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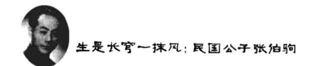
孙曜东（左）和京剧名丑艾世菊。

李士群这个案还用破吗？可是孙曜东怕参与绑架的那些喽啰不得到一点好处，来个撕票，也是应该防备的，便叫潘素答应花二十条金子点缀一下。在谈判过程中，绑匪带话给潘素，说张伯驹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请她见一面。潘素见到伯驹时，只见他已经有气无力，憔悴不堪。潘素唏嘘不止，可是张伯驹却置生死于度外，悄悄关照潘说，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所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要给我保护好。你怎么样放好、安排好，别人只要不知道，你一件也不能给我透露出去。你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张伯驹被绑 8 个月，绑匪要其给潘素写家书。张伯驹写下《虞美人》：

十一月下旬，雪，接慧素信，词以寄之

野梅做蕊残冬近，归去无音信。北风遥梦客思家，又见雪花飘落似杨花。　　乡书昨日传鱼素，多少伤心



语。枕头斜倚到天明，一夜烛灰成泪泪成冰。

绑匪给潘素传话道：“七天若拿不出40根金条，做好收尸准备。”

由于张伯驹不买账，一直在匪窟里滞留了八个多月。在此期间，任凤苞（1876—1953，银行家，曾任中南、金城、盐业等银行总理）提议潘素将所藏珍贵字画售于梁鸿志、任道援（二人均是汉奸头目），以筹赎款。为潘所拒。

周佛海亲自过问，李祖莱一伙想不放人是不行了，可是面子上又实在难以转圜，遂把张伯驹交给了驻守浦东的伪军第三军（军长刘培绪）第十三师师长丁锡三。

潘素将二十条黄金交出之后，被关押在农民家里的张伯驹，突然发现看守他的人都不见了，便自己跑了回来。张伯驹得知事情经过后，为感谢孙曜东的救命之恩，非要把自己收藏的蔡襄《自书诗册》送给他。孙曜东知道这件东西得来不易，没有接受。这《自书诗册》本是清宫大内的私藏，后来被太监偷着卖给古董商，由萧山的朱翼庵所得。朱死后，他的后人为营葬又想卖掉，梁鸿志本想出四万，被张伯驹以四万五千元买去。

不过，关于被绑架一事，张伯驹自己却讳莫如深，后来绝少提起。也可能是怕提伤心事，或许其中还有什么隐情，总之，局外人是不得而知了。

经历曲折磨难后，张伯驹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而他不愿卖画赎身，视书画如生命的事情，在当时就传开了。几家报纸也刊登了消息。张伯驹怕树大招风，便于年底尽快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他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女儿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

为谋生计，张伯驹在西安创办“秦陇实业公司”，自任经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连仲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北省政

府主席。孙连仲和张伯驹是老朋友，聘请张为顾问，襄赞军政，张随指挥部先期回到北平。孙连仲以唐山、石家庄两市市长的位置让张挑选，张伯驹皆婉辞不就。他继续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和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

七、弭兵促和不言功

1948 年，张伯驹居住在燕京大学迤西的承泽园中，那时周汝昌先生尚是燕大西语系的学生。一次张伯驹在燕大举办自藏珍品书画展览，正潜心于“红学”的周汝昌听说内有曹雪芹祖上之《楝亭图》，便急趋就观。原来，曹雪芹之曾祖曹玺在江南织造署曾亲植楝树一株，并筑亭于其侧。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玺去世后，其子曹寅重修此亭，命名其为“楝亭”，又请人绘了图卷。翌年，曹寅携卷进京，请当时名家，如徐乾学、王士禛等四十五人题咏其上，著名词家纳兰性德也题有《满江红》一阕。展会上还有纳兰性德画像一帧，上面也布满了名家题咏。张伯驹之《贺新郎》一阕列于其首，认为贾宝玉就是纳兰性德。周汝昌也乘兴步其韵和了三阕，引起张伯驹的欣赏。周又对张的《丛碧词》中的一些音律提出自己的见解，张伯驹遇到年轻的知音很是高兴，从此订为忘年交。周汝昌课余之时常常光顾承泽园张宅，直趋大厅。只见厅中巨案数条，琴棋书画、名砚佳印，无一俗物。周汝昌也不客套，自找座位，有时落座之后二人不交一言，也无俗礼揖让，可谓神交心通。在张伯驹眼里，人只有高下雅俗，并无贫富贵贱。所以他见了高官名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也是如此，见了草野村夫还是如此。

张伯驹待人接物从不自功利角度出发，反倒是怜贫惜老，向需要

帮助者伸出援手。

自1948年起，张伯驹将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接到家里，住在承泽园的一座小楼中。这时袁克定已不是昔日的大太子，而是个无人理睬、孤苦伶仃的老人。他平日蛰居在堆满德文书籍的小楼之上，阅读、著述不断——只可惜没有留下一部著作。后来，袁克定在文史馆有了一份工作，每当发工资的时候，都全部交给潘素，可是潘素不收一文。张伯驹几次搬家，一直将他带在身边，直到他1958年去世。袁克定去世后，那些从不来往的亲戚从河南项城赶来，把张伯驹为他买下的房子卖掉，装进自己的腰包。

抗日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即起。

1948年10月，锦州、沈阳相继攻克，东北战局急转直下。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日夜兼程入关，在离北平四十里的通县设立平津前线司令部，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驻守北平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六十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长约一千二百公里的防线。以林彪为首的东北野战军采取了一系列出人意表的动作，包围北平，切断平津间联系，横扫外围守军，使北平、天津变成两个孤岛。紧接着，1949年1月14日，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十三万守军被全歼，北平更是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北平的地下党，在刘仁领导之下，配合当时的军事、政治斗争，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其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了解掌握傅作义各方面的动态，让她劝其父亲不要再跟着蒋介石走。傅作义在大兵压境之下只好派出周北峰、邓宝珊等与共产党接触。共产党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

特意动员民盟的张东荪参加谈判。经过三轮谈判，双方于1949年1月15日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了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其实，这其中也有北平人民的努力。

早在1948年9月，北平各大学院系联合会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已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的张伯驹，与学生会成员一道，书写标语，组织游行。而且还慷慨解囊，捐献钱款，资助学生运动。

张伯驹自幼游走于社会最高层的圈子里面，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和北洋政府历届当政者都有交情。但是国民党以“北伐”一役将北洋政府驱出政坛，所以张伯驹对国民党政府有着一种天然的敌对情绪，也从来没有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任何职务。早在1928年，即北伐胜利的第二年，章太炎北上至京，在北海成立旨在反蒋的“中国学会”，张伯驹就参与其中。之后，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使得民不聊生，他自然对于与国民党作对的共产党有种亲近感。所以，张伯驹于1947年在张东荪、张云川的介绍下参加了“民盟”。

民盟的全称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是由所谓的“三党、三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国家民社党”、“中国青年党”与“救国会”、“职业教育会”、“乡村建设会”联合组成。民盟成立之后，延安的共产党视其为自己的“抗日”及“反蒋”盟友。从张伯驹参加民盟一事，他的政治态度也就不问自明了。

1947年11月6日，民盟被蒋介石政府强行解散，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出走香港，准备恢复总部。而张澜、罗隆基、黄炎培等人留在上海继续秘密领导民盟工作。因此，港、沪两地成为民盟两派的分野。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5月1日，毛泽东致电民盟沈钧儒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向他们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从速召开政协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时在香港的沈钧儒、章伯钧等民盟的左派马上闻风而动，于5月4日，发表联名通电，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并将民盟中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决定，迅速通知了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罗隆基则要坚持民盟的中立独立地位，坚决反对章伯钧“一边倒”的立场，遂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写信给在香港的民盟中常委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四人，要求在发表通电时注意两点，即成立的政府必为联合政府；必须强调民盟是绝对独立的政治集团。

此后，罗隆基又与张澜、黄炎培商议，由罗隆基执笔起草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三项要求：

1. 实行协和外交，不要一边倒向苏联；

2. 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不要彼此交叉、渗透；

3. 民盟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政纲不同，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于是，民盟四大支柱沈钧儒、章伯钧与张澜、罗隆基之间出现重大分歧，导致了港、沪两地民盟的左右对峙。为了遏制沈、章的一边倒，罗隆基甚至中断了给香港民盟汇款，引起章伯钧的极端不满，认为罗隆基用的是小人手段。

说起来，章伯钧与罗隆基皆为著名政治家，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两人都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之上，是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既然是搞政治，自然要有政治抱负，要求参政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章、罗两人都有对权力的向往，作为政治家，他们的目标也是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从20世纪40年代民盟创建之初，章、罗同为民盟的台柱子，两人都希望不断加大自己在民盟内的权重，免不了磕磕碰碰，这对于有政治理想的人来说是正常的。

章、罗从40年代的分歧一直持续到了50年代。

章伯钧一直抓住盟内的组织大权，而罗隆基则负责宣传，二人作风迥别，性格各异。章伯钧是民盟内的实权派，以罗隆基为首的“无形组织”，包括潘光旦、曾昭抡、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明、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十人则沦为反对派了。

那时，章伯钧很是风光，担任了交通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又是民盟第一副主席、农工党主席等要职。与章伯钧的风光相比，罗隆基的处境就有些落寞。虽然，他也是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盟副主席等，但他一直坚持民盟的独立性，在政治上变得消沉。

不过这时民盟的发展和作为已经绝非章、罗所能左右。罗自视甚高，对章伯钧的大权在握和自己的边缘化处境很是不服气，他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在盟内依然扮演反对派领袖的角色。1949 年年底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章、罗两派在人士安排上争执不休，最后是要周恩来出面方能摆平双方。比如，中共与盟内左派力挺章伯钧出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罗隆基等人的强烈反对导致盟内矛盾白热化，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加以调解，急召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到中南海夜谈。但不识时务的罗隆基和张东荪却拒绝出席，激怒了一等再等、直等到半夜 12 点的周恩来，周恩来派人把罗、张叫来，当面申斥二人。

此时，张伯驹才知道，原来民盟内部还有派别，派别之间还有激烈的纷争。

张伯驹本来担任民盟北平市临时委员会委员，后来吴晗代表共产党接管了民盟北平市临时委员会，并成立了正式委员会。张伯驹既然知道民盟其中的纷争，也就不想再蹚里面的浑水，遂辞去了委员候选人，只任总部财务委员会及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懂政治，更不愿意涉人政争，远离政治自然是他最好的选择。所以，后来凡是民盟内部带有派系色彩的聚会、活动，他都一律退避三舍。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将一切有地位、有影响、有才学的人都拉到台湾。所以国民党有人就打起了张伯驹的主意，他们不时派人去张伯驹府上游说，劝他一起去台湾或者到美国定居，被张伯驹断然拒绝。此时的北平城内，时而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张伯驹坐卧不宁，他不只是担心个人的安危，更是为千年古都随处可见的文物而忧虑。他遂以昔日闻名的贵公子、文物鉴藏家等特殊身份，多方活动，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

在共产党大军包围北平的时候，许多爱国人士担心这千年古都遭受炮火损坏，都热心奔走于国共双方，希求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民盟不时在张家开会，讨论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战火的劫难。张伯驹与西北军人素有渊源，身为西北军人的傅作义将军也知道张伯驹是个正直文人，很是敬佩他。于是，民盟的盟友们就撺掇张伯驹说，你去劝劝傅将军，千万不能开战，这要是一打，咱们故宫可就全完了，咱们祖国的文化遗产就都没了。张伯驹与邓宝珊将军、侯少白将军（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一直是好朋友，为了保护这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他们三人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勿起干戈，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北平的文物、古建筑。一方面国共谈判在反复进行着，一方面朋友也在劝说着；傅作义在左右权衡，上下考量了一番之后，最后才下决心放弃战争，走和平的道路。为了劝说傅作义，张伯驹还亲自驱车，忍痛割爱，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腊梅，送到了傅作义将军府上。

傅作义不久率部起义，北平未受任何损失就解放了。北平和平解放，张伯驹功不可没。可是，张伯驹极少与家人谈及此事。

作出了贡献，有些人去向政府伸手要官去了，弄个政协委员、政务院参议之类的。可是张伯驹从不言功。原来一个经常到张家开会的老友对张伯驹说："哎，伯老啊，你是傻了怎么的，你说你，这是个机会嘛，你怎么了吗？"张伯驹淡淡地说："哎，我还是画我的画，我也不要官，我也不要钱。"

此时，张伯驹的心情是复杂的，在此期间他有两阕《念奴娇》道出心中微妙的隐忧：

> 韶华依旧，春来去、送尽兴亡如许。三月秦淮莺乱舞，听唱隔江商女。燕子双双，飞花点点，欲对斜阳语。降幡一片，四天烽火齐举。　　谁问涕泪新亭？天涯芳草，歧路伤行旅。剩水残山余画稿，难忘离宫禾黍。金剑沉埋，琼枝销歇，惟有愁长伫。黯然王气，几能禁得风雨。

> 杜鹃声里，惜芳菲、又减新来情力。愁梦一场春事了，惟有昼阴长日。风拂鸣琴，月窥吟烛，触景全非昔。旧时游宴，剩看池水凝碧。　　曾记白练听歌，青衫浣泪，憔悴京华客。陵谷几经朝市换，残弈浑难收拾。对酒伤多，登楼望远，烟树沉沉黑。平芜尽处，夕阳犹恋山额。

1949 年后，张伯驹与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顿失经济来源，有人只好变卖家藏的字画文物以度时艰。可是张伯驹却一件也不肯卖。不得已，潘素只好拿出自己的金银去换成现钱。那时私自买卖金银属于违法行为，潘素为此被公安局拘押了十数日。饶是如此，张伯驹还是绝不出卖他珍藏的文物。

张伯驹闭门静养，很少与外界接触。他只是默默无闻地从事自己热爱的艺术事业而乐此不疲。他除了继续担任在燕京大学的教职外，还在京津各大学开过诗词和戏曲讲座，此外，他还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1 年，周汝昌毕业去成都工作，张伯驹特邀“稊园诗社”在承泽园笔会雅集，到会的诗坛耆宿竟达四十余人。

1952 年春，一些旧友来访。其中有曾在上海绑架案中帮助过他的郑振铎（1898—1958），这时已是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力邀张

伯驹出来参加工作，张伯驹推辞不果，只好就任文化部顾问一职。

12月，毛泽东寿诞之日，张伯驹曾将古画册页，并附以潘素的山水画作为寿礼送给毛泽东。翌年春节，毛泽东还送给他食品。1953年初，张伯驹再将李白的《上阳台》帖的真迹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于春节之际，令中央办公厅给张伯驹送来火腿、糕点、水果、白酒等物表示答谢。以毛泽东那狂蛇乱舞的书法风格，大概不会喜欢李白的真迹，若是张旭或是怀素的狂草可能还有些对他的心思。再说，心里装着世界革命，整天与天、与地、与人奋斗的毛泽东也不会留意一件千年之前的字迹——尽管张伯驹可能花了几十万、几百万，大概很快就丢之脑后，连张伯驹这个人是谁也记不起来了。

1970年，张伯驹回京后，曾在1972年毛泽东生日之时，与潘素作画题诗送给毛泽东。1973年，张伯驹填《莺啼序》一阕、潘素绘《日升松茂图》，为毛泽东祝寿。未见毛泽东有唱和之作，大概毛泽东始终也没有将张伯驹当作是自己的朋友。再说此时，他正在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也顾不得赏诗观画了。这阕《莺啼序》并没有收到张伯驹自编的《词集》中，看得出，他对这种谀词并不满意。



第三章 一生聚散救国粹

他卖掉豪宅，变卖夫人的首饰，为的是收藏距今1400多年的《游春图》、“中华第一帖”《平复帖》，为的是收藏李白的真迹、杜牧的字、范仲淹的手卷……历经跋涉离乱，他如性命一样地保藏这些收藏。

他即使被绑架，也决不让卖掉他收藏的法书名画，为的是避免国宝流失国外。因为张伯驹的出现，多少珍贵文物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运！

一、收藏本是雅人事

收藏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对前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遗存（文物）进行发掘、保有与研究，文物是历史的记录，所以收藏文物实乃是保留与见证历史。

收藏所为何事？各人见解不一，但不少藏家认为，收藏最基本的功能是“传承文化、感知文明、怡养情致”。历史上出名的大藏家，可说是没有一个靠收藏而致富者。他们收藏文物书画，随着眼光的提高，日积月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便是因收藏而身陷窘境，仍不改初衷。当然，藏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收藏者，他需要对历史文化有独特的认知和理解，须是对文化有特别的修养、兴趣、眼力，而且又是有胆识、有道德之人。因此“收藏家”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担当，是一个人内心的压力和责任，也是一种气概、幸福与光荣。因之，真正的收藏家并非是古今艺术家杰作的所有者，而只是背负着使命的保管人。

说起收藏，最早应是皇家莫属，因为其集权力、财力于一身，民间无人能够与之抗衡。

其实，皇家的收藏在历史上还担负着多种功能。最早皇家收藏的宝物是以其宗教力量而被推崇的，如在商周之前。后来，收藏渐渐成为传递道德观念与社会规范的工具，如先秦之际。随着社会的前进，几经演变，最后收藏变成了皇帝个人的艺术趣味与选择，教化让位于审美。

皇家收藏因为内乱、外扰而经历过多次的劫难。

如东汉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焚毁洛阳，致使内宫收藏付之一

炬。又如，南朝侯景之乱（548年）时，南京文物遭到一次洗劫。南梁承圣三年（554年），梁元帝萧绎（508—554年）在北魏大兵压境之时，不派兵抵抗，反而在大内龙光殿大讲《老子》。下面百官戎装听讲。萧绎坐观攻守之势，即景生情，口占为诗。终于国都江陵城破，萧绎叹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遂将其收藏的24万卷书籍全部焚毁——将亡国归罪于读书，可谓愚不可及。再如，北宋末年，金人攻破东京汴梁城，将宋徽宗父子掳到北方，皇宫的收藏也都搬运至塞北等等，不一而足。

与皇家收藏相对而言的是民间收藏。

有人将民间收藏之起源，归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之时。据说，有识之士们将许多书籍藏于湖北沅陵县西北的大酉、小酉二山的山洞之中，小酉山洞中藏书有千卷之多。所以民间收藏是以收集典籍开始的。

明清之际，大学问家顾炎武反对空谈，倡导"经世致用"的朴学。治经重名物的训诂考证，实开"乾嘉之学"的先河。为了求证经史上的疑点，文人学者往往借助于钟鼎彝器、碑碣石刻，甚至秦砖汉瓦、玉石印章。于是，文人学者时常鉴赏古物；古董商也致力于考据训诂。这种交互作用更促进了收藏业的发展。

早期的收藏只限于图书、字画、古玩、珠宝、玉器等；演变至今，可谓无所不收，什么"棋子橡皮卷笔刀，糖纸烟盒花布头，邮票粮票站台票，挂历年画中草药"都在收藏之列，不下二三百种——不过这已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单说这书画的收藏与鉴赏兴盛于康乾年间，自嘉庆以降至清末，书生、官僚及有钱有闲阶级竞相鉴藏金石碑帖，以为考据之学。较为著名者如翁方纲、张之洞、潘祖荫、翁同龢、吴大澂、王懿荣等人。后来的端方更是收藏极富，并兼及书画。收藏而可称为家者，一般都有收藏目录，记录某件文物为谁人之物，其流传之源流等等。

到了清末，文人学士的收藏热持续升温。大学士翁同龢、潘祖荫就提倡文人应多逛琉璃厂，以书店为图书馆，以古玩店为博物馆，于学问、见识都大有裨益。一些翰林等闲职官员甚至整天流连于琉璃厂。书店、古玩店的掌柜、学徒长期与朝野文人接触，受了熏陶，也酷爱读书，研究字画，可谓是真正的“儒商”，与市井之徒不可同日而语。

清末的收藏家里，要属吴大澂最为荒唐。

吴大澂（1835—1902），江苏吴县人，1867中进士。1883年，法国在越南事起，吴奉命会办北洋军务。1884年迁左副都御史，赴朝鲜处理甲申事变。1886年曾任与俄谈判首席代表，争回许多被强占的领土，也算是个有担当的人物。1887年，调任广东巡抚，与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事，与之斡旋良苦。1886年，治理黄河后，授河道总督。后任湖南巡抚。吴大澂是著名的清流党人物，喜谈兵略而和张佩纶齐名。他自称精通枪法，有百步穿杨之技。

1895年1月，在翁同龢的力荐下，吴大澂督20营湘军赴辽东，这位词林才子大概想效仿李鸿章，以边功封疆拜相。吴大澂的确是个才子，书法绝佳，尤其大、小篆写得相当有根底，连大学士潘祖荫都佩服得很。有时他在公文上也以大篆批示，闹得幕僚们时常来向他请教，批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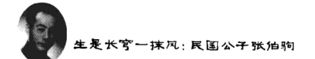
说起这位吴大人还有许多趣事。有人问起为何从湖南要来辽东作战，他说，这年元旦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只大鹏鸟从天而降。而日本驻朝公使正好叫大鸟，我们湘军里面神枪手多的很哩。人家笑他：不知你这是“忠”还是“疯”？到了出师那天，属下官员前来送行。吴某慨然叹道：“今日督师，不敢奢望出将入相，但求马革裹尸。”冷不防一个糊涂官员说道：“恭喜大人，一定会如愿以偿。”吴大澂大为尴尬，把他申斥一番了事。他在动身之前，挑选了许多平时喜爱的文玩书画，携带着上了前线，每天在营中与幕客唱和酬答。战火纷

飞的时候，将士们前来向他请示军务，只见他手持一方玉印，正在和幕僚谈论其出处。等到日军炮弹落在跟前时，他张惶无措大呼备马逃跑。日军统率看了吴大澂丢下的珍玩，笑道："想不到支那营中倒开着这么大的古董铺子。"吴大澂一溜烟地逃跑之中，还在招降告示中自诩："本大臣于三战三北之余，自有七纵七擒之计。"后来几乎为日军擒获，幸亏马快得以逃脱。最后牛庄、营口失陷之后，吴大澂被革职查办。罢官之后，家计艰难，吴大澂只好靠卖书画、古董度日。

民国初年，鉴藏书画之风愈盛，宋元以上的藏品，因为年代久远非经多见广者，不易识别真假，有时反倒是近代的物品价值较昂。例如，清代中期的成亲王、刘石庵的书法、四王的绘画等。

那时的文人收藏者，尚不以其为投资之道也；且他们大多是清贫之士，所以收藏只及于身，就难以顾及身后之事了。民国初年汪向叔曾云："夫以予奔走南朔，无二顷之田，无二廛之庇，独此零缣尺素，不啻性命视之，自谋者甚拙；顾性既与之相契，则即寄吾之心。每当棐几明窗，朝夕展玩，得与古人精神相接，其受益诚有无穷者。虽然，自古无聚而不散之物，然兹为吾所有者，亦犹吾之寄吾之心，而寄于吾焉已尔。知其为寄，则聚固吾幸，散亦理之当尔。"可谓通达之士。的确，许多收藏家身后大多物随人散，例如，民国初年的收藏家关冕钧（伯珩），因其名字中的冕字酷似冤字，被称为"四冤"之一，其他三冤则都是花冤枉钱，收买赝品的高官巨商者也。要说关冕钧生前收藏不可谓不富，且明清作品大多为真迹，但他物故之后，子女因析产争讼，他的收藏竟然陆续散落售出，令人喟叹不已。

这些收藏家虽然不事生产，或变卖、或举债而从事收藏，似乎有些愚蠢。康熙时的高士奇曾讥讽道："世人嗜好法书名画，至竭资力以事收蓄，与决性命以饕富贵，纵嗜欲以残生命者何异？"可这正是文人与市侩不同之处。无论其生前转让、死后流失，其为一个时代之



流传史绪，承前人之经验，以自己经验再启发后人，亦不为无意义之事。

当然，收藏要有钱，有闲，很难设想在不得温饱之时尚有闲心去欣赏文物。作为一个民族，必须富足之后，才谈得上重视保护文物古迹。

民国十七年（1928），东京举办了一场“中国唐宋元明清书画展览会”。之后，书画价格骤然提升，那时又无文物保护的概念，一些惟利是图的商人便以此牟利，流到国外的文物日见增多。翌年，张学良主政北京，也有收藏书画的雅好，于是以周大文、胡若愚为顾问，专门替他搜寻收藏，这为国家保存部分国粹，使之免于流入异邦大有裨益。张学良所藏的文物由其外籍顾问端纳存于外商银行，抗日事起，张学良被囚，这批文物也就没了下落。

说起收藏家的眼力，首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对中国历史了然在胸，也要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再有，鉴赏主要凭借经验，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个道理。所见既多，研究既久，自然能够辨别真伪，其中奥妙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其实，所有的鉴赏收藏家，不管其成就有多大，入手之初，未有不收赝品者。不见真迹，何辨伪作？入门之后，日积月累，渐收渐精，自然就有了“法眼”。

二、离弃污秽向清高

1918年，盐业银行成立董事会，张镇芳任董事，张伯驹任监事，吴鼎昌以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后，张伯驹被选为董事，又被任为总稽查——但不支薪，是个挂名的职务而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社会上，

尤其是南方流传着“四公子”的说法，即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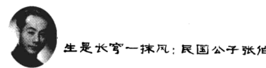
1920年，第二次登台的黎元洪总统，因张伯驹赈灾有功，发表他以简任职存记任用，并发给二等大绶嘉禾勋章。

1927年，张作霖入主中南海后，曾想找个北洋系的旧人组阁，便看中了张镇芳。但是，张伯驹劝其不要再涉足政治。张镇芳已年近七十，也再无野心与人一争高下，听了儿子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婉拒了张作霖的美意，回家养老去了。

这几年里，直皖、直奉军阀战事不断。张伯驹虽一直担任军职，见国事日坏，和他建功立业的理念相去甚远，他尤其看不惯上层人物那种对同胞耀武扬威、在洋人面前却卑躬屈膝、彼此之间又尔虞我诈的丑陋行径。遂大有“秦关百二，悔觅封侯”之叹，也就将一颗热心肠冷了下来。

张伯驹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加之愤世嫉俗，便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满座，众人谈笑甚欢，他若是觉得话不投机，便一个人坐在那里，谁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时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里能够等上两三个小时，也不叫人去找，还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见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觉，在一群亲近的朋友中，就得了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大怪的怪处何止于此。虽然他的家产富可敌国，但他本人实在是朴素得难以令人想象。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穿绫罗绸缎，长年布衫一袭；他饮食平淡，偶尔一个大葱炒鸡蛋算是上等佳肴。他绝不和时下公子们计较谁的汽车豪华、名牌，对他来说，只要有四个轮子，能跑就足够了。另外，他身上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坚决反对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把那个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称为“赖家伙”，可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笃，袁克定后来落魄一直由他照顾，1958年袁克定去世还是他料理的丧事。张伯驹不会理财，银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张伯驹

的业务大权旁落，但有时却显出超人的精明。例如，一年清室小朝廷因为经济拮据，拿出一批宫里的地毯到盐业银行求售。别人看地毯已旧，花色暗淡，都说不要。他却令人全部收下。原来他看出地毯中夹有金线。那时教他京剧的师傅余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头拮据，张伯驹叫他买下，结果把金线抽出就赚了三万元，地毯倒手卖出又赚了三万元。还有，他出身官宦，父亲张镇芳一生在官场中打滚，他却远离政治——和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一定距离，认识而已，却不深交。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后来到蒋介石那里去当实业部长，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远了。

既然身处多事之秋，功业无望，张伯驹从三十岁起，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古代名人墨宝、真迹的收藏始于 1926 年。说起来，他的收藏和末代皇帝溥仪及清室后代们变卖文物有密切关系。

话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之时，曾与清室签订《优待条件》，

使退位的小皇帝仍然享有若干特权。但是袁世凯 1916 年死后，北洋政府自己都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照他们。那伙军阀们自顾争夺地盘，清室优待条件不再有人谈起，小皇帝溥仪遂断了经济来源。溥仪不但要维持一个颇为可观的皇室家族，尤其是他为了复辟往日的权位，不断地以钱财联络各方面的势力，于是乎用钱的地方愈来愈多，财政也日见短缺，溥仪就只好逐年变卖宫中故物度日。他以赏赐为名，让弟弟溥杰将许多画卷、册页用黄绫包裹携出宫外，经过两个多月的搬运，共盗出书画、手卷一千二百余件。

早在 1919 年以前，废清室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 40 万元，到 1921 年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计 20 万元。这前后 60 万元的借款，废清室根本无力赎回，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财源，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到了期限还不出，连续了几期仍还不出。盐业银行的吴鼎昌对此很不满意，要看详细账目。岳乾斋想为人保密，不肯拿出账本，后来在董事会上经监察人质问，才把详细账目交出，得知押款又已到期，还是还不出，于是将押品作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



20 世纪 30 年代，张伯驹于丛碧山房寓所

中，仅瓷器就有两千二百多件，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如玉碗、玉盘、玉盏、玉杯等，质地极细极薄，刻工非常精致，每件价值在当时就卖数千元。最著名的是一套金编钟。其中黄钟 12 个，每个计重八百多两；大吕 4 个，每个计重六百多两，合计毛重一万二千多两，折合纯金四千多两。还有两个金塔，每个重五百多两，有半人高，七层，每个塔身和门上都镶嵌了珠宝，炫人眼目。这都是 1790 年乾隆皇帝八十岁大寿时，各省的督抚聚资铸造的贡品。晚清的金器中，还有金册封 22 页，包括慈禧册封为贵妃时的金册封四页，以及生了皇太子载淳（同治）之后又册封为皇后的金册封八页，还有隆裕皇后的金册封六页。另有金印五颗，以顺治的母亲吉特氏的一颗最大，次为慈禧、隆裕的两颗，另外两颗是顾命大臣载垣和端华的。二三十年代，是满清遗属和没落豪门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尤其是外国人买瓷器肯出大价钱，所以盐业银行大获其利。以至于把变卖文物所得的巨款，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后，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 16 件金编钟，这些剩余之物就成了盐业银行的账外之财。日本人占领华北时，银行将金钟藏在天津法租界，后来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小库房里，日本军方和副领事以及胜利后的国民党大员，都曾追问过此事，天津行均小心应付，直到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现存故宫。

1924 年，溥仪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生活窘迫，不得不变卖从宫里携带出来的书画。其中著名的有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等。溥仪大多将变卖之事交给太傅陈宝琛经办，陈曾将 40 件名贵书画交给刘子超去找买主，其中四件书画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当时，张伯驹正在天津，银行朱经理约他同往观看。计有：关橦的《秋山平远图》、李公麟的《五马图》、黄庭坚的《摹怀素书》、米友仁

的《姚山秋霁图》，索价12万元。朱经理嫌要价太高，没有答应。其实，小皇帝此时的确是急着用钱，也就不太计较价钱了。后来，朱经理病殁，银行所存大部为张伯驹购得。其中文征明的《三友图》、王翚的《观梅图》、蒋廷锡的《五清图》、董邦达的《山水》五卷等，都是绝世佳品，尽归张伯驹。张伯驹本来在家里就锻炼了一副好眼力，通过收买大内的珍品，其鉴定书画的功力愈加炉火纯青了。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将溥仪胁迫至长春，做了伪“满洲国”皇帝。小皇帝坐稳宝座之后，又将仓皇北顾时留在天津来不及带走的珍贵文物运往长春。“满洲国”寿终正寝后，这批文物大多散落民间，这就是吉林等地富有文物的原因。

1946年，散佚在东北的文物开始在文物市场露面，国民党接收大员、文物鉴赏家、外国古董商，以及各地的文物贩子都云集登场，想要狠狠地捞上一票。这时，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也匆匆而至。他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将溥仪赏赐给溥杰的所有文物，造册登记，择其精者由博物院收购。

经过张伯驹考订的1200余件文物中，有历史、艺术价值的约四五百件，那时文物价格并不很高，故宫博物院是有此能力购回的。但那时南京政府忙于应付内战，无暇顾及于此，加之马衡院长也是缺乏担当的人物，致使大量文物流入文物贩子、甚至外国人之手。

北京琉璃厂八家古董商成立“八公司”，联合赴东北收购。遂购得许多精品。值得一提的是隋人展子虔的《游春图》。展子虔历经北周、北齐、隋朝，是艺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画家。《游春图》以山水为主、人物为辅，画法细腻，代表了中国早年山水画的风格。张伯驹得知此画作被一马姓古董商购得，便请求故宫博物院收藏，院方以经费不足拒之。张伯驹又就商于古董商要求他让与自己，但此商人竟狮子大开口索价八百两黄金。张伯驹并不知难而退。他又辗转托人从中斡旋，最后以黄金二百两成交。筹款时，张伯驹忍痛将其父当初购置的

弓弦胡同一处占地十三亩，据说原属李莲英之宅院卖出，才只得了一百三十两黄金，由担保人保证以后交齐。后来形势丕变，当事人也都不能顾及此事了。1970年，张伯驹从长春回到北京，还问起担保人，那部分尾款如何处理。担保人告诉他："形势变了，对方完了，我也完了，你也完了，这事也完了。"相视大笑。

张伯驹得了《游春图》，欣喜异常，不仅命名所居花园为"展春园"（即北京西郊承泽园），还自号"春游主人"，词集名为《春游词》，杂记也冠以《春游琐谈》。隔了一个月左右，国民党政要张群来京，听说此事后表示愿意出四五百两黄金求让，张伯驹不为所动，一口回绝了。

那批东北流散文物中还有范仲淹的《道服赞》书卷。范仲淹为北宋名臣，此卷为其为友人新制道服而作。北宋时道教风靡一时，宋徽宗尤其得了个"道君皇帝"的雅号。书卷写得极有个性，而且卷后题跋多为名家。张伯驹极力主张故宫博物院收藏此卷，张大千也有意将其购进。但是无论是故宫博物院，还是张大千，都无法见到那古董商一面。最后还是张伯驹将双方拉到自己家中，双方商定以黄金一百一十两的价格卖与故宫博物院。但是在故宫博物院开理事会时，胡适、陈垣等人以价格太贵为由，拒绝收购《道服赞》。此时正是急景残年，张伯驹身边也没有足够的银子，只好借钱、卖东西，才把《道服赞》收了下来。事后，张伯驹叹道："胡适于此道实无知耳。"

后来，张伯驹到长春任职博物馆之时，还从民间搜罗出不少的文物。

最为张伯驹得意的收藏乃是1938年得之于溥儒的西晋陆机《平复帖》。

陆机（261—303年），西晋文学家，字士衡，吴郡（今江苏省苏州）人。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

其祖父陆逊是东吴丞相，父亲陆抗是东吴大司马。陆抗去世时，14岁的陆机即与其弟兄分领父兵，为牙门将。20岁时，吴灭，与其弟陆云退居旧里，闭门勤读。晋太康十年（289年），陆机与陆云来到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见了大为爱重，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广为称扬，使陆氏兄弟享誉京师，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当时贾谧当权，开阁延宾，一时文士辐凑其门，其中著名的有24人，号"二十四友"，陆氏兄弟亦入其列。陆机历任国子祭酒、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可惜陆机生不逢时，遇上了"八王之乱"，不但官做不成，反而丢了性命。

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专擅朝政，以陆机为相国参军。次年，赵王伦阴谋篡位，以陆机为中书郎。伦败，陆机涉嫌参与，收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等救援，得免死，徙边，遇赦而止。后入成都王幕，参大将军军事，又表为平原内史。太安二年（303年），成都王举兵伐长沙王，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兵败，为怨家所谮，被杀，夷三族。临刑前，陆机哀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这便是"华亭鹤唳"之典故的由来。

虽然陆机的为人不足为训，但《平复帖》却是陆机存世的仅有作品，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件书法。该帖为陆机慰问患病康复的朋友所作。全帖共九行八十四字，秃笔挥就，为汉隶向章草过渡的混合体，其字形极似汉代"居延汉简"，其中许多字的具体涵义一直为人们所争论不休——据说近来才被启功辨认出来。自唐代以来，该帖就被许多皇亲国戚所收藏，在宋徽宗时入内府。宋徽宗在其上写了"晋陆机平复帖手迹神品"十个瘦金体题识。元代时该帖流入民间，至清代乾隆年间又入内府。乾隆的母亲喜欢小儿子，临终前留给了成亲王永瑆。永瑆又传给了孙子载治，载治死时，儿子年幼，光绪帝令恭亲王奕䜣代治成王府事，于是《平复帖》归了恭亲王。恭亲王死后，帖由小恭王溥伟继承，可是溥伟整日忙于复辟，后去了青岛，其弟溥儒自然就

拥有此帖。

张伯驹最早见到《平复帖》是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

早在1936年，张伯驹就得知溥儒所藏的韩干《照夜白图》被上海一叶姓古董商人买去。当时宋哲元主政北平，任察冀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张伯驹唯恐该图卷被外国人收买，连忙致函宋氏，请他设法阻止这一宝物出境。但是为时已晚，叶某转手卖给英国人。

张伯驹担心此帖会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遂立即通过“阅古斋”老板韩博文与溥儒商量，请他出让。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二十万来。当时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但他表示款项可以从长计议，等于预先买定下来，以防再被别人，尤其是沪商得手。1937年初，张又托张大千致意溥儒，愿意以六万元求让，溥儒还是没有答应。卢沟桥事变后，张伯驹滞留北京，不得返沪。年底时，他去了天津。那年（丁丑）除夕的前两天，张伯驹在回京的火车上偶遇傅增湘，从傅那里得知，溥儒因母亲去世，急需一笔款项。第二天，经傅增湘说合，最后以四万元成交（实际只交付三万二千元）；除夕那天张伯驹就将字帖取了回来，可见其迫切的心情。除夕之夜，张伯驹就与傅增湘彻夜观赏《平复帖》。



傅增湘

成亲王得到《平复帖》后，曾为该帖做了一个木匣，以宋代缂丝包首，也是一件文物。但不知为何溥儒并未将帖匣一起给张伯驹，张收到帖之后还曾去函询问：“平复帖已收到，宋缂丝包首不知何处去

了？”20世纪90年代，一老妪以一百元的价格卖给古玩店，最后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失散五六十年的帖与帖匣终于复合。

张伯驹得此帖后，欣喜不尽，题斋名为“平复堂”。有日本人听说后，通过古董商人向张表示，愿意出30万大洋请他割爱。张伯驹以绝不让国宝流出国门为由，一口回绝了。

1949年，傅增湘去世。张伯驹想起当年是由于傅先生的转告，他才得以从溥儒手中购得《平复帖》，成为“丛碧山房”的镇室之宝。挽之以联：

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华堂，犹忆同观平复帖；
卅里吉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重上倚琴亭。

三、拯救国宝真爱国

1956年，文化部召开购买公债动员大会，而且要求与会者当场表态——说是自愿其实就是强迫。副部长郑振铎大概也对这位昔日贵公子的挥金如土略知一二，便公开点了张伯驹的名。可是，有谁知道张伯驹夫妇现在虽不致冻馁，但已是今非昔比了。非常好面子的张伯驹不想只出个三百五百，甚至一千都觉得拿不出手。张伯驹唯一的所有就是他收藏的字画，于是夫妇二人都想到了这里。

原来，早在1948年张伯驹劝说傅作义将军起义时，国民党蓝衣社就向他寄过子弹，恐吓他不要帮助共产党。张伯驹由此想到后事，便立了一份遗嘱，将十八件书画赠与潘素。所以此时从法律上来讲，这些文物已经属于潘素。但是深明大义的潘素却认为，这些文物珍品历经千年，转手过无数人；但是逝者如斯，谁会记得他们？这是历史的

见证，若是真的毁在某个人的手里，岂不是历史的罪人？

在潘素的主张下，张伯驹表示愿意将珍藏多年的书画精品献出，换为公债，无偿赠给国家。这其中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八件稀有文物。

文化部文物局估价 20 万，但张伯驹一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国家。须知，那时一般人的工资每月不过四五十元，20 万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最后，文化部奖励他 3 万元，他还是不收，郑振铎告诉他这不是报酬而是鼓励，张伯驹这次收下，并全部买了公债。

张伯驹当年花费全部家当购买国宝，心中何等得意，不料后来竟反被麻烦缠身，感慨之余，曾填《扬州慢——题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墨迹卷》一阕：

张伯驹介绍收藏《游春图》的墨迹。

张伯驹介绍收藏《平复帖》的墨迹。

書畫光騰錦繡案詞人雅好
世無多陸機短疏三賢問杜牧
長箋一曲歌官本春遊傳有緒
御題歸棹筆非訛蓄年牖下
平安福懷寶心同勝卞和
叢碧堂張氏鑒藏捐獻法書
名畫冊題後 一九九八年秋 啟功

启功先生1998年题丛碧堂张氏鉴藏捐献法书名画诗

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早惊见、人间尤物，洛阳重遇，遮面还羞。佳话千秋。等天涯迟暮，琵琶湓浦江头。　　盛元法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一次，张伯驹谈起他不惜倾家荡产收藏文物时，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



张伯驹、潘素夫妇在欣赏文物。

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本不注意藏砚，但是为不使珍品流落民间，遭受损坏的命运，他见到后也设法收藏。他时常引以为得意的是，他在一夕之间，连得两方名人的名砚——钱牧斋的玉凤朱砚和柳如是的蘼芜砚。原来，张伯驹和前清宗室溥伒（雪斋）过从甚密，一天晚上，他过访溥雪斋，溥伒适得柳如是的“蘼芜砚”，只见其质地细腻，一端饰以云纹，背面四眼，如众星拱月。篆书铭文：“美人之胎”，落款“蘼芜”；以及后人的题识。砚匣为花梨木原装，古泽有光。伯驹看到爱不释手，便向溥伒提出割爱的要求，并愿意倍加其值。溥伒慨然应允，他当晚携归家中，激动得摩挲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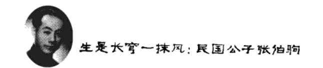
竟彻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一个琉璃厂古董商，为张伯驹带来一方古砚，问他要不要。伯驹接过一看，乃是有名的钱牧斋“玉凤朱砚”，砚为玉石雕成，呈凤形，篆字铭文为“牧斋老人”、“谦益”。张伯驹不动声色付款买下，并出示昨天得来的蘼芜砚，钱牧斋、柳如是本是夫妻，他们的砚居然在几百年后璧合一起，也是收藏界的一段佳话了。那古董商看了，深悔要价太低了。

熟读《红楼梦》的人应该知道有个最珍贵的本子叫《脂砚斋评石头记》，这所谓的“脂砚”原是明末的名妓薛素素所有，质地细腻，略有脂晕，上有篆文“红颜素心”。此砚就是由张伯驹法眼鉴定后，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

张伯驹还见过李香君的“桃花扇”，一面是杨文骢就血迹所画的折枝桃花，另一面是清代名人的题识，是件极有价值的文物，只可惜失之交臂，没有购得，如今不知流落哪里去了。



溥雪斋（1893—1966），道光皇帝曾孙，书画界名家，曾任辅仁大学美术系主任，会十多种乐器，擅长古琴和三弦。“文革”中下落不明。



四、伯老叹物是人非

政权更迭，张伯驹还是一以贯之地做他的“玩家子”——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花鸟鱼虫，他的玩友也都不是俗客，昔日皇叔载涛、宗室溥侗、溥雪斋等，至于朱家溍、启功、王世襄等都是他的小友了。

1951年，三月三日乃道家上巳日，张伯驹在承泽园故宅与诗友集会赋诗，他分得“石”韵，遂填《应天长》一阕，感叹人间世事如同棋局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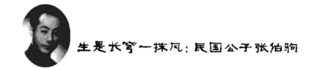
> 五侯故邸，三月令辰，芳游更趁泉石。尽有客愁兵气，随流付潮汐。堂前燕，犹似识，又软语、说春消息。问哀乐、旧世新人，那异今昔。　　台榭倚斜阳，一梦承平，歌舞已陈迹。不见汉宫传烛，飞花自寒食。长安事，如局弈，曾几度、眼惊身历。看无主、隔院娇红，谁去相惜。

1949年以后，张伯驹收藏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有了“好东西”，文物商店先要留起来，等待江青、康生、邓拓，甚至还有当过大使的李一氓等首长过目。如果他们看中了，几毛钱就可买走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了张伯驹之流那里，已经是残山剩水了。一次，他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先生，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

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无权无钱，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生活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这就够她操心费力的了。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张伯驹的书法在青年时代已小有名气，他早年师法二王，中年学习钟繇，练就了他深厚的功底。1940 年，他斥四万五千大洋的巨资，购得《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从此，他手摹神追，书风为之大变。他自言：“余习书，四十岁前学右军《十七帖》，四十岁后学钟太傅楷书，殊呆滞乏韵。观此册始知忠惠为师右军而化之，余乃师古不化者也。遂日摩挲玩味，盖取其貌必先取其神，不求其似而便有似处，取其貌不取其神，求其似而终不能似。余近日书法稍有进益，乃得力于忠惠此册。”蔡忠惠即蔡襄，宋代名臣兼书法家。说起蔡襄的《自书诗》还有一段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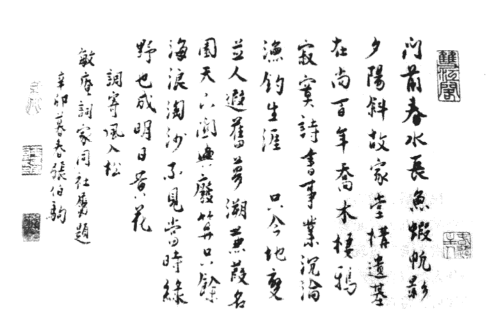
此卷原藏于大内，上有“贾似道印”、“武岳王图书”、“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等历代收藏、鉴赏钤印。民国后，被宫中太监盗卖给地安门“品古斋”古玩铺，古玩铺掌柜将帖以五千银元卖给朱家溍的父亲。1932 年，朱家仆人又将帖盗卖给“赏奇斋”古玩铺。这家古玩铺掌柜认识这是朱家的东西，便威胁那仆人要报告警察局，最后以六百元的低价买了过来。朱家溍的父亲得知后，将六百元垫款偿还，又加了一千元的谢仪，将帖赎了回来。后来，朱家因为丧事急需用钱，由傅增湘经手，以三万五千元的价格



卖给张伯驹。

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中，世人多学前三者。有人以为，前三者个性外露，有迹可循，而后者含蓄，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平中寓深，使人难以入手。明代学者王世贞曾评价宋四家道：“惟蔡忠惠奕奕神会，得晋人笔。”1961年，一位朋友拿着一卷米芾字来请张伯驹题跋，张伯驹断定其为高手摹仿，遂题写道：“宋四家以蔡君谟书看似平易而最难学。苏黄米书皆有迹象可循，而米尤多面手，极备姿态。故率伪作晋唐之书。然以其善作人之伪，而人亦作其伪耳。”暗中已经点出是伪作。

1949年，张伯驹任燕京大学艺术系导师，讲授“书法史”，曾出版过《中国书法欣赏》一书。后来，张伯驹还创建“北京书法研究社”，任副主席；主席为章士钊，陈云浩、叶恭绰、郭沫若等人都名列其中。张伯驹乃是热心的组织者，开讲座、办展览，都是他在参与



1951年，张伯驹为《咸水沽旧园》题词。

策划。1957年春，他曾组织举办一次明清书法展，以他的号召力，广泛征集，所以多有名家真迹，引起人们良好的反映。只可惜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人们也就没有心思欣赏书法了。

不过对于张伯驹的书法，各人也有不同意见。刘叶秋先生曾评述他三十四岁的一幅扇面："书兼行草，圆劲挺秀，卓然大家风范，与画可称双璧，殊足珍贵。"但是，对于张伯驹晚年所谓的"鸟羽体"，刘叶秋则认为："屈曲盘旋，如鸟虫篆，盖因力衰手抖所致，誉之者谓自成风格，予不敢苟同。"明白道出，其早年书法尚有可称许之处，晚年的鸟羽体则并不认可。欣赏张伯驹晚年的书法倒是可以借观弘一法师晚年的字。弘一法师年轻时真草隶篆样样皆精，中规蹈矩，秀美异常；但是到了晚年，一变往年风格，笔法似乎柔弱无力，笨拙呆板，简直像是个初学者。有人评价说，弘一法师经过僧俗两界的历练，已经置身于大千之外，所以没有一点儿人间烟火气息，没有半点儿世间凡俗味道。伯驹老先生是否也达到了此境界？是耶非耶，各人用心体会吧。

1950年，张伯驹和溥雪斋、管平湖等人在北京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溥任会长。张又历任中山书画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京剧艺术研究社副主任委员。1954年2月，偕夫人潘素到杭州游览，后转往衡山写生。

1980年3月5日，北京古琴会复会。会前张伯驹书贺：玉轸金徽传失响，高山流水聚知音。



1950 年 11 月，张伯驹与其女婿楼宇栋在展春园。

五、结怨当朝红权贵

50年代初年，康生突然造访张伯驹。

寒暄一阵之后，康生站起来走到客厅中悬挂着的《雪山图》前面，仔细端详起来。这是潘素仿照清代画家吴历的原作临摹的。据说，当年张大千曾将其当成原作。上面多有名家的题识。康生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张伯驹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康生兴致勃勃地说：“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张伯驹让妻子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这……是真迹么？”“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疑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张伯驹不敢不允，只好答应了。潘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

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让康生带走了。

一晃几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张伯驹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两人之间走动较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性子耿直的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在"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

这次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曹轶欧把邓颖超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但是康生的心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账。

其实，康生也是识家。

康生（1898—1975），本姓张，出身于山东诸城，他家从明清时代就是大地主，家中的书画藏品很是不少。所以康生从小就有机会鉴赏珍品，可以临摹真本真迹。他参加共产党之后，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职业则是经营艺术照像馆。为了避免招惹麻烦，暴露身份，他将价钱定得极高，以至很少有问津者。他在闲暇之时就是临帖写字。据说后来他在延安时，骑马摔伤了头部，使脑神经受损，犯起病来，觉得四周都是流水的响声。他一方面请苏联专家给他治病，一方面就是潜心疗养，静心写字，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一连抄了好几本，终于治好了病。康生的书法的确不错，真草隶篆皆通，而且善于左手写字，与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被人誉为当代四大书法家。可是康生极看不起郭沫若的书法，私下里说，我用脚写得也比郭强。

康生的收藏主要是善本书与砚台——并且自己能研磨、雕刻砚台，书画也时有兼顾，但是不多。

在中共高层还流传着康生保护邓拓一事。曾有一个四川人保有一幅祖传的苏东坡墨竹，拿到北京想以万元价格售予故宫博物院。一位专家看后，断言是仿品，没有理会。后来被邓拓得知，研究考证一番后，认为是真迹。持画者“货卖予识家”以三千元卖给了邓拓。邓拓一时拿不出现款，以一批明清字画卖给荣宝斋，作价三千，付清画款。据说邓拓因此事得罪了某位权贵，“四清”运动时指使荣宝斋一位干

部告发邓拓进行文物投机。事情惊动了刘少奇，指示要严格查处。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画了圈，连彭真和北京市委都不敢保他。康生知道了此事，用朱笔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文，说邓拓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而且仗势欺人，长期把持文物行业，不让别人插足，并建议由王力调查此事。王力也有收藏文物的爱好，经过一番调查走访，写成报告送交上去，终于认定邓拓没有问题，过了“四清”一关。

康生经常以朱笔点批文件——不知为何无人告他一个欺君罔上，图谋不轨之罪？也可能是毛泽东过于信任他了吧！康生也常以朱笔点批文学作品，自号“今圣叹”；工作闲暇主要就是观赏文物，逛琉璃厂，他的司机也因此略知文物一二。康生对音律也有偏好，于京剧的场面都有钻研，一般的丝竹管弦都能拿得起来。据说，江青在延安唱《打渔杀家》时，就是他任打鼓佬（伴奏乐队的指挥）。

按说，康生与张伯驹有同好，应当共同切磋、惺惺相惜，也不失其儒雅。可是生性奸诈的康生却不做如是想。1956 年张伯驹将八件国宝级文物捐献出来，康生听说后觉得很不是滋味，心里想：原来你有这么多好东西，却拿几幅明清的玩意儿搪塞我，还急急忙忙地要了回去，因此便与张伯驹结下怨仇。不过正如《圣经》上面所说，一个人的钱财只是上帝托他暂时代管而已，据说康生临死前亲自刻了一枚“交公”的图章，在自己每件收藏品上都钤了印——一个临死才交公，一个早早就献给国家，可谓是高下立判矣。

耶稣的归耶稣，撒旦的归撒旦。

不以人废言，也不以人掩行。自从康生政治上被划入“四人帮”一伙之后，社会上有许多关于他盗窃文物的流言，其中或有不实之辞。

文化与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范畴。文人就是文人，尽可以在文化圈里面游荡打拼，切莫涉足政治。政治是政治家之事，是“文人不宜”的。而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似乎成了理所当然，许多文人

被名位所惑，时常要凑热闹，也要加入其中，结果往往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康生、陈伯达、吴晗、邓拓、田家英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虽然正邪有别，结果却是一样的。张伯驹恪守文人的本分，只谈风花雪月，只问琴棋书画，按说不该惹祸上身。可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问政治而不可得，政治却要过问每个人。于是连张伯驹这样的文人也要被卷入政治漩涡，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1972年1月，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现了张伯驹先生送的挽联。毛泽东首先注意到了张伯驹的字透着一种超凡脱俗的韵味，再细细品味挽联的内容，不由得深情地说："这副挽联写得好哇，书法也很好。"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启功

第四章

欲救京剧于传统

中国戏曲实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几千年历史的高度提炼。张伯驹热爱传统戏曲到了痴迷的地步。

1937年,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陪他唱《空城计》,真可谓“艺坛绝唱”,被誉之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晚年的张伯驹回忆道: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五尺峰。

一、京剧艺术荣与衰

自从清代徽黄两大班进京之后，遂取昆曲而代之。其剧本、情节、戏词、唱法、身段、场面，兼取昆曲及汉剧、高腔（弋阳腔）等地方剧之长，扬弃其短，以至日臻成熟，成就斐然，也非偶然。因为京剧的剧情多是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正统思想，所以受到主政者的青睐自是意中之事，这也对京剧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现今说起京剧来都以程长庚为开山祖师，据说得其真传者唯有汪桂芬（绰号汪大头）一人，可惜早故，声名不彰。自清末以来，一度有谭鑫培、孙菊仙、刘鸿昇鼎足而三的局面。然而，孙菊仙虽声若洪钟，却不讲究身段；刘鸿昇调如裂帛，而不考求音韵，终不能与谭鑫培抗衡。所以执菊坛牛耳者，还是当推谭鑫培。三人都有自己的观众群，谭以士大夫为号召，孙多为天津老乡所拥护，刘则有市廛商贾的广大听众。孙刘两派人亡政息，早已湮没无闻，唯有谭鑫培后继有人。

清末民初之时，算是京剧的草创时期。那时菊坛正是月朗星空，群星璀璨，可谓是京剧的黄金时代。那时武生有杨小楼、俞振庭、尚和玉；老旦有龚云甫；青衣有陈德霖；正旦有王瑶卿、王蕙芳；花旦有路三宝、田桂云、水仙花；小生有程继仙、朱素云、德珺如；铜锤花脸有金秀山、裘桂仙；架子花脸有黄三麻、穆子、李连钟、李寿山；武净有钱金福；二路老生有贾洪林；汪派老生有王凤卿；文武丑有陆大肚、王长林；武旦有九阵风、朱桂芬；以上所说都是男角。坤班则有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张小仙等，真乃是群贤毕集，人才极一时之盛。

民初之后十余年，是为名角峥嵘时期。一些文人，如樊樊山、易

实甫、冯幼伟、罗瘿公、孙章甫、陈墨香、齐如山等，或借助诗词、或见于报端，对演员评头品足，虽然有时流于情绪化，但也有不少真知灼见。此时王瑶卿以嗓子塌中，梅兰芳遂成后起之秀，一跃与杨小楼并驾齐驱，小翠花、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亦先后继起，遂有了“四大名旦”之称。

民国15年之后，京剧进入学术整理与研究时期。梅兰芳、程砚秋先后赴美、苏、法等国演出。梅兰芳、余叔岩等人组织“北平国剧学会”；李石曾、程砚秋等人组织“中华戏曲音乐学校”等机构。这时，李世芳、毛世来等人也接踵而至，又有了“四小名旦”的称谓。

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梅兰芳、程砚秋等许多爱国艺人罢演，战火频仍，名角隐去，人们更是没有心思看戏，京剧日趋没落。

1949年之后，在京剧处马彦祥领导下，推行改造艺人思想运动，后在北京市文教委的张梦庚、王颉竹、方华等人领导下，成立戏曲讲习班，也是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之意。裘盛戎、叶盛章、李宗义等四百余人参加。1950年7月，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为主任的“戏曲改进委员会”先后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布对24个传统戏曲剧目的禁演决定，其中包括：《杀子报》、《奇冤报》（即《乌盆记》）、《海慧寺》、《大劈棺》等。传统剧一禁，使得演员无所适从，当时流传有，梅兰芳上台净是“醉”（贵妃醉酒）；李少春上台全是“闹”（闹天宫）；袁世海刮了四年“黑旋风”，可见那时戏剧舞台上的贫乏。但这还只是传统戏曲遭到摧残的一方面。

1956年，全国范围掀起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即所谓的“公私合营”。这股风也殃及了京剧界。那时的剧团多为民间职业剧团，一变为吃大锅饭的国营势必影响各方面的积极性。

给京剧界带来冲击的还有教育体制的改变。过去的科班变成学校，采用大批出人才的方法，有人将科班制比作手工业，而戏剧学校是流

水线——快是快了，但质量却差多了。还有演员们工资待遇问题，剧团中的行政人员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传统京剧受到空前的挑战。

万事有盛则有衰，张伯驹眼见了京剧的这个盛衰过程，感慨道：

> 世间万事换新陈，过眼休论幻与真。
> 一艺有生生有灭，后来须问后来人。

二、伯驹拜师余叔岩

张伯驹第一次看戏是在他七岁的时候，那时，张镇芳正在直隶任职，张伯驹随之住在天津。那天的大轴戏是杨小楼的《金钱豹》，是一出武功戏，小孩子不懂什么剧情，只是觉得打得热闹、过瘾。但从那以后他便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伯驹生长在河南项城乡间，说一口浓重的河南乡音，开始对京戏完全是门外汉，甚至连西皮、二黄都分不清。他的启蒙老师是余叔岩。1928 年，张伯驹三十一岁，开始师从余叔岩学戏。说起来，张伯驹以票友拜名家为师，这不能不说余叔岩给足了他面子，因为那时的戏剧界里面，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是鼎足而三的头牌。

余叔岩（1890—1943），乃余三胜之孙，幼年即投师学艺，在天津“下天仙”戏园登台时艺名为“小小余三胜”。出演后，愈唱愈红，观者空巷，欲罢不能，以至小小年纪成了下天仙的台柱子，每月包银达千元之多。但终因疲劳过度，提早倒了仓。之后，他曾为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当过一段内尉（副官一类），所以和政界人士有些联系。在津期间，余叔岩曾不时请教宗谭票友王君直，这位王君直虽是票友，


余叔岩与岳父陈德霖

唱起谭派来几可乱真，使余受益匪浅。再说，余叔岩因为年幼无知，生活不够检点，嗓子不能很快恢复，只好回北平调养，结束了小小余三胜时代。之后，余叔岩又师从姚增禄、李顺亭学戏。余叔岩的岳父是著名青衣陈德霖，陈老先生把他托付给琴师陈彦衡陈十二爷，传授他谭派的技艺。余的夫人，即陈德霖的女公子，极贤惠，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仍节衣缩食，甚至变卖首饰，支持他钻研艺术，最终享誉天下。

余叔岩心仪谭鑫培的艺术，无奈谭鑫培一心想把自己终生的绝学传给儿子谭小培，可是谭小培却老是学不好，老谭气恼之下就很少收弟子了。余叔岩还是通过总统府的一个司长的面子才拜在老谭门下，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余叔岩

原来，谭鑫培和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早年曾结下过节。

1908 年阴历八月二十是袁世凯的五十大寿。其时，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圣眷优

隆，气焰熏天，显贵无比。按照朝廷的规矩，大臣六十岁时才能得赐寿之大典，可是因为那时慈禧太后倚仗袁世凯如左右手，所以破例按亲王例赐寿。礼物有：慈禧亲绘的《三星图》、寿字银锭二千枚、宣宗（道光皇帝）御用翡翠朝珠一挂、宣宗珍珠带头一个、御用银器一套、康熙红瓷瓶一对、御用折扇四十把等。光绪皇帝虽然心里恨透了他，也不得不装装样子，赏赐给他一些书额、蟒袍等物件。这样的恩宠不但汉人看了眼红，就是满人也从无先例。朝中大小官员都来捧场，拜寿前半个月，制联称贺者纷纷，以致洛阳纸贵，京津一带南纸店内的金笺，售卖一空。有一副寿联道：

> 五岳同尊星拱北；
> 百年上寿日当中。

可见其炙手可热的威势。庆王奕劻亲自去爵具名来为袁祝寿，这在那个时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因为亲王身份极为尊贵，除了皇室，对任何人都是称某亲王而已。而且载振以贝子的身份与袁世凯结为把兄弟，称袁为四哥，也是极其稀罕的。更为稀奇的是，向来与袁不通音问的江春霖忽然来给他拜寿，人们都奇怪何以清高如彼的御史也来下凡人间。谁想到江春霖从寿筵上回去跟着上疏参劾袁世凯，列举其交通权贵，结党营私，私受门生等十二条罪状。可是，袁世凯正在当红之时，谁能奈何了他呢？

在袁的寿筵上，军机大臣那桐自动担任堂会的戏提调，请谭鑫培唱个双出。谭说，中堂若是请个安，我就唱。那桐马上屈膝下去。谭连忙说，我是和中堂说笑话呢。岂料袁世凯知道此事，心里和谭鑫培有了芥蒂，认为谭摆架子，不愿给自己卖力。以后总统府有堂会，戏单子上面必须写谭金福（谭鑫培的原名），如果写谭鑫培，袁世凯则装作不认识，问，谭鑫培是谁？



民国后剪掉辫子的谭鑫培在照像馆里摆出划船的姿势。



清末时，几位名票友的合影。前排为胡素仙、韩麟阁（夏山楼主韩慎先的父亲）、杨小朵、俞振庭。后排为王瑶卿、韩四爷、郭仲衡之叔、王凤卿。（自右至左）



王瑶卿、王凤卿、王丽卿三兄弟合演的《梅玉配》。





当年的小小余三胜扮演的诸葛亮。



小小余三胜与刘永奎在《黄金台》中的扮相。

袁世凯虽然不大爱听戏，做了大总统后不时也要传谭老板进府去唱一出，每次的报酬只有二十元大洋。老谭的儿子谭二（名嘉瑞）不满道："总统府怎么跟皇宫一样，也要传差？可钱又给这么一点儿，从前宫里还给四十两呢。"这话传到总统府管理剧务的庶务司司长王文卿的耳中，小心眼儿又作了怪——也说不定是他克扣了赏银。暗中叫军警方面给老谭传话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该好好保养保养身子，别总出头露面啦！"从此，戏园子、堂会上面再也见不到谭鑫培的戏码。谭是靠唱戏吃饭的，停演一天，一天的饭食就没有着落，这不明摆着砸人家的饭碗吗？

余叔岩时在总统府挂了个内尉的职衔。原来，当初他在天津下天仙搭班时，王文卿正在直隶总督袁世凯手下当差，时常去听余叔岩的戏，便认余做了干儿子。袁世凯做了大总统，王文卿也就水涨船高当了总统府的司长。谭鑫培打听到了这层关系，便托余叔岩从中疏通斡旋。余叔岩也很愿意帮忙，趁机提出拜谭为师的事情。最后，谭鑫培在总统府演了一出《珠帘寨》，算是赔罪，才许他照样演唱，余叔岩也拜了门。做了谭老板的门生，余叔岩天天跟着谭鑫培后面上下手检场。听着、看着、学着，加上余的天赋极高，遂得了谭的真传。

不过名为师徒，谭正式只教过他《太平桥》，还有就是《失街亭》里王平的一出。余叔岩只好暗地里偷艺。每当谭鑫培演出时，他总是拉上两个朋友一起去听戏，他隐在朋友中间，尽量不让谭看见他——因为，梨园中最忌讳同行在台下听戏。余叔岩一是怕谭看见他心里不高兴，再者怕谭知道他来，把重要的身段“马”掉了，岂不无功而返？他还告诉两个朋友帮助他记住谭的每句唱词和腔调，回去之后再一起回忆、切磋，直到把这场戏琢磨得完全透彻才算完。那时，余叔岩钻研谭派艺术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无论行走坐卧，手上比划着谭的功架，嘴里念叨着谭的唱腔道白。到底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资质天分又高，终于成为学有所成的谭派传人。一次，余叔岩与谭鑫培同台演出于某堂会之上，谭鑫培一旁暗暗观看，心有所感，回去之后，大骂其子谭小培不成器。可见，余叔岩的功力起码不在老谭之下。


余叔岩中年便装像

但是，因为个人的条件不同，他又不完全模仿谭鑫培，而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有所改造、创新，最终成为谭大王之后的一代翘楚。当初，谭鑫培是学余三胜的，现在余叔岩又学谭鑫培，等于他祖父的艺术又通过谭老板返还给了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余叔岩宁肯忍受生活的艰难，也不再登台出演，和梅兰芳、程砚



著名票友琴师陈彦衡（1869—1934），四川人，曾任谭鑫培、余叔岩、言菊朋等名角的琴师，他对谭腔的形成颇有贡献。

秋一样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真可谓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张伯驹每天晚饭后到余叔岩家学戏，其实，他会的戏多半是“薰”出来的，而不是学来的。他生性沉默寡言，每次到余家去，一个人往烟榻上面一躺，一言不发，他也不理人，人也不理他。余叔岩或是调嗓，或是与打鼓佬、琴师说戏，或是与别人谈戏，他都在一旁静听。时间差不多了，他可能不辞而别，自己悄悄离开。日久天长，耳濡目染，也就薰得差不多了。偶尔，余晚饭后吸足了鸦片，十二点钟以后开始给他说戏，他常常到半夜三四点才回家。正如张伯驹所言：

> 归来已是晓钟敲，似负香衾事早朝。
> 文武乱昆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

余叔岩认为《太平桥》的身段有些危险，故未让张伯驹学习。

张伯驹还从余叔岩的搭档钱金福的儿子钱宝森、王长林的儿子王福山那里学到不少余派的功夫，后来干脆把二人养在家里，陪他学戏。

每天早晨九点钟，钱宝森陪他打把子练武功。如此这般，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余叔岩教会了张伯驹许多剧目。如《奇冤报》《战樊城》等整出的戏四五十出，还有昆曲，以及零星的唱段。张伯驹的嗓子也有些沙哑，即所谓的“云遮月”，和余叔岩的唱法正类似。不过，他的嗓音算不得宏亮，往往只有前面几排的人能听得清楚，后面的人只能听个大概了，所以有人取笑他为“电影张”——因为那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的“默片”；章士钊也曾调侃他：“前座三排劳侧耳，不知谁在唱西城。”另外，他的台步、身段也都多有可挑剔之处，根本不入行家的法眼，可是他却自我感觉甚佳，经常彩排登场。

张伯驹大概听惯了名角，再有出自对谭、余的崇拜，所以总是以谭、余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而且他对于传统的规矩极为重视，绝容不得别人随便更改破坏。遇到不唱谭余正宗，或是加入花腔的，不论是内行还是票友，也不管私人调嗓还是公开演唱，生张熟魏，一律怒目而视，甚至责骂，当面开销，绝不稍留情面。一年，他到上海，孙仰依（孙家鼐的曾孙）招待他



王长林（右）、钱金福在《打山门》中的扮相。



去听《四郎探母》。不料，他听了没有几句，站起来就走，嘴里一面念念有词。孙仰依追上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脱河南乡音地说道："前后门落锁，放火烧！"孙不由得大吃一惊："为什么呀？"他还是边走边说道："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齐给我烧！"原来，他对那个演员的唱做不满意，便赌气要烧人家。还有一次，他听谭富英的《群英会》，那个去孔明的里子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他听了，跑到台口儿，用手指着那老生骂道："你不是东西！"弄得台上台下的人都为之惊诧不已，他却扬长而去。虽然行为近似荒唐，但正显出他对传统京剧艺术的挚爱。

1930 年，李石曾以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办"中华戏曲音乐院"，内设"北平戏曲分院"，其院务委员会主任是银行家冯耿光，委员有梅兰芳、余叔岩、李石曾、齐如山、王绍贤、张伯驹等人。梅兰芳的友人力促张伯驹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发起组织"北平国剧学



张伯驹和余叔岩在《四郎探母》中，余叔岩饰杨延昭（左），张伯驹饰杨延辉。



余叔岩在《洗浮山》中的扮相

会”。张为了帮助推动梅兰芳发展艺术事业，慨然应诺，招集银行界同仁，筹集基金五万元，借地虎坊桥晋阳饭庄创立“北平国剧学会”。由总务、指导、编辑、审查各部门组成，张在审查组任职。成立大会后，演剧称庆，大轴为《叭蜡庙》，张伯驹串演黄天霸，梅兰芳反串褚彪，大受彩声。

与张伯驹有同好的还有袁克文。

张伯驹登台常以“冻云楼主”为名，袁克文自号寒云，二人都是河南项城人，又是中表之亲，遂有“中州二云”之雅号。

1930年冬，袁克文和张伯驹、红豆馆主溥侗同登开明戏院舞台，演义务戏。当天剧目是，袁克文与王凤卿、王



余叔岩在《定军山》中饰演黄忠



晚年的余叔岩



李石曾

幼卿演《审头刺汤》，大轴戏是张伯驹和溥侗演的《战宛城》——张伯驹饰张绣、溥侗饰曹操、阎岚秋（九阵风）饰婶娘、钱宝森饰典韦。戏一直演到深夜三时。卸装后，克文意犹未尽，遂邀诸人同至城南花街买醉。时正值天下大雪，一路踏雪而行，来到韩家潭一带。室外虽是漫天大雪，室内却是炉暖灯明，一案置酒肴，一案置纸墨。原来那些风流客们听说袁二公子驾临，纷纷求他留下墨宝。于是妓馆的姑娘们凑趣，有的伸出玉臂为之研磨，有的为他伸纸。袁寒云在这花团锦簇之中，左手持笺，右手挥毫，即席赋《踏莎行》一阕，词云：

随分衾裯，无端醒醉，银床曾是留人睡。枕函一晌滞余温，烟丝梦缕都成忆。　　依旧房栊，乍寒情味，更谁肯替花憔悴。珠帘不卷画屏空，眼前疑有天花坠。

寻章摘句，随手拈来。张伯驹也随声和曰：

银烛垂消，金钗欲醉，荒鸡数动还无睡。梦回珠幔漏初沈，寒夜定有人相忆。　　酒后情肠，眼前风味，将离别更嫌憔悴。玉街归去暗无人，飘摇密雪如花坠。

等到把求书的人都打发走，已是凌晨了。袁克文和张伯驹携手踏雪走出妓馆，真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1931 年 3 月，袁克文在天津猝逝。张伯驹于春节时，曾来津给克文拜年，回京不久即闻噩耗，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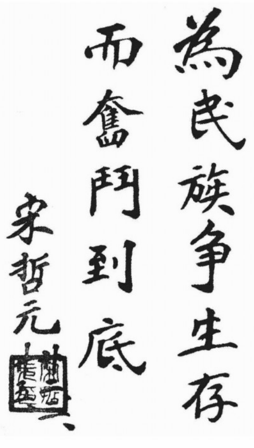
天涯落拓，故园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芳草凄迷，斜阳黯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三、菊坛难逢话盛事

1936年，察冀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母亲八十大寿，准备办个堂会热闹一番，底下一群拍马屁的人就撺掇他说："咱们一定得把余叔岩倒腾出来。"实际上那时余叔岩因身体不好，已很久不登台了。宋哲元一方面知道余叔岩是个倔脾气，怕碰钉子，再有也不愿意以势压人，所以一直在犹豫着去不去请余叔岩。底下又有人出主意道："余叔岩跟张伯驹最熟悉不过，叫张伯驹请他，一准儿能成。"原来，宋哲元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而西北军的将领多数都是张伯驹父亲张镇芳的下属，与张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张伯驹和宋哲元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宋哲元

果然余叔岩愿意买张伯驹的面子，他们两人不但是师徒，而且张家的盐业银行几乎是余叔岩的总后勤部，张伯驹又是北平京剧学会的赞助人。再说，余也十分佩服张伯驹的为人，几方面的原因使得他不能驳张的面子。宋哲元一看余答应了，便点了一出难度极大，听着又极过瘾的戏码——《打棍出箱》。余叔岩已久不登场，为了演好这出戏，他日夜排练了一个月。到了堂会那天，北平市的达官贵人、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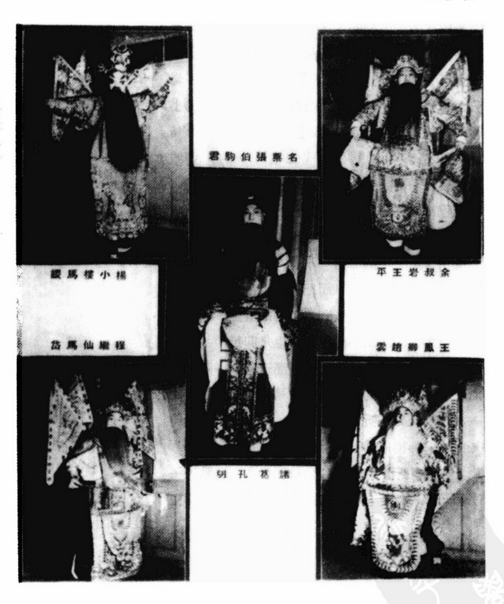


宋哲元的手迹

名流、连各路的名角全都来了，把中南海宋哲元的宅院挤得满满的。余叔岩是个要么不作，作就要作好的主儿，所以那天使出全身解数，使台下的人听得荡气回肠，大有绕梁三日之感。

1937年，张伯驹四十岁整寿，他的一群篾片朋友忽发奇想，想要邀请余叔岩为他配戏，彩排一次。张伯驹自然求之不得，可是，又不愿意开口，于是由别人出面在一次宴会上提出请余在《空城计》里面，为张配一个王平。余叔岩给张伯驹说戏不过是哄他玩儿，哪里当真会陪他唱戏呢？可是又不好当面驳他的面子，只好指着在座的杨小楼说，只要杨老板同意来个马谡，我这里没有问题。其实，余知道杨小楼不会唱马谡，所以故意借杨之口来拒绝。谁知，杨小楼虽是武生，却最愿意唱文角，这马谡虽然是个架子花，可不折不扣是个文派人物，在张伯驹朋友们的怂恿下，他居然同意了。余和杨答应后，张伯驹又趁机邀请了王凤卿扮赵云，程继先扮马岱。本来还想请金少山给来个司马懿，但办事的人口气太大，金听了不高兴，当场即回绝了，遂落下一小小的缺憾。到了正日子那天，这场堂会终于在北平隆福寺街福全馆饭庄开演。熟悉京戏的人都知道，余叔岩自从谭鑫培那里学了王平之后，只是在1917年、1920年，陪着他的同业师王君直唱了两次，这不过是第三次上演。当时这场堂会惊动了全国，许多戏迷从南京、上海赶来，北平、天津就更不在话下了。恰

此曲只應天上有　**偉大的空城計**　人間能得幾回聞



当年演出的戏单，戏单曾遍载北京各大戏曲画报，此次演出可谓“艺坛绝唱”，被誉之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值前一年河南大旱，乃以庆寿之名，募捐赈灾。

那天，开场的是郭春山的《回营打围》，次为程继先的《临江会》、魏莲芳的《起解》，接下来依次为王凤卿的《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的《英雄会》，于连泉、王福山的《丑荣归》，大轴是张伯驹（诸葛亮）、王凤卿（赵云）、程继先（马岱）、余叔岩（王平）、杨小楼（马谡）、钱宝森（张郃）、陈香云（司马懿）和慈瑞泉、王福山（二老军）的《空城计》，可谓群星荟萃，极一时之盛举。余、杨、王、程都是当时的超级明星，赶上两个同台已属不易，这次居然四星汇聚！何况是甘心给张伯驹当配角，可见他的身份。不过，台下的戏迷倒不在乎诸葛亮唱得如何，而把目光投在那几个“武将”——尤其是杨小楼和余叔岩的身上。这四人都知道今天的演出不同往常，也是卯足了劲儿，从起霸开始，就争强斗胜，高潮迭起，一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劲头儿。在马谡和王平在山头一场，观众为了听二人的盖口（对白），场上鸦雀无声，静得连掉一根针都听得见；过后又是掌声、叫好儿声不绝于耳。余叔岩以严谨取胜，每字每句都一丝不苟，简直是一幅工笔画；杨小楼则气势磅礴，完全是神来之笔，乃一幅大写意。戏迷们事后连呼，此曲只当天上有，人间哪得听几回，这一辈子没白来！张学良的幕僚吴泰勋曾现场拍了电影，后来，他的全部家财落在日本人手中，他都不以为意，而这部电影胶片不知去


张伯驹在《空城计》中饰演诸葛亮。

向，却使他痛惜不已。

张伯驹在这场喧宾夺主的演出之后，虽然出了票戏天下第一的风头，但事后仔细咂摸滋味儿，也不免有空虚、落寞之感慨。张伯驹在晚年把他从七岁开始看戏到二十九岁跟余叔岩学戏直至八十二岁所唱过的戏曲以 177 首绝句编写了一本名叫《红毹纪梦诗注》的诗集，在谈到福全馆的这次堂会时，他回忆道：

> 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
> 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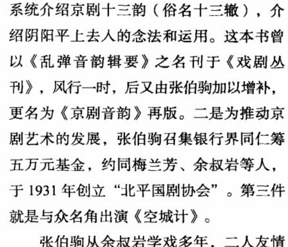
张伯驹票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一部《近代剧韵》，总结京剧发展实践，



余叔岩（左）和钱金福上演《宁武关》。

系统介绍京剧十三韵（俗名十三辙），介绍阴阳平上去人的念法和运用。这本书曾以《乱弹音韵辑要》之名刊于《戏剧丛刊》，风行一时，后又由张伯驹加以增补，更名为《京剧音韵》再版。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的发展，张伯驹召集银行界同仁筹五万元基金，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 1931 年创立“北平国剧协会”。第三件就是与众名角出演《空城计》。

张伯驹从余叔岩学戏多年，二人友情深厚。余叔岩晚年嗓子不好，不能经常演出，即由张供应其生活。余家食指浩繁，还要维持剧团班底、配角，开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张伯驹一直口无怨言。





杨小楼在舞台上的扮相。

张伯驹和杨小楼（1878—1938）的交情也非同一般。那次堂会上，杨小楼肯帮衬出演马谡一角，张伯驹一直认为是自己一生的殊荣，没齿难忘，为感念他的好处，曾送给他一辆新汽车。

杨小楼不但是武行里的泰斗，还是个令人钦佩的爱国艺人。1936 年春天，日伪冀东二十四县长官殷汝耕在通县做寿，办了个盛大的堂会，特地到北平来约角。那时梅兰芳在上海，余叔岩因身体不好已多年不唱，请杨小楼捧场自然是意料中事。约角的人以为通县离北平不过四十里路，坐车还不到一个小时，而且出的是双倍的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
東峰遠近山河淨逶
迤城闕重秋聲萬戶
竹寒色五陵松有客
歸歟歎淒其霜露濃

志城先生雅属即希　方家正之
甲戌秋日　小楼杨嘉训学隶于北平

杨小楼的书法。那时的演员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都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以求在舞台上创造出更完美的形象。

包银，杨老板一定是乐于成行了，岂料却碰了钉子。约角的疑心杨老板仍嫌钱少，竟应允他要多少给多少，可是杨小楼终于没有答应。1937年，北平沦陷后，杨小楼就息影舞台，不愿给日伪政权粉饰太平。

1938年阴历的正月十五，杨小楼去世，杨无子，其女婿刘砚芳请张伯驹代为找人题主。所谓题主，也称点主，即在为死者写木主牌位时，将“某某之神主”主字上面的一点空出不写，然后，在点主仪式上，请一中过进士有功名的人，如任职翰林院、礼部、国子监、学政等处的官员是最相宜不过，拿朱笔添上那一点。有身份的人家，还要请状元宰相，或是翰林宰相来点主——自然点主不是白点的，非要送一个大红包不可。点完主，点主人把朱笔往后一扔，众人争抢那支朱笔，据说可以避邪云云。再说，张伯驹和杨小楼交情极厚，乃请来学界闻人傅增湘为杨题主，傅是翰林出身，曾在前清做过直隶提学使，

民国时做过教育总长，身份是再合适不过，总算把杨小楼的丧事办得风风光光。可是，有些人在一旁说风凉话，道："杨小楼不过是个戏子，他怎么还要题主？"当时，正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华北沦陷，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组成华北伪政权，汉奸王克敏（1873—1945）当上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此前，王克敏正好作寿，广发请帖，设宴庆生。张伯驹遂对曰："王三老爷汉奸能作寿，杨大老爷伶人就不能题主了吗？"一句对仗式的语言把那些人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一时传为梨园佳话。

1942年，张伯驹不堪在日本人政权底下生活，决定西避长安——如前所述，因西北军与他们张家有深厚的渊源。临行前，他去看望亦师亦友的余叔岩，那时余已确诊患了膀胱癌。张伯驹知道这是生离死别，与余默然相对两个小时后，凄然离去。1943年，余叔岩去世，张伯驹挽之以联曰：

> 谱羽衣霓裳，昔日悲歌传李峤；
> 怀高山流水，只今顾曲剩周郎。

张伯驹途经西安，游览一番后又西去兰州——中途又游了青海，恰钱宝森、王福山等人同行。当时避乱在此的人，都想观赏京剧以解乡愁，因此各处皆有票房组织。张伯驹凑趣也加入其中，演出了八场，既过戏瘾，也解乡愁。



杨小楼出殡时，请来北平有名的"一撮毛"洒纸钱，以至许多人为了看一撮毛，跟着出殡队伍走了很远。

流人此地有周郎，觞咏何知在异乡；
青海一游归路远，赶回黑夜尚登场。

之后张南下入川，在成都游览了武侯祠，有《扬州慢》一阕记之：

丞相祠前，锦官城外，下车拜问前程。尚森森翠柏，映草色青青。似当年、纶巾羽扇，指挥若定，谁解谈兵。看江流石在，寒滩犹咽孤城。　　吕伊伯仲，贯精诚神鬼堪惊。系一发千钧，三分两代，生死交情。忍诵杜陵诗句，还空听、隔叶鹂声。正中原荆棘，沾襟来吊先生。

在成都他还会晤了张大千，同观川剧——张伯驹不但喜欢京剧，对地方戏如川剧、豫剧也都喜好，原来其唱腔虽然不同，表演艺术却有相通之处。后至重庆，适逢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六十寿辰，张伯驹演了一出《盗宗卷》为贺。

张伯驹伉俪还游了昆明，在黑龙潭留下一阕《扬州慢——昆明黑龙潭观唐梅》，抒发胸中的感慨：自诸葛亮到吴三桂的千余年间，历史嘲弄了多少英雄人物。

金马峰高，碧鸡关耸，大州旧郡云南。作西川锁钥，蔽上国屏藩。更滇海、波涛百里，汤池堑限，津塞泥丸。自诸葛七纵，千年蛮汉相安。　　九华殿阙，是吴家、赚了圆圆。笑返旆三军，冲冠一怒，却为红颜。成败尽如春梦，问今日、几换江山。只唐梅无恙，依然开落空潭。

1944年，张伯驹刊行《二进宫剧谱》，其中生宗余叔岩，旦宗陈德霖，净宗裘桂仙，本计划续出多种，但没有实现。

1945年光复，张伯驹回北平后又去沪。李少春也在上海，李因他曾拜余叔岩为师，但会的戏不多，听说张来沪，遂拜在他的门下，又学了《战樊城》等余派剧目。

张伯驹在上海期间，时常来往于苏杭之间，一次游西湖遇雨，避入一别墅亭间，见到亭中先有一人，携一佳丽雨中吹笛，情景如画，便诗兴大发，作《临江仙》一阕：

游西湖，遇雨，避一别墅亭中，先有一人携丽于雨中吹笛，情景如画，词以记之。

垂柳阴阴雾锁，湖天漠漠烟笼。胭脂染透小桃红。鱼儿三尺水，燕子一帘风。　亭榭谁家寂寂，楼台到处重重。一声玉笛破空濛。山光微雨外，人影落花中。

四、伯老力保传统戏

现今，对张伯驹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无偿捐献国宝文物的事情，其实，力图留住传统文化中所有美好的事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直是他做人的最高追求。章伯钧曾经对女儿说过张伯驹："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别以为说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玩儿政治出身的章伯钧所谓的"没有出息"，自然是反话，指的是政治上不思进取，换言之就是没混个"一官半职"。

岂不知这正是张伯驹高明的地方，北洋政府的官他不做，国民党的官他也不做，因为他自知自己的性格、爱好不适合进入官场。与其

在龌龊的官场中摸爬滚打，不如在文化圈子里面流连徜徉。不料，在共和国最初的岁月里，就没有不和政治沾边的事儿，你想要远离政治，政治却紧追你不舍。于是伯老也陷了进去。

话说，当年康生找张伯驹借画的那天，曾经对他说："听夏衍同志说，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可要多担一些啊。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之类。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牵头，搞点现代戏。毛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看。听陈毅同志说，你也登台唱过《空城计》，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你看怎么样？"张伯驹推辞一番，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康生走后，张伯驹考虑再三，写了封信给康生，谦称自己水平有限，难以胜任，明白地推辞了。不久康生回信，也不再提起现代戏的事情，只是给他写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十六个字。旁边有其妻曹轶欧写的一行行书："值康生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归来，兴酣而草。"张伯驹看了半晌，不解其意，只好说："字写得不错。"

张伯驹就是这样的"不识抬举"！一个"中央领导"屈尊纡贵请他出山，竟然不愿意干。

张伯驹对传统戏的推崇不是没有道理，传统戏中固然有些糟粕成分，但其主流仍是健康的。

抗战时期，张伯驹从北京去西安，途经河南周口（当时称周家口），看了一场当地的南阳曲子戏。剧情讲的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位朝官的亲属在乡间为非作歹，欺压民女。女子向县衙控告，反被逐斥。女子又上京告状。一次当街拦下一位官员的大轿，不料此官员乃是朝官的好友，反将民女痛打一顿。女子不屈不挠，再次拦住一位骑马的武官。武官说，我是武将，不理民事，你可找刘墉为你伸冤。不过你



1952 年张伯驹在燕京大学礼堂演出《阳平关》，饰演黄忠。

先要问准是不是刘墉，才能把状纸交给他。某日，女子果然遇到刘墉，拦轿喊冤，刘墉让她将状纸递上来。女子说，我先要请问老爷尊姓大名，才能递状纸。那刘墉唱道："你老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老爷是清官，我叫刘墉。我保过康熙和雍正，又保过二主爷名叫赵乾隆。"虽然乡间小戏令人捧腹，但却体现了民间朴素的爱国情操。在他们眼中，皇帝还是姓赵，而二主爷正是宋太宗赵匡义。据说那时河南人最爱看红脸戏，红脸就是宋太祖赵匡胤。自然他们怀念的是定都开封的大宋朝，因为灭掉宋朝的是金、元的异族统治。

其实，大多数传统戏都是寓教于乐，传递了爱国之微言大义。

江青之流奢谈革命现代戏，似乎只有他们懂得爱国，只有他们才配谈革命，实乃浅薄而又专制。须知，爱国之情寓于言传身教之中，而不是光喊口号光靠作秀就能奏效的。记得当年彭真赶时髦曾有一句

名言，现在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你们还留恋几百年前的封建主义，脖子伸得这么长，不觉得别扭吗？结果不到三年就被毛泽东赶下台去。如今，现代戏已经销声匿迹，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毕竟还是传统戏。

因为力挺传统戏，张伯驹遭了厄运。

1956 年张伯驹献出八件顶级的国宝级文物，不料第二年就被划为右派，受到大会小会的批判，虽然他仍不服气，批判会上仍理直气壮地反问，结果可想而知。





从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刘海粟

第五章

说真话者大沉沦

解放前国民党派人去他府上游说，劝他飞往台湾，他没有同意；后来又安排他到美国定居，他毅然拒绝。解放后他把自己的大量收藏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一生繁华落尽，归于平淡。在反右运动中张伯驹落难了，但他不以个人得失而惶惶不安，依然沉迷在他所衷心热爱的文化事业之中。

一、可怜中州老词人

1957 年夏天，戏剧界的“反右运动”是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的。为了罗织罪名，左派人士擅自把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大鸣大放的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吓人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十四期发表。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剧作家曹禺立即作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批吴祖光。戏剧界老大田汉也落井下石，著文批判吴“包藏祸心”，“一贯对我们的制度有反感”。

戏剧界的下一个右派就是张伯驹。

说起这两人还有许多的相似。

吴祖光于 1954 年举家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他父亲吴景洲将其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用了三天时间亲自鉴定，241 件文物装了几汽车拉到故宫博物院。但是三年后就成了右派分子，从此 22 年不见天日；其妻新凤霞因拒绝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诱劝，不肯与吴祖光离婚而得罪了刘，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56 年，张伯驹发起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和“北方昆曲剧院”，他看出，自四大徽班进京以来，经过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及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等名角掀起的两次高潮之后，京剧已成了强弩之末，临近曲终人散的时候。为了挽救濒临绝响的京剧艺术，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在音乐堂组织观摩演出，他出演了《盗宗卷》。他不但自己登台演出，也组织老演员挖掘一些传统剧目。

文化部要求挖掘传统剧目的号召，使痴迷京剧的张伯驹欣喜若狂。他对文艺突出政治早有看法，他认为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文艺是为了欣赏，为了陶冶性情，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他曾比喻说：“譬如炒了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问题吗？吃饱了，吃好了，工作有精神了，这就是政治了。”

1957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4月10日，文化部组织“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周扬在24日的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工作、怕群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还说，“戏改”这个名词已经成为过去，因为戏曲工作者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还要改到何时？坏戏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开讨论云云。最后他归纳了“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演出，重点加工”的十六字方针。《文汇报》还发表了“为剧目大放手欢呼”的社论。

作为文艺工作的高级领导，周扬的这番话听在张伯驹的耳中，特别悦耳。

张伯驹一直为一批优秀剧目被禁演而忿忿不平，因为他深知被禁的这批传统戏的艺术价值。例如《宁武关》中周遇吉有一段声泪俱下的唱段，还有扎实的武功，以及唱、念、做、打严紧的衔接，确是一出表现演员功底的优秀剧目。又如《祥梅寺》以武打为主，许多优美的舞蹈动作，没有长期的训练，一般演员很难胜任。

此前几年，他就曾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等近百名艺术家上书，要求改变文化管理部门鄙薄传统文化的倾向，成立独立的京剧、书画等组织，以发扬国粹。此次文化部发出的信号，使张伯驹大为兴奋，他召集老艺人，重排一些包含高超绝技的传统剧目。张伯驹重点筹划了三出戏的挖掘整理，即《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

其中，他尤其关注《马思远》的解禁复演。


年轻时的小翠花


于连泉便装像

《马思远》一剧是老演员于连泉（1900—1967，花旦演员，艺名小翠花）的拿手戏，他也为此剧目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马思远》又名《海慧寺》、《双铃记》，其剧情描写一个叫王龙江的人在北京马思远饭馆，给大厨当下手，每年只三节回家。其妻赵玉儿不甘寂寞，闲游海慧寺，与卖绒线的货郎贾明勾搭成奸。年终王龙江自京回家，半路酒醉，遇见好友甘子迁，甘见他囊中丰富，便向他借钱，被王龙江所拒。甘便尾随王回家，想要趁机盗他一笔。王回家后，贾明被堵在屋里。赵玉儿连忙把贾藏匿在缸里，后趁王龙江酒醉，用刀将其杀死，将尸体掩埋。这一切被躲在暗处的甘子迁看到，连忙逃走。赵玉儿唯恐王龙江经久不归北京，会启人疑窦，反到京诬赖马思远害死了亲夫，涉官成讼。问官不能明，展转上控至巡城御史，恰逢甘子迁因犯夜禁被押，乃将目睹之实情说出。堂官逮捕贾明，严讯赵玉儿，马思远的冤情得雪。小翠花饰演赵玉儿一角，极其泼辣，其实他本人却是极为懦弱巽顺的谦谦君子。小翠花自从年轻时就以演《海慧寺》一剧闻名遐迩，每演必满，后来又传给他的徒弟毛世来。

小翠花与他的搭档雷喜福、高富远、王福山、李洪春等人有十多年没有碰这出戏了。他从九岁登台至1949年，在舞台上度过了四十多年，可是一搞戏改，首先所有踩跷的戏不能演了，接着文化部又禁演了一批——其中很多是他最能叫

座的剧目，戏改的清规戒律使他无所适从。他解散了自己的戏班子，深居简出，几乎是冷藏起来了。

张伯驹痛惜人才，也珍惜前辈们留下的艺术精品。他组织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计划每星期演出一场传统剧，自然《马思远》也名列其中。可是正当演出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主要演员们几乎准备就绪的时候，北京市文化局又通知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暂时不准公开演出。张伯驹对这种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作风极为反感，他一面让王福山等继续准备演出，一面向上面提出申诉。最后在几位记者的参与下，决定作为内部观摩演出，先演几场，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个方案也得到了文化部的批准，于是《马思远》在新侨饭店礼堂登台上演了。《马思远》剧本是清代根据实事改编而成，也可算那时的“现代戏”了。剧中为吸引观众增加一些噱头——市场效益嘛，那时剧团又没有政府补贴。其实，所谓的色情成分比起现在电影里面的裸戏、枕头戏来，要自叹弗如多了。

5月18日，演出那天晚上，除了文艺界人士之外，还请到了中央首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作为组织者，张伯驹致了开幕辞。明白人已经看出，此戏公演恐怕不大可能。可是，演员们从赢利角度出发，还是自行上演了几场。

很快，反右开始。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联名发表文章，倡仪戏曲界不演“坏戏”，因《海慧寺》剧中有淫杀恐怖成分，“研究社”被指为始作



四小名旦之一李世芳。李世芳宗梅派青衣，极有艺术潜力，可惜因乘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只活了二十六岁。



四小名旦之二毛世来。毛世来先学小翠花，后又拜荀慧生为师，结果谁也学不像，艺术魅力大减。看来博采众家之长和见异思迁的界限还不大好掌握呢。


四小名旦之三张君秋。在四小名旦中，张君秋的艺术成就最大。


四小名旦之四宋德珠。宋德珠学的武旦，因戏路过窄，中年嗓子又塌中，只好重操旧业，到崇文门开茶馆去了。

俑者。张伯驹等几个人被牵连进去，成为戏曲界最早的“右派”。1957 年 8 月 30 日、31 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人们批判他挖掘整理的旧戏《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宁武关》又名《别母乱箭》、《一门忠烈》，说的是明末李自成起义时，明将周遇吉失守代州后，突出重围回到宁武关探望母亲，母亲令他回去再战。周遇吉出战后，周母与全家自杀，以示殉国决心。周遇吉与李自成军死战，被乱箭射伤后，自刎而亡。《祥梅寺》写的是唐末黄巢起义之事，祥梅寺和尚了空从阴间小鬼处得知，自己将要被黄巢祭刀，便隐藏在庙前的一棵大树的树洞之中。谁知，黄巢聚众在庙前誓师，以树试刀，将了空劈为两截。本是宣扬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与政治根本扯不上关系。可是那时就是讲究“上纲上线”，凡事都要从“政治高度”看问题。

张伯驹不服，质问批判他的人：“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自然，左派们有的是“理论”在等着他：“我们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不是周遇吉全家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有人说，张伯驹如此固执地叫板，是因为从这几出戏的命运，他感觉到了传统文化衰败的信号。因此，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不过，他这一次

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政治运动来了，人人都忐忑不安，心地善良的人、心怀叵测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真正有正义感的人可能会出来抗辩（少而又少），起码是保持沉默；大多数随大流的人不得不发表些应景的讲话、文章之类，批判一下，算是表态——表明拥护共产党，与“右派”划清界限。而那些想要借机向上爬的人，就要很好表现了，例如一位要求进步的名演员竟然刻薄地指着张伯驹说：“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似的！”

张伯驹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之后，他“北京市民盟委员”的资格被取消了，其他的这个协会、那个学会的兼职虽然没听说取消，不过人家也不找他了。过去门若庭市，而今却是门庭冷落，张伯驹尝到了“人情冷暖”的滋味。

伯老无可奈何叹道：

> 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
> 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

伯老是宠辱不惊的主儿，多少金钱、荣誉不会使他动心，这点挫折他自然也不大放在心上。一天荀慧生奉命参加批判他的大会，会前，荀慧生和张伯驹邂逅，二人行“道路以目”之礼。回去后，荀对夫人张伟君说：“看来张先生禁受得住，不要紧。”1980 年，荀慧生逝世，伯老为此难得的知音挽以：

> 歌舞全休，旧梦重寻无旧雨；
> 尘寰永隔，留香犹在不留人。

二、落魄之人君子交

张伯驹相交天下，大都是出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1957年之后，中国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与戏剧界右派张伯驹成了好友。

章伯钧（1895—1969），生于安徽枞阳县后方乡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6岁那年，章伯钧的父亲不幸溺水身亡，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他们的两位叔叔抚养成人。

幼年的章伯钧先入私塾读书，一年后才进入乡间的育才小学。又入桐城中学，1916年，章伯钧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即武汉大学前身）英语系。时值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章伯钧的思想也受到了巨大的震荡。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用科学和民主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有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922年，章伯钧以公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朱德，在朱德介绍下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小组副组长。

1926年，章伯钧学成归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北伐时，章伯钧从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军长是朱德）。大革命失败后，章伯钧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不久，起义军受到挫折，章伯钧遂与郭沫若、茅盾等人一起离开军队，

他到了香港，过着流亡生活，从而脱离了共产党组织。

1933年11月，章伯钧到了福建，与国民党左派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一起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蒋介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伯钧被推举为政府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提出：“为完成农工民主革命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着想，应实行‘计口授粮’试点。”他的办公室也成为福建人民政府内最拥挤和繁忙的地方。正当章伯钧大展宏图之际，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下失败了，章伯钧被迫第二次流亡香港。

章伯钧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一起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与国民党、共产党有别的“第三党”，其主要骨干力量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者，另一部分是从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等人。

说起来邓演达是当代一位杰出的革命思想家与实践者，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即“前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章伯钧深受其影响。

第三党从建立那天起，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视为讨厌的“第三者”。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害于南京。章伯钧是邓演达的忠实继承者，他曾对农工民主党同仁说，我们要像寡妇守节那样坚守邓演达的理想与学说。

1935年，章伯钧在香港时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建为“农工民主党”，同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章伯钧的抗战热情被鼓动起来，他再次回到内地投身抗日，曾奔走于重庆、武汉及广东等地。1939年起，他开始筹建民盟。1941年，正当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第三势力也获得很大发展，它在当时处于国共两党之间，

起到一种特殊的调停作用，为此，当时的“三党三派”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救国会）联合起来，于3月29日秘密组成“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他们的宗旨是：“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章伯钧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

抗战胜利后，民盟为促成国共谈判、筹建政协奔走，作为民盟首脑的章伯钧是相当积极的。1948年9月12日，章伯钧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应中共邀请赴东北，并于1949年2月25日抵达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的筹组工作。6月15日到19日，新政协举行筹委会，章伯钧是21名常委之一。从此，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作为民主党派，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部分。

章伯钧参加人民政协以后，立即被中国共产党委以重任，在筹组阶段，他负责参加起草著名的《共同纲领》，这实际上是共和国的临时宪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章伯钧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这时候的章伯钧，真是春风得意，他每年都要赴各地视察、出国，还出席了世界和平代表大会。

反右刚开始时，章伯钧尚心存侥幸，以为按自己的资格，可能还不至于成为共产党要打击的右派。他在1957年6月14日题名为《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中说，他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令人听起来觉得滑稽，因为在毛泽东眼里，章才是右派分子们的“主帅”。同时，他还在《光明日报》上以社长的身份发表《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论，公开批判刚刚被毛泽东点了名的“右派”、他两个多月前亲自任命的、手下最得力的总编辑储安平！

章伯钧被毛泽东定性为“章罗反革命同盟”，成了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当局一度准备将其投入监狱，毛主席没有同意，还大度地保留了章伯钧一些特殊待遇，如四合院、汽车、警卫、服务人员及厨师等等。虽然已是门庭冷落，但时而还有同病相怜者造访这昔日的显赫要员。来访者照例要在传达室登记姓名。这其中有位文学圈子里的人叫冯亦代。

冯亦代原来是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又是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和北京市人大代表。1939年，他在香港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1941年在重庆参与创办“古今出版社”、“美学出版社”，1945年在上海创办《世界晨报》。1949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他不是共产党员，自然不能担任社办公室的主任，只能以副主任的名义代理主任。他在“反右”中在劫难逃。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以“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为题刊出长篇材料，宣布已将他划为“右派分子”。其“罪行”主要有，煽动平时“心怀不满”的人向党“进攻”、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党员领导干部等莫须有的罪名。

因为处境相同，冯便成了章家的常客。谁能料到章家的会客登记簿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兴趣，自然经常出现在章家的会客簿上的冯亦代也成了一颗棋子。为了了解章伯钧这个全国第一号大右派的内心究竟想些什么，冯亦代被选中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去摸清章伯钧的思想动态。而且采用的是过去搞“地下工作”的方法，垂直领导，保守秘密，单线联系。冯亦代为了立功赎罪，为了早日摘掉“右派”的帽子，只好昧着良心，装作同情者来到章家，在吃喝闲谈之间，套出章的内心想法，然后向有关的领导汇报，这一项工作坚持了好几年。

大概冯亦代真的以为他的任务是正义的、神圣的，还研读了相关的书籍，以提高工作技巧。他在1958年至1962年的日记中记道：“去

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读苏联小说柯兹洛夫所写的《在克里米亚地下》，其中有段写到他装扮成一个农民，但一见别人有西红柿，便急着买了吃，险些暴露了自己，给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做工作的人，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否则便要危害工作。”“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

冯亦代的“工作”对象不止章伯钧一个，还有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潘光旦、浦熙修等著名“右派”。可能是冯亦代的工作颇有成绩，1960年初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为了工作方便，却不公开宣布。冯亦代也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加入共产党，可能是上级觉得还是让他留在党外更有用处，所以他的“组织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文革”一来，“玉石俱焚”，共产党的干部尚且不能自保，冯亦代这点小小的功劳也就不起作用了，与章伯钧一起被关进“牛棚”。章伯钧不明就里，并不知道冯的特殊身份，还将夫人李健生送来的食物分些给他。

或许冯亦代的良心与良知并未真正泯灭，临终前，他在《悔余日录》中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忏悔公诸于众。或许我们不该过分苛求冯亦代，处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其实自从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逐渐地被边缘化，尤其是在毛泽东“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理论付诸实践后，更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可是秉赋着儒家道统的中国文人却偏偏有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结，于是不甘心被边缘化，不愿意话语权被剥夺，便总是寻找机会向中心靠拢。这其中正直者据理力争，大有可歌可泣的人物；但也有些人就不择手段起来，出卖灵魂者有之，捧臀吮痔者有之，告密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便演绎了一部红朝政治下新版的《儒林外史》。

自1949年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其实主要并不是那些文物古迹，甚至也不是死去的若干无辜生命，而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道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试看今日社会上的乱象几乎都是那时植下的根。

按说，张伯驹是民盟成员，而章伯钧是民盟副主席，二人应该早就相识才是。但是，章伯钧留学德国，是学哲学出身，整天黑格尔、费尔巴哈；张伯驹从未出过国门，谈论的是诗词歌赋，挂在嘴头上的是琴棋书画，天天玩儿的是花鸟鱼虫。章伯钧几十年一直忙于政治，组党、开会、办报、写宣言；张伯驹则是风花雪月、管弦丝竹、黑白手谈。再说，章伯钧乃四级干部，属于高干，出入有车，身边有警卫、秘书。张伯驹是布衣一个，东游西荡，无拘无束。所以若不是反右运动给两人戴上帽子，他们至死也不会走到一起。

这事起因于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学习画画，章伯钧想到了小有名气的青绿山水画家潘素，于是两家有了往来。恰巧章伯钧闲来也收藏些字画，日积月累竟有五千多件；二人遂更加走动起来。

在不断的交往谈话中，两人发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竟惊人地一致。

两人也交换对鉴定文物方面的看法。

张伯驹像是遇到了知音，把他收藏字画的苦辛都向章伯钧倒了出来，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所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然而，他们发现虽都是收藏，1949年前后却是两个天地。

张伯驹看过章伯钧的藏画目录后，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章伯钧苦笑说："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的低。所以，不要讲康生、邓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

章伯钧颇有感触地对张伯驹说："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罗隆基、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因为参加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民主党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理，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却打断章伯钧的话，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还是这样。"章伯钧听了，不禁竖起大拇指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从此，两位落魄人经常走动，但多是评评书画，不谈政治。

张伯驹并不因为划为右派而惶惶不可终日，他照样访亲探友，享受生活。1961年中秋时，他有《人月圆·辛丑中秋，同潘素访友，步月归家》一阕：

玉街踏去疑空水，双影似双鱼。冰壶澄澈，纤尘俱净，万象清虚。　　明年何地？家中客里，不改欢娱。无边人世，光明到处，皆是吾庐。

坦荡胸怀，跃然纸上。

应该说，像章伯钧、张伯驹这样的遭遇应算是中国几十万、几百万“右派分子”及其家属中的上上者了。绝大多数的“右派”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有的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有的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即使留在原单位也都改行去打扫卫生，清扫厕所；甚至有的因为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被处死。

张伯驹调到吉林博物馆时，章伯钧特意委托时任吉林省副省长、民盟成员的徐寿轩，多予以照顾。自然，章伯钧的一番心意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之后，他们两人只是在张伯驹回京时偶尔见上一面，几乎没有来往了。

晚年，章伯钧以明末清初的吴伟业（梅村）自况，桌上时常摆放着《吴梅村诗集》，随时诵读，凄凉、落寞，加以悔恨、自责的心情不一而足。吴梅村是明末状元，后委身清朝。

1969 年，章伯钧郁郁而终。

首先得到章伯钧死讯的是张申府和梁漱溟；而第一个去章宅问吊的是张伯驹夫妇。张伯驹对章伯钧夫人李健生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不幸，却为他人不幸而恸，是个大丈夫。”李健生感动地说：“张先生，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须知，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去吊唁一个死去的右派分子，的确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余生也晚，然前贤文章轶事，亦有幸涉猎，故于伯驹先生行趾极生兴趣，乃知今世有如斯大妙人，实千秋江山之福祉也。文化之与文化人，文化人之与国家极大极深之微妙关系存焉。

大见识，大手笔，博闻风雅，慷慨大方，京华之张伯驹，言之口舌莲花生矣。

——黄永玉



第六章 公子叹漂泊岁月

命运垂顾于张伯驹，使他历经磨难终于迎来了历史的公正。这一切看来似乎都是宿命。

张伯驹既无贵显之位，又无盖世之功，但人们一直在怀念他，这是张伯驹为人的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魅力，是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那种神奇力量的魅力！

一、伯驹春游至长春

对于右派的处理，根据“性质”严重程度的不同，分为几个档次。最轻的降职降薪，最重则锒铛入狱，张伯驹大概只是中等，被开除公职，回家闲居去了。不过如此一来他的生计陷入了困顿。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是陈毅对他表现出了真诚的友情和实实在在的帮助。

1961 年的一天，张伯驹忽然接到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的一封信，邀请他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原来，这是陈毅的安排，却又没有向他透露出一个字。陈毅见到张伯驹被开除公职，生活无着落；而且一位有用人才弃之闲置，实在可惜。但是以张伯驹敏感的身份在北京安排工作有些不便。于是他想到在吉林的老部下宋振庭。想通过他为张伯驹找一份糊口的工作，也好离开北京这是非之地。

张伯驹不明就里，还跟宋振庭谦虚一番，唯恐自己的“身份”会给对方带来不便。谁知宋振庭已经派人将他调转手续一切事宜都已办得稳稳妥妥，而且还将潘素安置在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甚至连迁移户口、托运行李的事情都一起代办了。临行前，张伯驹为是否与陈毅打个招呼而心怀惴惴，须知自己与陈毅是云泥之判啊，人家是共产党高级领导，而自己是列入敌我范畴的右派，会不会弄个自找没趣？他思虑再三，地位毕竟是暂时的，人情应该是长久的，觉得还是应该向老友陈毅告辞一声，便让潘素试探着给张茜打了个电话。结果陈毅并无歧视之意，反而热情地请他到家里小聚。

饭前，张伯驹将自己的境遇如实地告诉了陈毅。陈毅问他，为何那时不告诉他一声。张伯驹坦言：“此事（划右）太出乎意料之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不过，我也曾想过，自己鉴定古画也有过差错，

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陈说：“你这样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可谓是严冬之中，给他心里一点温暖。现在看来张伯驹的想法不能不说是迂腐，陈毅的说法也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过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他一个陈毅又有什么办法？

潘素直接问陈毅，宋振庭为什么请我们去长春工作？陈毅别有所指地说：“他既然请你们，你们就去嘛，普天之下，好人总是多数。”临别之时，陈毅一再叮嘱张伯驹，若是有了新作一定给他寄来，还送给他一副立轴：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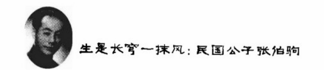
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了。

张伯驹除了早年曾经随父拜访张作霖时到过关外，还从来未曾去过东北，想起那塞外苦寒之地，而且东北虽号称粮仓，但在那个年代，供应匮乏，吃穿不便，不禁心里有些凄然，他在《浣溪沙·将有鸡塞之行，题秋风别意图》吟道：

野草闲花半夕阳，旧时人散郁金堂，如今只剩燕双双。
明月仍留桃叶渡，春风不过牡丹江，夜来有梦怕还乡。

马后马前判暖寒，一重关似百重关，雪花飞不到长安。
极目塞榆连渤海，回头亭杏望燕山，归心争羡雁先还。

自把金尊劝酒频，骊歌一曲镇销魂，回思万事乱纷纷。
镜里相看仍故我，人间那信有长春，柳绵如雪对朝云。



时盼南云到雁鸿，还将离恨寄重重，孟婆何日转东风。
万里边关鸡塞远，百年世事蜃楼空，天涯人影月明中。

词意黯淡惨伤，催人泪下。

到了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博物馆副馆长，因为吉林博物馆初建，并无正馆长，所以张伯驹实际就是馆长。宋振庭告诉张伯驹："长春是伪满洲国皇宫所在地，十几年来，好东西被人买走不少，但散落在民间的还是很多。过去缺少鉴定人才，收购工作没有展开，张先生来了之后，我们可以首先把文物收购工作开展起来。"收藏正是张伯驹的专长，现在得以发挥，他的喜悦可想而知，自从反右之后，他在长春总算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张伯驹上任后即着手整理馆内原来的藏品。同时经过张伯驹的鉴定，吉林博物馆开始收购流散在民间的书画藏品。例如，他曾在公主岭收了一件董其昌的书法作品《昼锦堂记》，其他还有一些明清的扇面等小件。但是作为一个省级博物馆，这里还缺少重量级的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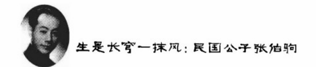
在长春生活的这段日子着实让张伯驹又感到了英雄终有用武之地了，他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考证、鉴定工作，另一方面，又申请宋部长从高等院校调进一批毕业生，从而改变了吉林省博物馆干部队伍的构成和知识结构，在宋振庭的协助下，又邀请了吉林大学教授于省吾、罗继祖、裘伯弓、单庆麟以及长春应化所阮鸿仪等人，组织书画征集、科学研究和陈列展览等工作，在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带领下，吉林省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但是工作上的稍有起色，并不能掩没其背井离乡的悲凉。1961年春节，张伯驹回京度岁，有《定风波——辛丑除夕，与诸词友守岁》：

辽海归来雪满身，相逢容易倍相亲。灯外镜中仍故我，
炉火，夜阑灰尽酒犹温。　明岁天涯应更远，肠断，春来



20世纪60年代，张伯驹在长春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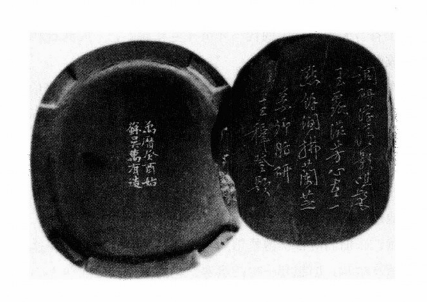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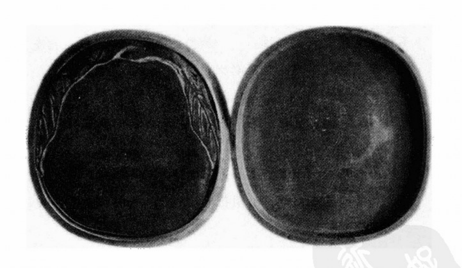
不是故园春。几点寒梅还倚傍，才放，也难留住出关人。

1962年，故宫博物院有三人小组到各省博物馆鉴定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看了吉林博物馆的收藏，一致认为经过张伯驹的努力，吉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小组成员的谢稚柳认出其中有不少是张的藏品，悄悄问他道："伯驹，你的收藏捐得差不多了吧？"张淡然答道："以报知遇之恩吧。"张伯驹就是这样始终怀有一颗诚惶诚恐的感恩之心，这也是他一个守本分之人的本色，说起来实在令人感动。

1963年，随着鉴定工作的有序进行，在宋振庭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博物馆努力地把文物市场上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畬等人的作品购入省馆收藏，把明清书画扇面、成扇和名人书札买来，致力于把博物馆办成某些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中心基地，这两年，每年都有大批珍贵的书画藏品进入吉林省博物馆，在国内地方博物馆中，地位逐步得到提升。这年有个四川人戴亮吉带一块砚给张伯驹看。只见那用珊瑚做的漆盆，制作十分精致，盒底小楷书款"万历癸酉姑苏吴万友造"。砚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纹薛素素像，凭阑立帏前，砚质特别细腻，背刻王稚登行草五绝："调砚浮清影，嘴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后题："素卿脂砚王稚登题"。砚下边刻隶书小字"脂砚斋所藏之砚其永保"十字，依此便知脂砚斋命名的缘由了，张伯驹当即做出购买决定，并收归吉林省博物馆。

1965年，博物馆在长春布置了一次书画展览，但却让张伯驹怅然若失，因为展会上的藏品不全而且精品少。这时，他的耳边隐约又响起了一年前陈毅视察长春时的嘱托："一定要支持这里的文博事业啊！"经张潘两夫妇商量后，决心把最后一件珍品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及手中另外30多件藏品，其中包括宋拓《九成宫醴泉路》、《圣教序》等著名碑帖，悉数捐给吉林省博物馆。在张伯驹的倡导下，宋振庭部长捐了金代末期画家何澄的《归庄图》，阮鸿仪捐了元代赵





薛素素脂砚

孟复《种弘书扎卷》、《宋元名人诗笺册》、明代孙隆《晨鸟草虫图卷》，于省吾先生捐让了明代马守贞《兰花卷》，一时间吉林省博物馆书画收藏发生了重大改变。

其实就在他们离开北京之前，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曾找到张伯驹说："能不能把《百花图》留在北京？"张伯驹回答得很干脆："不能！"说明这幅画在他心中的地位。《百花图》是中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一生以书画为伴，后其所有珍品都献给了国家，到了晚年，只剩下这幅珍品成了他精神上的慰藉。但是到了长春，他还是捐给了国家。

虽然，张伯驹对吉林博物馆的工作还算满意，而且他在这里也有了一些新友故知，但想起一生的遭遇，仍然难掩其时时袭上心头的悲凉，他在《蝶恋花》中写道：

却怨春来来太早，魂断王孙，绿遍天涯草。便有东风愁不扫，无情更惹闲烦恼。　　但愿关山音信杳，万一相逢，还怕难啼笑。眼看花枝花渐少，可怜人比花先老。

是的，这段日子是难耐的，他在《浣溪沙》中有充分的流露：

马角乌头一面缘，去如流水又年年，明月那得几回圆。
岂待酒来才更醉，不须花落已先怜，有情只住奈何天。

怕到春来易断魂，满庭芳草立黄昏，落花无语似离人。
九转肠回君念我，万分心痛我知君，红笺忍检旧啼痕。

偶然间，伯驹先生见到了杏花，想起宋徽宗的《燕山亭》，不由得和之，有"难据，断肠句，伤心怕做"之句。

张伯驹很快在吉林省博物馆内成立了“鉴定古代书画组”，以帮助他收购流落民间的文物。长春算是北方文化重镇，所以不久之后，在他身边集聚了一群志同道合者，如甲骨文专家于省吾、历史学家罗继祖，以及裘文若、单庆麟、恽宝惠、穆木天、杨公冀、孙晓野等人。他们借每周一会之机，以文会友，大家都把自己的藏画文物拿出来共同鉴赏品评。后来张伯驹建议，众人每次见面均可以写一篇笔记，无论在金石、书画、历史、轶闻、风俗、游历、考证、掌故等方面有所耳闻，有所心得，皆可笔录下来，以为将来辑录成册。后来同道者越来越多，以至京津沪几地的友朋都来加入，遂定名为“春游社”。而这些辑录的笔记就是名动一时的《春游琐谈》。由于这群志同道合者的勤奋工作，笔耕不辍，《春游琐谈》先后印了6卷，刊登后，在京津沪等地引起很大的反响，而后又陆续的续集了《春游词》。不料“文化大革命”中，“春游社”成了反革命组织，吉林省公安厅暂要立案侦破。侦办人员追问宋振庭与“春游社”的关系，拿过什么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过。弄得宋振庭哭笑不得，只好说，这些人非线装书不看，给他们机密文件可能还不稀罕看呢。可笑立案三年没搞出任何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张伯驹到长春之后，对京剧艺术依旧痴情，曾于1963年与吉林省京剧团团长梁晓鸾同台演出《游龙戏凤》，并且根据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建议，到市广播电台录制了京剧唱段，有《二进宫》和《洪阳调》两出戏，给吉林的戏剧界流下了无限的佳话。

在那个年代，舒心的日子总是显得短暂，1966年的初春显得格外阴冷，不久，张伯驹被撤销了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伯驹又将三国时魏国敦煌太守仓慈写经、元明清诸家绘画等多件文物上缴国家。在那时，张伯驹似乎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白自己，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挚爱。可是国家那时又在哪里呢?

1963 年张伯驹和梁小鸾在长春演出《游龙戏凤》，张饰正德皇帝，梁饰李凤姐。

1966年，“文革”初起。在长春市体育馆的省直文化系统的批斗大会上，所有的“牛鬼蛇神”跪俯在地上，绕场爬行三圈，自然张伯驹也在其中。年近古稀的伯老被人拉着，匍匐在地，艰难爬行。以后，几乎每次批斗会都少不了他，人们传说他的问题很严重，连“中央首长”康生都过问他的案子了。他在长春的家被红卫兵反复查抄，已是家徒四壁，满目萧然。老夫妻枯坐相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如何打发。

1967年，因两首《金缕曲》张伯驹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新老账一起算，以“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与“走资派的马前卒”等八顶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张伯驹夫妇一起被关押在地下室中，张在七号，潘在三号。张伯驹被关，尚有一条荒谬的“理由”，而潘素也被关押纯属是株连了，可是在那时找谁去讲道理呢？潘素明明知道伯老近在咫尺，可是却怕他为自己担心，竟然在两年间没有去隔着铁窗呼唤过一声。没人知道二位老人是如何度过这艰难岁月的，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谈。是啊，那个年代有多少无辜的共和国公民受到不公的待遇，国家主席还不是死于非命。张伯驹在地下室里蹲了近两年，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走出那间不过10平方米的小屋一步，七十多岁的老人能活着，对于他来讲已经是上苍的特别垂顾了。

世事变化正如白云苍狗。

到了1969年，已经没人再注意这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张、潘夫妇被造反派放了出来，大有恍如隔世之感。一贯循规蹈矩、奉公守法的他们连忙去找当初将他们关起来的造反派组织报到。结果那个“组织”已经被取缔了，连造反派“司令”也进了班房，政权机构已改叫“革命委员会”了。

1969年深秋，正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武斗正酣之时。中苏

关系也陡然紧张，并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各地都在“备战”的借口下，疏散人口。副统帅的“一号通令”将已经乱成一团的马蜂窝又捅了一竿子。

1970 年 1 月，张伯驹被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自然潜台词还是“敌我矛盾”。他步履维艰地走出了地下室，结束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回到家中不几日，吉林的“三家村”头领——宋振庭夫妇，来看望张、潘两夫妇，几年的风雨让双方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宋振庭告诉他：“我的问题查清了，正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但中央来了‘一号命令’，要搞战备，疏散城市人口，你们得到农村去，望保重身体。”

就在这个档口，革命群众还不放过他，吉林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要批判梅兰芳，找他去搜罗素材。但是张伯驹先是闭口不谈，实在拖不过去，只说：“我只知道我自己罪大恶极，梅兰芳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

不久，张伯驹办理了退职手续，发配吉林舒兰县朝阳公社双安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饶是在地牢里被关押两年，且连个“退休”都不给他，张伯驹还是将其剩余的珍藏文物，如隋人写经、宋拓碑帖、元明清诸朝书画等悉数赠与了吉林省博物馆。

因为他们夫妇年纪最大，各个公社大队的书记领导们嫌他们老得“只剩下一堆渣儿”，都不愿意接收。即使有个大队要了他们，到了村里却没有农户愿意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最后只好勉强在一个五保户家中找了一间小土房落了脚。两位老人在农村也待了些日子。春天小麦拔节、谷子出苗的时节，老夫妇每天去地里“踩格子”，即将那些小苗踩实，以利将来生长。日子在难熬中一天天地度过。还好，大队支部书记高思庆很照顾他们，安排他们干些轻活儿，还帮他们挑水等等。

几天后，高思庆叫开了他们的房门，嘱咐道：“你们北京不是有

家吗？快走吧，这里的冬天会冻死你们，别带太多东西，要是有人问，就说到县里看病。”高让他俩坐在拉砖拖拉机的驾驶室里，摆摆手，车便开了。公开的理由是，张伯驹属于退职人员，没有工资，不符合插队落户的规定。张伯驹夫妻只好无奈地回了北京。

北京是首都，岂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居住的么？那时还没有花钱买户口一说，于是老两口成了北京的“黑户”，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只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并不在乎，他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自得其乐。

话说，到了 1971 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折腾了五六年之久，真是民生凋敝、天怒人怨。好在天道有常，不欲绝人生路，林彪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自我爆炸，给了沉湎于不断革命中的毛泽东重重一击。也使“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干部、群众暂时舒了一口恶气。

二、避居西秦度残年

张伯驹回到后海家中，有《浣溪沙·回京》描画出了他的窘境。

小巷依稀认旧门，蛛丝萦槛案堆尘，萧萧梧竹易黄昏。
风扫壁琴弦断轸，泥封厨瓮酒空尊，不知客是主人身。

春事不曾到客边，归来已是雁时天，小庭秋意淡如烟。
虫语悲吟中夜后，蝉声梦醒廿年前，一回回忆一悽然。

如梦春光直到秋，春愁未尽复秋愁，斜阳犹自为人留。
尚有孙郎能作赋，不须王粲始登楼，客心多少寄辽州。

君向岭南我向燕，关山才近又关山，不知何日唱刀环。
多感渐成心上病，相逢惟是梦中缘，春花秋月已经年。

夏卉春芳已过时，绿荫渐减叶辞枝，天边秋气助人衰。
头上遮羞惭皂帽，眼前失喜看红旗，老来情味待谁知。

落木晨星数过从，我来此日又秋风，几回杯酒各西东。
新世山河余短鬓，故乡城郭望重瞳，可堪白发尚飘蓬。

左邻右舍间，没几个人知道他的诗词，却都知道他是“右派”。所以刚回来几天，居委会就找上门来，左盘右问，三番五次，一副居高临下的嘴脸。居委会刚走，派出所又来，更是摆出政府的架子，脸色岂止是不好看，简直是面目狰狞。

张伯驹不胜其扰，只好避居西安，住到女儿张传彩的家中，这时他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

1970 年秋末冬初，寒流来袭，冷冻骤逼，北京干冬无雪，张伯驹很想有一株梅花与之相伴寒冬，只是“见肆间有小盆梅初花，欲买囊空无钱。”困顿一至于斯，是他坐拥金山时所不能想象的。感慨之余赋《渭城曲》：

肆间初见小梅姿，风韵依然似旧时。
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空惟剩诗。

古往今来，中国落魄文人经常靠诗词来抒发胸中的感受，而且越是处境艰难，越是创作不止。例如，清代的陈之遴、徐灿夫妇以及吴汉槎等人被顺治帝发往宁古塔期间，写了大量的诗词。张伯驹也是如此，他长春期间填词一百五十余，集为《春游词》；后来在北京无法

居住，来到西安，又填词一百余，集为《秦游词》。

在《秦游词》自序中，张伯驹道：

> 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冠剑佩，意气何其豪横！中年避寇，再居关中，兵火之余，仅存书画，托迹商贾，聊供菽薪、暮岁东出榆关，追步道君、秋笳，铩羽归来，疾病穷苦，乃更入秦依女儿以了残年。老马知途，不谙终南捷径，朱门鼎食，复味首阳蕨薇。此一生如四时，饱经风雨阴晴之变，而心亦安之。时则重到旧游地，作小词，亦不计工拙。盖为残雪剩爪，随笔之所至，幸方家视之勿以词品相衡量也。庚戌初冬，中州丛碧序。

再次将自己比作宋徽宗、吴汉槎，表达了对曾经发生的一切的迷惘。但他又是豁达的，知道荣辱穷通正如四季变化，虽有风云变幻，求个心安而已。在他动身到西安的途中，天下雪了。大雁塔的腊梅开了，他携带着两个外孙去观赏。在西安大雁塔，他写了《鹧鸪天·雁塔》一阕：

> 曾是高标矗盛唐，僧亡香灭锁空房。鸟音似唪多心偈，萤火还疑舍利光。　　听淅淅，视茫茫，惊风无往渭流长。西来秋色今如昔，不见五陵气郁苍。

70 年代初，正是人妖颠倒、万象凋敝之时。张伯驹感叹物是人非，词是怅惘的、凄迷的，也是酸苦的。

虽然处境艰难，但积习和阅历仍然使张伯驹高怀旷放。

他在西安不停地浪游，举凡大雁塔、灞桥、华清池、骊山、秦皇陵、曲江都是他游踪所及之处，连根本没人记忆的工部祠也都去凭吊

了。那可是连今天也很少有人去问津的西安南郊冷落和寂寥的地方，且远在终南山之麓的樊川夹道中；甚至更少为人知的首阳山，他也去瞻仰一回。这是失去故国的人保持气节的地方，他去，心情所感是非常复杂的：

东接终南一望余，孤峰捷径两相殊。野薇自煮何须鼎，
周粟能餐却似珠。　羞灸艾，笑抢榆，更惭腹笥饱诗书。
樊笼柙虎人间世，肯许扬眉向饿夫。（《鹧鸪天》）

在华清池洗浴了两回，除夕，他和女儿一家人在长安守岁："垂老飘零燕寄椽，岁阑客梦在长安，烛盘泪比金茎露，鼙鼓声凝爆竹天。"有喜有悲，悲喜交加，但似乎总有垂老的泪无声地流过脸颊。他在这里度岁了，潘素夫人还在京城，孤独地守着冰锅冷灶。老朋友从北京发来贺岁的诗词，他礼尚往来地和出联句，这友情令他心热，令他焕发出人生的暖意，更加动人。读他的这些诗词，不由使人想起了杜甫，那个乱离中的唐代伟大的诗人，一路逃难一路吟诵。张伯驹的骚人词客的笔是很勤苦的，也许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积习，又是一种漂泊中的自遣吧！

1971年，立春后第一天，张伯驹去大雁塔看雪，看罢雪，就在这一天回了北京。正月十五元宵日是妻子潘素的生日。他特为爱妻潘素填了一阕《鹧鸪天》祝寿：

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情天。打灯无雪银街静，
扑席多风玉斗寒。　惊浪里，骇波间，鸳鸯莲叶戏田田。
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

患难夫妻，老而弥坚。诚然，若是没有潘素这位生活与精神上的伴侣，

张伯驹很难挺过这么多的磨难。

1973年元宵节时，他患了目疾。有《人月圆》一阕：

> 烟中雾外银蟾影，还射到双瞳。上元佳节，踏歌声里，只唱盲翁。　　江山锦绣，楼台灯火，望处朦胧。春光便好，万红千紫，负了东风。

此年冬至后，他又到西安。重过灞桥，再浴华清池也都有词，还是不忘登了雪中的大雁塔，看大雁塔雪中腊梅："佛像无存僧亦亡，年年空落傍空堂。我来踏雪犹相识，不为金身始放香。"他每次到西安，这几处是必游之地，反反复复，词旨感慨愈寄愈深。

1974年夏至后，张伯驹先生借道山西，经太原、介休、临汾，过潼关、华岳、骊山，趋灞桥入西安。这已是他第七次到西安了，长居也罢，短住也罢，都是他的最后一次了。他吟咏大雁塔门前的石狮子，对着腊梅，不禁"记得长安冰雪里，一枝折取到燕台"。虽然此时西安暑热，如火烁沙，他却游兴不减。此行的目的是做眼睛手术，但他不停地转遍了该看的古迹，哪怕是已看了多少遍的地方，他仍然去看。去公园看牡丹，再浴华清池。经医治后，右目复光。七夕，他填《鹊桥仙》给潘素：

>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　　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患难夫妻，雾眼复明，此时百感交集。在一个雨天，他又于华清池中沐浴。毕了，他由洛阳、郑州折邯郸、保定，由卢沟桥回到北京。这是他最后一次到西安了，时年已78岁。世事沧桑，功名荣辱，他都

超脱了，他身轻体健，有飘然御风之感："杨柳青青锁翠楼，秦关曾悔觅封侯。"他也曾是从戎的投笔者，也抱过万里封侯的幻想，蓦然回首，他不是悔，而是失笑了。

三、欲回京师无户口

1970年，张伯驹是北京城的"黑户"，没户口，没粮票，只靠亲友接济度日，与当年豪门巨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他曾有《临江仙》一阕：

> 帘影故家池馆，笛声旧日江城。一春深院少人行。微风花乱落，小雨草丛生。　　驿路千山千水，戍楼三点三更。繁华回忆不分明。离尊人自醉，残烛梦初醒。

著名学者、鉴赏专家王世襄多次去看望，却发现他"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除年龄增长外，心情神态与居住豪宅时"并无差异"。著名画家、"一代鬼才"黄永玉曾对此大表钦佩，赞曰："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1971年10月26日，张伯驹通过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信，道：

> ……伯驹自清末寓居北京已六十六年，70年春，我夫妇奉准退职，听从组织安排至舒兰县朝阳公社插队，……至则大队以我夫妇均已退职，既非干部，且我年逾七旬，……不合插队规定，不予落户。于是折回北京，……户口至今仍未解决。溥溥大地，锥无可立。伏乞能饬属准予报入户口，实

为至感。

……京寓书籍衣物在破四旧时荡然无存，我夫妇所得退职金，经过一年半之费用即将有告罄之虞。

……自恨筋力已衰，但爱国之忱，不敢后人。所学虽皆封建遗产，遵循毛主席批判接受，不割断历史之教导，对于历史文物鉴定整理有所需用，自当忘老忘病，勉贡薄知，以报效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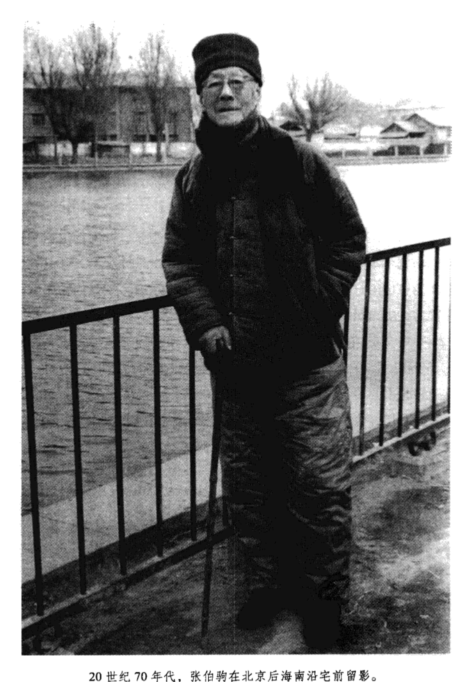
11 月 24 日，章士钊将张伯驹的信转给周恩来，并附信道："钊认为伯驹先生事紧迫，公如许允中央文史馆员，即时发表，可免除该馆员其他一切困难……"周恩来于 12 月 9 日批示道："张伯驹先生可否安置为文史馆员，望与文史馆主事者一商。"

中央文史馆接到周恩来的批示，派人到吉林了解张、潘夫妇的情况。于 12 月 29 日回复国务院，准备接受张伯驹；并于 1972 年 1 月 5 日拟好聘书。

这一切，张伯驹并不知情，在断炊之虞迫在眉睫之时，于 1971 年 11 月 18 日，又致信陈毅，内中写道：

陈毅先生并张茜夫人：

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与潘素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即遭贬黜；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谴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精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以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



20 世纪 70 年代，张伯驹在北京后海南沿宅前留影。

三天之后，张茜回复道：

张先生并素慧夫妇，你们好！

信收悉。

最近几年，仲弘一直关心你们的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信昨天我已给仲弘念了。他因患癌症，在 301 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待秘书，对你们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局面原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当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

1972 年 1 月 6 日，陈毅逝世。

于是，有了 1 月 10 日陈毅追悼会上的一幕，留待后面再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期间，京城人居住防震棚多时。那时各种消息满天飞，人心惶惶，张伯驹却神态自若。一天大清早，欧阳中石前来探望恩师张伯驹，只见张家防震棚中，张伯驹淡定从容，正在一张折叠桌上写字。欧阳中石不由得为他的超脱折服。2008 年，已届八旬的欧阳中石对这段往事还记忆犹新，撰诗曰："襟怀落落意融融，一任烟云化碧空。地裂天崩心似水，穷途不改大家风。"

"穷途不改大家风"是张伯驹的写照。他一生经历多次"天崩地裂"，经历诸多个人磨难，人生落差极大，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古典文化所熏陶出来的博雅通脱、宁静坦然。这一点，令众多名人高士推崇备至，是他们心中难忘的风景线。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是张伯驹的忘年交，两人情谊很深，但彼此交往只能用"淡如水"三字形容。当时周汝昌很年轻，"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

之烦……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

在张伯驹的心中，尊卑贫富，沉浮兴衰，都是过眼烟云。阅读张伯驹，他为人的超脱乃是因为他心中时空坐标的博大，他看事情绝不止于三年五载，他看的是千百年。这使他能够“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也才会在淡看功名利禄之时，将国宝看得无比之重。拥有《平复帖》后，他“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保护此帖……经过多少跋涉、离乱，我都如性命一样地宝藏此帖”。对国宝的态度，可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如果不是领悟到这些，张伯驹就不可能倾家荡产买古字画，“如性命一样地宝藏”它们，并最终捐给了国家。

对张伯驹颇为了解的章怡和写道：“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的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的。”

四、布衣元帅挚友情

值得一提的是，张伯驹与陈毅之间的友谊。

解放初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前往苏州扫墓，回程时应友人之邀到上海小住数日。一个文人聚会上，碰到南社诗人柳亚子。张伯驹谈起一位名叫“仲弘”的诗人，并请柳将自己的诗集转送给他。后来，张伯驹才知道所谓仲弘正是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他很为自己的莽撞

而后悔：我一个民国的旧人怎么高攀起共产党的高官来了。谁知，陈毅很快给他回信了，夸奖他的诗词，寄来自己的新作，还邀请他到家中一聚。从此张伯驹与陈毅成了不羼杂任何利益色彩的朋友，陈毅调到北京后，二人更是时常论诗、下棋。一来二去，他们逐渐变成情谊深厚的挚友。张伯驹夫妻捐献字画后，陈毅更是常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做客，两位先生下棋，两位太太则切磋山水画技艺。

张伯驹精通韵律，才思敏捷，见识过的人说他“写词比说话还利索”，其诗词水平极高，作品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周汝昌曾评价说，“以词人之词论，应当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恐怕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且不论周汝昌的评价确也不确，不过陈毅对他的诗词倒是十分推崇。

客观地说，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陈毅是比较得知识分子之人心者，因为他体谅他们。从下列事实可见一斑，耿介直白的陈寅恪先生并不介意某人官位的高低，他曾将康生拒之门外，周扬勉强得见其一面，而陈毅却受到陈寅恪的欢迎和敬重，陈寅恪表示对其“肃然起敬”。

1970年，张伯驹夫妇从吉林回京，因为当时没有单位证明不能购买去北京的火车票，他们只好借宿在天津张牧石家中。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是“一间屋子半间炕”，于是一条床单将两对夫妇隔开。一次，张伯驹在友人处闲坐，童第周、张牧石等人都在座。恰逢那天陈毅的儿子结婚，童第周让伯驹赶快写一副喜联派人送去。陈毅这才知道张伯驹到了北京。

陈毅元帅去世，张伯驹闻知，写悼诗云：

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遗言犹感激，老泪忽纵横。
日暗旌旗色，江沉鼓角声。东南赤壁垒，忍过亚夫营。

按照当时中央文件，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追悼会原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定为五百人。悼词连头带尾六百余字，简历占去一半篇幅，其中还有“有功有过”这样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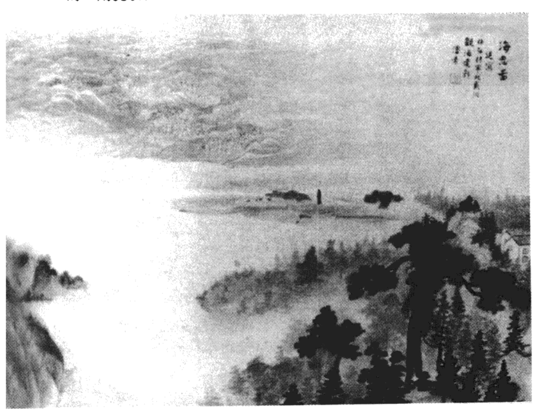
1972 年 1 月 10 日下午，追悼会之前，大病初愈的毛泽东面色憔悴，胡须满腮，双脚浮肿，身穿淡黄色睡衣、足登圆口布鞋，突然出现在追悼会大厅中。临时得到消息的周恩来迅速决定提高追悼会的规格，并立即邀请当时在华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宋庆龄出席追悼会。

毛泽东泪流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摄影记者断断

续续听到毛泽东对匆忙赶来的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反对我……跑苏联……摔死了。”惊得西哈努克圆睁双眼，不知如何做答。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给中国人民立了功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能团结人。他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西哈努克亲王频频点头。在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再次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革”以来蒙受屈辱的所有无辜者。

开过追悼会之后，毛泽东注意到了张伯驹用他那特殊的鸟羽体写的一副挽联：



为纪念陈毅，潘素绘《海思图》，张伯驹题悼诗四首。



张伯驹于1981年在中国书法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献墨宝。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当初张伯驹把挽联送给张茜时曾经说："写这副挽联，只是表示对陈老总的友谊和哀悼，我这样的身份，就不要悬挂了吧。"张茜道："本来我也没有什么顾忌，陈毅死了，我更不怕什么了，我一定要挂出去。"自有几分巾帼豪气。

在毛泽东的追问下，张茜正处极度悲伤中，但还不忘帮助老朋友，

趁机介绍张伯驹无户口、无工作的困境。毛泽东对周恩来交待，要尽快解决张伯驹的事情。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本已确定，不久就正式公布了，潘素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落下了北京户口。张伯驹夫妇终于在首都合法地住下了。旧事搁起，重新来过，这年的除夕，赋《鹧鸪天》词云：

梅蕊绽，柳枝舒，故吾镜内看新吾。
眼前无限春光好，又写人间一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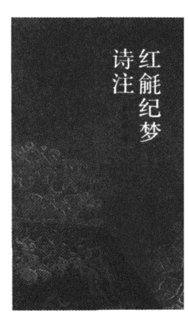
五、续断诗词难为续

张伯驹先生琴棋书画、诗词、京剧、文物鉴定等方面的造诣，为海内外所公认。

但是收藏、度曲尚受到环境的限制，而对张伯驹来说，吟诗、填词几乎是无日无之。无论是外出作客，踏青游玩，酒宴会友，社交观剧，都是得心应手，随手拈来。

1975年，正是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张伯驹曾与朋友造访文天祥祠，写下一阕《满江红》：

绯服黄冠，何足论、只争一死。忍更见、鼎移瓯换，汉官胡骑。报国此心葵向日，称王异种花非紫。已拼将壮志继厓山，传哀史。　　成与败，英雄事。氍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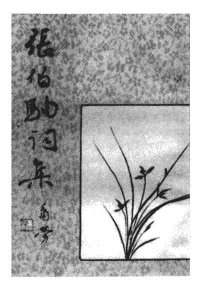


张伯驹 1974 年写成《红毹纪梦诗注》。吴祖光称之为“一部京剧诗史”。



调，商和徵。任神州板荡，独存元气。
天水碧怜白雁谶，满江红恨金牌字。摄
忠魂、息息合吾身，歌柴市。

他从三十岁开始学填词，一生所作达数千阕。其主要作品有：1927—1950年间所作，集有《丛碧词》；后二十余年再集《春游词》、《秦游词》和《雪中词》。至 1974 年，一年之内得词二百数十阕，集为《无名词》。那时中国还在极不正常的动乱年代，自叹道："为知止而止，此后不再为词。……使余心如止水，如死灰，尽忘一生之事。"可是，谈何容易，耳闻目睹，孰能无情，有情岂能不发？于是，又将 1975 年的百余阕，名为《续断词》。



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伯驹词集》。

张伯驹几乎到了无物不诗的地步，在别人视为很平常的东西，在他看来皆可入诗，什么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可有反复地吟唱，细致地描摹。他曾谈到自己作诗的诀窍："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他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诗作积累不少，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蓝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也是诗词，他曾郑重其事地对别人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最著名的诗集要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当年袁世凯欲行帝制，遭全国官民反对，结果帝制不成，自己也羞愤而死。老同盟会员刘成禺曾著《洪宪纪事诗注》，不过刘对这段历史内幕不甚了了，只是凭借报纸所载，以及道听途说，拼凑而成，有许多失实的地方。后来，张伯驹又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每篇后面的注释极详细，而他大多是耳闻目睹，亲历其事，其可信度自然就高得多了。1982 年，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但在付排前，张伯驹去世，未能目睹成书。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他见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忧国忧民，愁思郁结。此时，他与郭啸麓、夏枝巢、黄君坦、关颖人等结为"蛰园诗社"，常相唱和，抒发伤时之痛，如：

> 叹息皇都冠冕，只空余、山色蓟门斜。忍伤心重看，云中城阙噪栖鸦。（《南浦》）
>
> 依恋每瞻北斗，铜驼泣、荆棘神京。欲呼河汉水，一为洗膻腥，寰宇澄清。（《六州歌头》）

1945 年，全国光复后，张伯驹在他的私人花园"展春园"中，与友人汪仲虎、许季芗、陈纯衷等人组织了"庚寅词社"（展春诗社），直到 1957 年为止。1949 年后，张伯驹曾任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许多爱好诗词的青年时与之过从。张伯驹也乐于接近年轻人，时常唱和往



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左三）和童第周（右二）、于省吾（右一）合影。

还。当时，周汝昌也在燕京大学任教，还曾操琴为张伯驹伴奏。

因为张伯驹早年曾参加过天津“城南诗社”、“梦碧词社”，和社中的同好们一直保持来往。50年代，他每年春天都到天津赏海棠，住在友人张牧石家中。和黄君坦、周学渊、夏承焘、寇泰逢、孙正刚、郑天挺、周汝昌等人继续打诗钟、分咏联句。并赠以杜诗“终古海河任枯竭，只应流不尽心源”，以激励、提携后进。

1961年春天，关颖人又在展春园主持“稊园词社”，张伯驹也侧身其中，命题填词《玉楼春》，分得“杜”韵。此时展春园已经易主八年，旧地重游，感慨系之，其词云：

展春旧地谁为主？流水斜阳飞乱絮。华筵岁岁泛霞觞，白发年年添雪缕。

垂杨绿遍伤心树，都是前游曾到处。当时争自识生张，

今日何人怜小杜。

上阕感叹自己华发渐生，步入老境；下阕则嘲讽了趋炎附势的世态。张伯驹曾将杜牧（人称小杜）的《书赠张好好诗》献给国家，在自己春风得意的时候，也是人人争欲结识的风流人物；一旦“落魄”——那时他已戴上右派的“桂冠”，再也无人问津，生张、小杜虽是一人，前后感受却迥然不同。

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宗王羲之字体，共48行，宋徽宗题签，加钤“宣和”印玺并有贾似道的秋壑图章，项子京、梁清标的收藏印，年羹尧的赏观题款。此件系溥仪当年遗失于长春，张伯驹以五千余元购得，从此自号“好好先生”。

说起杜牧的张好好诗，其中也有一段故事。杜牧（803—852），唐文宗大和三年（829），青年得意中了进士之后，在江西沈师传的幕府中认识了十三岁的歌伎张好好。张好好善唱，其歌声响遏行云，穿越街衢，杜牧大大为之倾倒。过了十几年后，杜牧又在洛阳街头偶遇张好好。此时，她已嫁作他人妇，当垆卖酒，不复见当年纯情少女的模样。杜牧自己也是官场不得意，亲朋飘零，鬓发已苍，不由得发出一阵感慨，回去后即写下这首张好好诗。张伯驹写诗的心境大概与当年的杜牧正是合拍。

张伯驹1954年曾有《瑞鹤仙》一阕：

洛阳张好好，也迟暮飘零，琵琶羞抱。清波倚栏照，似依稀相认，者般人老。风流侧帽，算空忆、承平年少。问前游、几换东风，白发乱生春草。

休恼。梅花候我，勒住春寒，残妆犹俏。来迟去早，愁遮住，断桥道。看百年往事，湖山无恙，只是春婆梦窅。又回头、人海长安，债尘未了。

对世事无常，青春难驻，抒发感慨。

1961年秋天，张伯驹去长春，任吉林博物馆副馆长。1962年，张伯驹在长春约集了当时一些老友，如于思伯、罗继祖、阮威伯、裘伯弓等每周相聚一次，在一起研究、考证，面及金石、书画、词章、掌故各方面，随手录下，便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献。后来又约了京津沪等地的卢慎之、陈云浩、叶恭绰、恽宝惠、郑逸梅等共三十六人参加，撰写了《春游琐谈》。全书共有二百六十三则，内容丰富，道人闻所未闻，可补足史乘之不足。

自1961年至1965年，张伯驹在长春任博物馆副馆长时期，写下《春游词》。在序中他写道：

> 余昔因隋展子虔游春图，自号“春游主人”，集词友结“展春词社”。晚岁于役长春，更作《春游琐谈》、《春游词》，乃知余一生半在春游中，何巧合耶！词人先我而来者，有道君皇帝、吴汉槎。穷边绝塞，地有山川，时无春夏，恨士流人，易生离别之思，友情之感，亦有助于词境。彼者或生还，或死而未归，余则无可无不可。沧桑陵谷，世换而境迁，情同而事异。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以是为词，随其自然而已。万物逆旅，尽作如是观。

张伯驹写得轻松，其实内心却有着极大的凄楚与无奈。宋徽宗失国后被金人虏至北庭，至死未归；清初顺治朝的吴汉槎被诬科场作弊，流放至塞外滞留二十多年。张伯驹满怀报国之心，却被诬为“右派”，而且不容有任何申辩的机会，一腔悲愤只好化为诗词。

张伯驹不但对诗词格律极有造诣，还是“打诗钟”的个中高手。

所谓打诗钟乃是旧时文人的一种游戏，清朝嘉道年间兴起于福州一带，林则徐就是此中翘楚。其过程是，每人事先在一纸条上写好一字，然后将纸条团起，杂乱放在一起。每人随意抓两个，约定将此二字嵌入七言联里的第几字，称为“几唱”。同时另置一铜盘，在铜盘之上悬一丝线，下系铜钱一枚。挨着丝线横置线香一根，俟其烧到丝线时，线断钱落，掉在铜盘上面发出响声，如同击钟。此时尚未完篇的就算认输，或是罚酒，或是请客由众人事先决定。

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陈宝琛曾有一著名的诗钟：“天、我，五唱”。

海到无边天做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天”、“我”都在第五字，遣词对仗工整，立意气势磅礴。“文革”前，邓拓曾引用过此联，后被“左派”们当成他的作品，批判他把“党”踩在脚下。

张伯驹也是打诗钟的行家，早年他在北京经常和章士钊、夏枝巢、郑天挺、黄君坦、萧劳诸人在一起分咏诗钟。一次，他抓到“魂、象，六唱”，未等铜钱落下，他已经联成：

天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

又如“唐、水，二唱”：

南唐久已轻孱主，饮水何须认后身。

南唐影射李后主，饮水则暗指纳兰性德——因其诗集名为《饮水词》。纳兰性德是康熙朝的权相明珠之子，其填词功夫堪称有清一代的领袖，因此有他是李后主后身的说法。十四个字里面包涵了许多的

典故，可谓是妙语巧思。

还有一种游戏叫做“分咏”，是几个人各写毫不相干的一“人”一“物”，做成纸阄，随意抓取。每人在限定时间内，将此“人”和“物”分别刻画出来，既不能明指此“人”此“物”，又要前后句搭配合理连贯，其难度不在诗钟以下。张伯驹曾经抓到“状元”和“聋子”分咏，他立时成联：

一朝选在君王侧，终岁不闻丝竹声。

更使人叫绝的是，两句都是集白居易诗句。上联采自《长恨歌》，下联则来自《琵琶行》，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是不可能如此应付自如的。又如咏“医生、八字”：

新鬼烦冤旧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

上联活画一个庸医，下联则是个江湖术士的嘴脸。又如“歌伎、骷髅”：

十二珠帘金缕曲；三千红粉玉沟斜。

他还有许多类似的佳句，如形容落腮胡子：“人面不知何处去”，咏肺结核病人：“扶上雕鞍马不知”等等。

还有一件颇为神奇的事情，可作为诗坛上一段轶闻。

张伯驹的天津词友张牧石先生一次去看望伯老，适逢伯老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处做客归来，有些不胜酒力，闭目躺在沙发上小憩，忽然间，他令张牧石拿来纸笔，录下他朦胧中偶得之一联：

并气同芳，入室芝兰成眷属；
还珠合镜，升天福梅是神仙。

此联妙在，上联（开头四字）出于《论语》，下联得自《汉书》。并将梅、福两人名字中的六个字嵌入其中，上联显然是言及他们当年结为夫妻，下联具体何意尚不得而知。不料，几天过后，福芝芳竟无疾而终。过去曾有“诗谶”一说，伯老的诗笔真是出神入化了。

吟诗填词也给张伯驹带来了麻烦，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他因写了两阕《金缕曲》而被指为“现行反革命”，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尘劫何能躲？奈浮沉，纷纭此世，其中有我。但使污泥莲不染，微笑点头也可。举目尽，烦烦琐琐。虎掷龙拿成与败，在旁观只是乡人傩。论功罪，互因果。　池鱼殃及城门火，更娥姁，牝鸡钟室，居心测叵。富贵岂堪安乐共？不许客星犯座。宁披发佯狂衽左。换骨脱胎非容易，算螟蛉，终竟难成蜾。且争看，一刹那。

不但明白宣泄了对时局的不满，且暗讽江青是篡权的吕后，为自己登台而迫害功臣。又为老伶工钱金福写道：

耆旧凋零叹。想承平，梨园白发，物移星换。龚陈已老长林死，惟有此翁尚健，算留得，灵光鲁殿。脸谱庄严工架稳，看演来，叱咤风云变。须传此，广陵散。　有谁不挡兼昆乱。无奈他，失之子羽，艺高价贱。当日只将师傅恨，为何不教学旦？真活把我家眼现，梅尚荀程皆有党，向谁人，拼命捧花面？空出了，一身汗。

张伯驹在此感叹龚云甫、陈德霖、王长林、钱金福四老的艺术成就得不到新社会的认可，且后继无人，已成为绝响的广陵散。

他这些不合时宜的词作，触犯了“文革”与文艺旗手，因而被指为“现行反革命”，遭关押达两年之久。因诗词获罪，真有些像是《水浒传》里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险些被处死的故事。

张伯驹夫妇都喜欢画画，他的夫人潘素原来文化不高，但她极聪慧，又师从张大千、溥儒、齐白石、陈半丁等名师，所以进步极快。潘素是个极有才情的女子，不但琴筝琵琶海内独步，工笔花鸟、青绿山水也深有造诣，张伯驹曾自谦地说，潘画得比他好，并以《论语》上的句子“绘事后素”刻成一枚闲章，表示甘拜下风。

张伯驹落难后，潘素仍然相伴海角天涯，无怨无悔，始终不渝。

1963 年，值余叔岩逝世二十周年，张伯驹将以前与余合编的《乱弹音韵》增补订正，易名为《京剧音韵》出版，以做纪念。

1974 年，张伯驹患白内障，闲坐无聊，缅怀往事，回忆起自七岁接触京剧以来菊坛的人和事，撰《红毹纪梦诗注》，记录了自己所演的昆乱诸剧，和梨园界的一些遗闻趣事，不但是一部优美的诗集，同时为梨园界留下极珍贵的史料。1978 年，《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80 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希望能在内地出版。但有关方面认为：“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怎么能出版呢？”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纪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局出版。

待那场浩劫过去之后，张伯驹和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大连棒槌岛比邻而居。刘问起：“戴上右派的帽子后，有何感想？”伯老苦笑而言：“先父曾任直隶总督，又是银行资本家，说我是资产阶级，可能还挨边。但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都花在收藏上面。这些东西捐赠国家以后，我已经变成没有财产的教书匠，靠劳动吃饭了。给我戴什么



1980年，张伯驹和丁至云演《打渔杀家》，张饰萧恩，丁饰萧桂英。

帽子，倒无所谓。我是个渺小人物，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我老张捐献了这么多国宝，换来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别人会怎么说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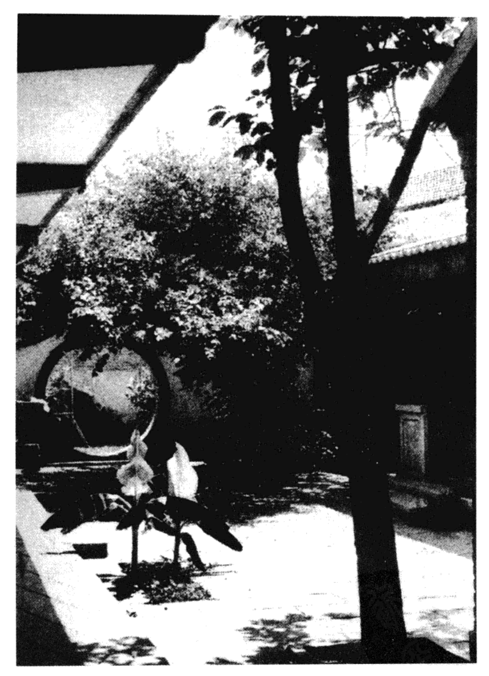
六、桑榆晚景堪自慰

张伯驹时常教育他和潘素唯一的女儿张传彩夫妇，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张伯驹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一生聚散大都用于收购文物。他在西安曾创建的“秦陇实业公司”，1949 年后即奉献给国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情况，他一概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

张伯驹视权力为无物，他虽然是个交际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因爱好多，曾组织或参加了许多的社团，如“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古琴会”等，他在里面大都是担任副职。反右时，有人说他有野心，他说：“我从不想要权势地位，要想当官的话，别说先父在时，就是‘八·一五’之后，孙连仲让我在唐山和石家庄两市长中挑一个，我都没干。我没有那才干，我只能自比侯方域而已。”

张伯驹胸襟坦荡，虽处逆境，安之若素，既不顾影自怜，也不嫉恨别人。在反右运动中，京剧演员钱宝森在批判他的时候，有些过火言辞——其实这也怪不得钱，那时人人自危，也只好自伪以求自保。后来，钱宝森去世，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的赙仪，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十多元左右啦。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张伯驹坚持送一百，说，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北京后海南沿张伯驹最后的居所

80年代以降，随着社会环境的宽松，以及传统文化的逐渐回归，张伯驹的价值又重新被人们所认识，他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但张伯驹依然故我，不改初衷。

有一次，张伯驹要到沈裕君（中央文史馆馆员，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的表兄）家中去下围棋，刚要出门，碰到一位香港来客买了一幅潘素的画，想请伯老题字，并表示愿意多加五百元。不料，伯驹不听钱犹可，听了多付五百，便气冲冲地回答说：“不写，我现在要去下棋！”

1973年，袁世凯之孙袁家骝来华探亲，预定日程中有看望张伯驹的一项。国务院办公室因为他的家里早已破败不堪，准备给他另外安排一处比较像样的住处，以壮门面。张伯驹却答道：“我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何必换地方？”

还有一次，张伯驹在天津勾留，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受其上级的委托，请张伯驹吃饭。这位老先生关请张牧石，转请张伯驹为他在其上级面前美言几句。张牧石不好拒绝，便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了张伯驹。张伯驹却冷冷地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弄得张牧石惭愧不已。

张伯驹作为一代高士，时时感到了落寞，王世襄曾在他的画上题诗道：

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
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一次，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厅偶见张伯驹孑孓而至，黄冷眼旁观，只见张点了一客红菜汤，几片面包，草草食毕；将剩余的面包、黄油用小毛巾裹好，带走。黄评论曰：“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区区十四字，天下几人能做到？

1982年2月初，饱经沧桑的张伯驹仍不时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且不久将有扶桑之行，举行画展。不料一次宴会归来突然患了感冒，不

思饮食，高烧不退，只好于2月9日住进医院——位于后库的“北大医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间的，潘素见这里的几个病人病情都比伯老严重，遂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的病房？院方的答复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张伯驹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着要回家。潘素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医院还是那么讲，说张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这之后，伯老曾六七天不思饮食，仅靠输液维持生命。2月15日是他八十五岁的生日，他忽然神清气爽，想要吃东西。恰逢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在出国前来探望，还与他合影留念。

说起张大千未能留住大陆，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1948年12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翌年1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欣喜不已，佩服共产党的高明决策。2月底的一天，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的临时寓所。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她应邀出席。去北平时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

先生的画最为珍贵，问他是否愿意？

作为一名画家，张大千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张大千很快画了一幅《荷花图》。画高132厘米，宽64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画后经何香凝持往北平，亲手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甚喜爱，悬挂于他的办公室中。原件现藏于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素来倚重张大千的徐悲鸿，托人带来他的亲笔信，邀张大千去北平工作。初接徐悲鸿来信，张大千举棋不定，如果自己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庞大的家族及弟子们恐遭国民党报复。而如果携家带眷而走，显然也走不脱。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1949年9月，张大千到香港办画展。10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顺便游览台湾秀丽景色。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上层人士都有往来。很快局势急转直下，四川也行将撤退。张大千急忙返回成都准备接出家属。回程时，只有三张机票，他只带了四夫人徐雯波与一个小女儿，其余家属都留在成都。从此时直到离世，张大千终未回到故乡。他曾经定居巴西，后来回归台湾。

1957年春天，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说他想回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把这消息很快转告美术界的负责人，叶浅予也听到此事。大概是答复还没有作出来，“反右”就开始了，海外为之震惊。张大千在大陆的一些友人都划归右派，他由迟疑不决直至最后断了回国的念头。叶浅予曾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问道：“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了笑：“那就难说了。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1979年，香港朋友邀请张伯驹夫妇往游，张大千在台北得知后，设法经香港转寄一信：



张伯驹八十岁时书七言对联　　张伯驹八十五岁时书七言对联

伯驹吾兄左右，一别三十年，想念不可言，故人情重，不遗在远，先后赐书，喜极而泣，极思一晤，清言无如蒲柳之质，望秋光临，不得远行，企盼惠临晋江，以慰饥渴，倘蒙俞允，乞赐示敝友徐伯效兄，谨呈往复机票两张，乞偕夫人同来，并望夫人多带大作，在港展出，至为盼切，望即赐复。专肃俪喜。弟大千顿首。



晚年的张伯驹。历经荣辱，张老先生一副超然化外的神情。

后来因故，未能成行，使张大千空欢喜了一场。

1981年，大陆呼吁与台湾谈判，两岸关系出现和缓趋向。

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大千热泪纷纷，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

张伯驹、潘素夫妇合作了一幅画寄给张大千。张大千遂电告其在兰州的孙子晓鹰探望张伯驹，并一再叮嘱晓鹰与伯老合影，把照片给他寄到台湾。

病榻上的张伯驹零星地知道了张大千的一些情况之后，泣不成声，挣扎坐起，与张晓鹰留下一幅最后的照片。下午，张老先生请人录下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阕《鹧鸪天》：

病居医院，张大千兄令孙张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
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
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
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当他吟哦至“还期早息阋墙梦”和“莫辜出处人民义”两句的时候，竟感慨系之，泫然泣下。张老先生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仍然惦

记着祖国的统一大业。2月26日，张伯驹辞世，享年八十五岁。

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在权力面前，这位老兄也只好犯犯肝气罢了。

张伯驹物故后，其好友张琦翔挽之曰：

曾从戎，务实业，主杏坛，工考古，海内公子谁得似？
擅诗词，长戏曲，能书画，识棋道，中州方域自足称。

词人黄君坦挽以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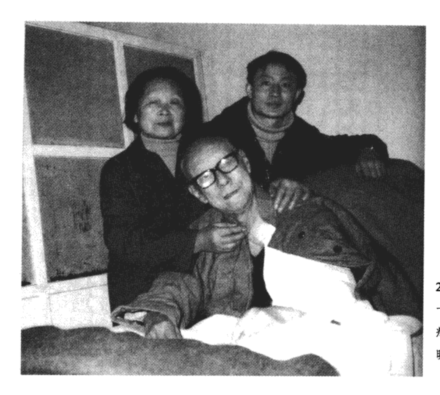
公子翩翩，空城一曲风流尽；
先生好好，文采无双福慧全。

友人，中央文史馆馆员王益知挽之以：

能书盛誉满鸡林，吸取河南登善法；
怀友遗诗吟病榻，难忘台北大千情。

1982年。已过了80高龄的张大千，听说了张伯驹的去世，伤心不已。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于停止在次年的4月2日，终年85岁。

戏剧学家翁偶红先生比喻伯老，"身兼牡丹之富贵、菊花之隐逸、莲花之君子"，可谓是确评。诚如章诒和先生所言，张伯驹绝非仅仅是把文物捐献给国家的有爱国心的收藏家。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广袤无垠，也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风骨气质，他们不是特殊材



1982 年 2 月 25 日，张伯驹八十五岁寿辰，在病塌上欣然与张晓鹰合影。

料制成的，而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正是千万个这样的文化人传承了中国千年的文明，使得中华民族在屡遭磨难之后，仍然屹立不倒。但中国文化绝不固步自封，而以其博大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有益的文化成分，来充实自身；自然也要不断扬弃自身落伍的糟粕。这正是中国文化千年不衰的真谛。



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周汝昌

附录一

张伯驹主要作品与捐献书画目录

（不完全统计）

主要作品

1. 《张伯驹词集》（中华书局）
2. 《春游琐谈》（编著中州古籍出版社）
3. 《红毹纪梦诗注》（宝文堂书店）
4. 《素月楼联语》（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5. 《洪宪纪事诗三种》（张伯驹、刘成禺上海古籍出版社）
6. 《张伯驹潘素书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7. 《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
8. 《丛碧词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 《清词选》（张伯驹、黄君坦选，中州书画社）

捐献给国家的书画珍品

1. （晋）陆机《平复帖》卷
2.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
3. （唐）李白《上阳台帖》卷
4. （唐）杜牧《张好好诗》卷
5. （宋）蔡襄《自书诗》卷
6. （宋）吴琚《杂诗帖》卷
7. （宋）范仲淹《道服赞》卷

8. （宋）黄庭坚《诸上座》帖
9. （宋）高宗书、马和之画《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图》卷
10. （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
11. （元）钱选《山居图》卷
12. （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卷
13. （元）《元五家合绘》卷
14. （明）文徵明《三友图》卷
15. （明）唐寅《孟蜀宫妓图》轴
16. （明）周之冕《百花图》卷
17. （清）吴历《兴福庵感旧图》卷

捐赠吉林省博物馆书画

1. （宋）杨婕妤《百花图》卷
2. （宋）赵伯骕《山水图》卷
3. （宋）《楼阁图》轴
4. 《九成宫醴泉铭》册
5. 宋拓黄庭经册
6. 仇远自书诗卷
7. （元）颜辉《煮茶图》卷
8. （明）来复《行草书》轴
9. （明）薛素素《墨兰》轴
10. （明）曾鲸侯《朝宗像》轴
11. （清）蒋廷锡《瑞蔬图》轴
12. 张祥和花卉轴

13．李伯涵花卉图
14．圣教序帖册
15．（明）杨廷和《诗杂册》
16．心经卷
17．张瑞图字轴
18．周亮工字轴
19．陈洪绶字轴
20．陈古花卉图卷
21．楷书字册
22．（明）文彭字册

附录二

从碧书画录

东坡为王驸马晋卿作宝绘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高士奇云：

“世人嗜好法书名画，至竭资力以事收蓄，与决性命以饕富贵，纵嗜欲以戕生者何异。”鄙哉，斯言直市侩耳。不同于予之烟云过眼观，矧今与昔异，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展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岁壬申中州张伯驹序

目 次

宋　高宗　书马和之画《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图　卷
宋　朱胜非　书札　册
宋　吴琚　杂书诗　卷
宋　杨婕妤　百花图　卷
宋　赵伯骕　仙峤白云图　卷
元　赵孟坚　画水仙自书诗　卷
元　钱选　山居图　卷
元　赵孟頫　章草千字文　卷
元　赵孟頫　篆书千字文　卷
元　赵孟頫　小楷妙法莲华经　卷
元　赵孟頫　倪瓒　兰竹　合卷
元　赵雍　王冕　朱德润　张观　方从义合卷
元　方从义　云林钟秀　卷
元　颜辉　煮茶图　卷
明　陈叔起　王绂合画　潇湘秋意　卷
明　沈周　湖山春晓图　卷
明　唐寅　孟蜀宫妓图　轴
明　唐寅　山水　轴
明　文徵明　三友图　卷
明　文徵明　桃源别境图　轴
明　文徵明　人日草堂诗画　卷
明　文徵明　闽荔吴栽图　卷
明　林良　枯木寒鸦图　轴
明　李东阳　自书诗　卷
明　顾磷　书　卷
明　王宠　书　卷
明　王谷祥　写生　卷

明　项元汴　书千字文　卷

明　项元汴　桂枝香橼图　轴

明　周天球　兰竹　卷

明　董其昌　疏林远山图　卷

明　董其昌　春山欲雨图　卷

明　董其昌　书画　卷

明　陈继儒　雨过云过图　轴

明　文彭　自书诗　册

明　李流芳　溪山秋霭图　卷

清　戴熙　临李流芳溪山秋霭图　卷

明　周之冕　百花图　卷

明　周之冕　芭蕉竹石　轴

明　丁云鹏　佛像　轴

明　陈祼　山水　轴

明　来复　草书　轴

明　郭振明　书　轴

明　项圣谟　花卉　册

明　程正揆　江山卧游图　卷

明　叶欣　梅花流泉图　卷

明　薛素素　墨兰　轴

清　释道济　竹石　轴

清　王铎　书　轴

清　龚鼎孳　自书诗　轴

清　顾眉　兰石　轴

清　查士标　山水　轴

清　吴历　兴福庵感旧图　卷

清　樊圻　柳村渔乐图　卷

清　王翚　观梅图　卷
清　王翚　山水　轴
清　王翚　雪景山水　轴
清　王翚　山水　卷
清　梅清　山水　轴
清　陈鹄　紫云出浴图　卷
清　禹之鼎　纳兰性德侍卫小像　轴
清　黄瓒　张淑　禹之鼎　沈宗敬　陆漻
　　戴本孝　严绳孙　恽寿平　程义　楝亭图　卷
清　恽寿平　山水　册
清　康熙　书　横幅
清　康熙　书　横幅
清　蒋廷锡　瑞蔬图　轴
清　蒋廷锡　五清图　卷
清　蒋廷锡　写生
清　杨晋　兰竹　册
清　华嵒　山水　轴
清　邹一桂　芙蓉鹭图　轴
清　金农　梅花　册
清　郑燮　兰竹　册
清　郑燮　竹石　轴
清　乾隆　瓶梅　轴
清　罗聘　竹　轴
清　董邦达　山水　卷
清　金廷标　接梅图　轴
清　姚鼐　书　轴
清　永瑢　兰石　轴

清　毛上炱　灵岩读书图　卷
清　江介　山茶雪竹图　轴
清　姚元之　秋葵　轴
清　吴大澂　山居图　轴
清　郑文焯　山水　轴

补　遗

隋　隋人写经　册
宋　宋人楼阁图　轴
元　赵孟頫　饮马图　卷
元　仇远　自书诗　卷
明　杨廷和　书札　册
明　文徵明　双钩兰花　卷
明　谢时臣　山水　轴
明　董其昌　翠岫丹枫图　轴
明　唐泰　山水　轴
明　曾鲸　画侯朝宗像　秋江钓艇图　轴
明　杨文　山水　卷
明　八大山人　荷花　轴
清　王铎　山水　轴
清　马雄镇　汇草辨疑　册
清　沈宗敬　山水　轴
清　郎世宁　宫妃像　轴
清　汪士慎　梅花　册
清　黄易　山水　册
清　陶润山　万横香雪　顾莼写雪赋　卷
清　吴昌硕　自书诗梅花　轴

魏　仓慈　五王经　卷

为敦煌石室藏经，共六十三行，笔法古拙，墨色如漆。昔见晋六朝写经渐有此体。后款书“景初二年岁戊午九月十六日，敦煌太守仓慈为众生供养薰沐写已”。所见敦煌石室藏经，当以此卷为最古。

西晋　陆机　平复帖　卷

是帖作于晋武帝初年，早于右军兰亭约百余岁。证以西陲汉简，是由隶变草之初，故文不尽识。卷首有宋徽宗金字标签。自《宣和书谱》备见著录。入清乾隆丁酉，孝圣宪皇后遗赐于成亲王，后归恭亲王邸，为世传，无疑晋迹。金丝织锦，虾须倭帘犹在。宋缂丝仙山楼阁包首已无存。

隋　展子虔　游春图　卷

绢本，青绿设色。是卷自宣和以迄南宋元明清，流传有绪。证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画山水，与是卷画法相同，只以卷绢与墙壁用笔傅色有粗细之分。《墨缘汇观》亦谓山峦树石空勾无皴始开唐法。今以卷内人物画法皆如六朝之俑，更可断为隋画无疑。按中国山水画，自东晋过江，中原士夫见江山之美，抒写其情绪而作。又见佛像画背景自以青绿为始。一为梁张僧繇没骨法传自印度。是卷则上承晋顾恺之，下启唐大李将军，为中国本来之青绿山水画法也。

唐　李白　上阳台帖

太白墨迹世所罕见。《宣和书谱》载有《乘兴踏月》一帖。此卷后有瘦金书，未必为徽宗书。余曾见太白摩崖字，与是帖笔势同。以时代论，墨色笔法非宋人所能拟。《墨缘汇观》断为真迹，或亦有据。按《绛帖》有太白书，一望而知为伪迹，不如是卷之笔意高古。另宋缂丝兰花包首亦极精美。

唐　杜牧　赠张好好诗　卷

樊川真迹载《宣和书谱》只有此帖，为右军正宗，五代以前、明皇以后之中唐书体。而赠好好诗与杜秋娘歌久已脍炙人口，尤为可贵。入南宋，经贾似道藏，后元人观款系由褚临兰亭之观款而移于此卷者。明刻入董其昌《戏鸿堂帖》，清刻入梁清标《秋碧堂帖》。后有年羹尧观款。

予有《扬州慢》一词题于后。此卷曾埋于地下，有一二印章颜色稍霉暗，字丝毫无损。

宋　范仲淹　道服赞　卷

此帖楷书，与伯夷颂并重，行笔瘦劲，风骨峭拔如其人，诚得乐毅论法。三希堂刻帖视原迹神貌远甚。卷中宋印鲜艳夺目，后文与可跋亦极罕见。观此跋书体，可知世传与可画竹之多伪。

宋　蔡襄　自书诗　册

行书，诗十一首，字体径寸，姿态翩翩。有欧阳修批语，蔡伸、杨时、张正民、蒋璨、向志、张天雨、张枢、陈朴、吴勤、胡粹诸跋。南宋经贾似道藏。按，宋四书家蔡书深得兰亭神髓，看似平易而最难学。此册为蔡书之最精者。

宋　黄庭坚　诸上座帖　卷

大草书，真字跋尾，笔势如古藤虬结，所谓锥画沙者似。之后吴宽、梁清标题。《石渠宝笈》为摹怀素帖。经贾似道、严嵩藏，文嘉籍严氏《书画记》云，前作草书师怀素颇逼真，皆禅语也。旧藏于一佛寺，李范庵获之。枝山草书多出于此。自明以来已誉为黄书第一。

宋　王诜　烟江叠嶂　卷

绢本，青绿设色。笔意高古，犹有唐法。是卷载《宣和画谱》，的为晋卿《烟江叠障》真本。当时因禁苏文，东坡题诗经截去。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之《烟江叠障》卷当系晋卿作画而配入苏题诗者。故王凤洲跋谓歌辞与画境小牴牾也。后有元姚枢、明宋濂、黎民表题，清经宋荦藏。

宋　徽宗　雪江归棹图　卷

绢本，墨笔，著微浅绛，布置精密，笔意超绝。是以董玄宰谓迥出天机而疑为摩诘之迹也。后蔡京跋。虽为误国君臣，而艺苑风流，自足千古。王世懋跋云："朱太保绝重此卷，以古锦为褾，羊脂玉为签，两鱼胆青为轴，宋缂丝龙衮为引首，延吴人汤翰装池。太保亡后，诸古物多散失。余往宦京师，客有持此卷来售者，遂鬻装购得之。未几江陵相尽收朱氏物，索此卷甚急。客有为余危者，余以尤物贾罪，殊自愧米颠之癖。顾业已有之，持赠贵人，士节所系，有死不能，遂持归。不数载，江陵相败，法书名画，闻多付祝融，而此卷幸保存余所，乃知物之成毁，故自有数也。宋君相流玩技艺，已尽余兄跋中。乃太保江陵，复抱沧桑之感。而余几罹其衅，乃为纪颠末，示儆惧，令吾子孙毋复蹈而翁辙也。"观此跋，甚似世传《清明上河图》与严世蕃之事，余疑为《清明上河图》事即此图之传讹。按《明史・王世贞传》："杨继盛下吏，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是世贞得罪严嵩，以椒山事为主，因父忬卒以论死。又"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世贞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所部荆州地震，引京房占，谓臣道太盛，坤维不宁，用以讽居正。居正妇弟辱江陵令，世贞论奏不少贷。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即取旨罢之。"与跋

语中"持赠贵人，士节所系，有死不能"及"余几罹其衅"相合。且居正当国，严嵩已败，岂有先有《清明上河图》之事，而后又有此图之事，何一再示儆惧令子孙毋复蹈而翁辙耶？故余论断如此。《清明上河图》之事虽见明人笔记，然无世贞兄弟跋及收藏印。而此卷跋又如此，是不能无疑也。至宋缂丝龙衮引首至为精美，现犹存。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称韩宗伯藏，钟繇摹正考父鼎铭。卷首古锦一幅，长四尺余，青地色，花阑中横一金龙，极鲜美。曾见王敬美徽庙《雪江归棹》卷，亦有如此锦一幅，生平见古锦如此二而已矣。考之周公谨《云烟过眼录》云是宣和法锦，是此缂丝在明代已属稀见。按《雪江归棹》尚有一赝作，尺寸题跋均相同，前隔水无宋内府编号字，无宣政小玺及乾隆题诗，无宋内府图书大印，而卷前后钤以项子京诸伪印，后题跋钤印亦不同董其昌跋，真本为行草，而赝本为行楷，且"遇"字误为"过"字，似为清初人所伪托者。经庞莱臣售于日本，有影印本行世。

宋　米友仁　姚山秋霁图　卷

纸本，墨笔。后赵肃、沈周、王穉登题。载《西清札记》。李日华《画媵》云："元晖虽祖家法，不尽拘涂，辙较南宫，务加明秀。余所藏《姚山秋霁图》断乎蓝田营邱一派，非家山也。"是此图在明时已流传。观赵肃题，为元人书法无疑，惟元晖自题"姚山秋霁"不类其笔，或为元初人仿作亦未可知。

宋　高宗书　马和之画　《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图　卷

绢本，画墨笔，淡浅绛著色。此卷《大观录》、《墨缘汇观》著录。

宋　高宗书　马和之画　《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图　卷

绢本，画墨笔，淡浅绛著色。后有文徵明跋，谓作家士气兼备，

两卷均书画相间。载《石渠宝笈》。高宗书，严整秀润，出自黄庭经，在宋诸君书法中当以为冠。和之画山水勾法与人物开脸自成南宋一家。

宋 朱胜非 书札 册

共九开，有项子京收藏诸印。第一开，为胜非书，曾刻《玉虹堂法帖》，另一开下署款“何”、或系孙何，余人不详。

宋 吴琚 杂书诗 卷

所书诗句，或四句完整，或前后残缺。末押默庵印。后隔水曹溶跋谓为米书。另见吴书诗一册，诗亦多缺首尾，默庵印亦同。盖同时所书若干纸，为后人分装，遂不复合。默庵印应即吴氏自号印。吴氏学米书，殆可乱真。此卷尤得米书神髓，故曹溶直以为米书。然世传米书尚多，吴书却罕覯。

宋 杨婕妤 百花图 卷

绢本，著色。凡十七段。每段楷书标花名，并纪年题诗。前题识，“今上御制中殿生辰诗”，下注四月八日。第一段寿春花，下注己亥庚戌。第二段长春花，下注庚子甲辰乙未。第三段荷花，下注辛丑癸卯丁未。第四段西施莲，下注丁未。第五段兰，下注壬寅。第六段望仙花，下注乙巳。第七段蜀葵，下注丙午。第八段黄蜀葵，下注己酉。第九段胡蜀葵，下注辛亥。第十段阇提花，下注戊申。第十一段玉李花，下注乙卯。第十二段槐，上注壬子。第十三段三星在天，上注癸丑。第十四段旭日初升，上注丙辰。第十五段桃实荷花，上注丁巳。第十六段海水，上注戊午。第十七段瑞芝，上注庚申。画极娟秀鲜丽，书宗晋唐，颇似宋高宗体。后明藩三城王跋，谓得于吴中好事家，今逢唐贤妃千秋令节，敬献以祝无疆之寿云。妹子为宋宁宗皇后妹。凡御府马远画多命题咏，有题马远“松院鸣琴诉衷情”一词。昔见马远山水小卷有妹子题。又马远山水图为妹子题，下钤杨娃小长方章，然

其画殊未见明清书画著录，亦未载其画。唐宋以来女子画此卷为孤本矣。

宋　赵伯骕　仙峤白云图　卷

绢本，青绿著色。楼观人物，山峤云海，极纤细工秀。题伯骕小字款。是卷载《西清札记》，但余断为南宋匠画，而后人题伯骕款跋与印章，亦似为元人一手所为者。

元　赵孟坚　画水仙自书诗　卷

纸本。画白描水仙二本，后自书诗，皆感念故国之作，字大径寸，坚劲方整，想见其风节。书诗曾刻海珊仙馆法帖，为端方旧藏。

元　钱选　山居图　卷

纸本，青绿金碧，丹粉著色。笔法唐人而极饶逸韵，用墨设色赵子昂亦未之或先。钱进士《山居图》曾见两卷，一卷为过云楼顾氏藏，为孙退谷《消夏记》所著者，是卷为高士奇《江村消夏录》所著者，后有纪仪、纪堂两跋。

元　赵孟頫　章草千字文　卷

是卷《墨缘汇观》著录。笔力沉厚，有章草意，为子昂晚年之迹，赵书之精者。后柳贯大草书跋，亦具飞舞之姿。

元　赵孟頫　篆书千字文　卷

元内府金花阑，绢本。小篆，字极精工。后明陈沂跋，清乾隆书引首，卷前乾隆标题“子昂法书，天下第一”。后隔水附高士奇题签。

元　赵孟頫　小楷妙法莲华经　卷

书宗黄庭经，极精工，亦赵书有名之迹，为清内府旧藏。

元　赵孟頫　倪瓒　兰竹　合卷

纸本，墨笔。子昂写兰石，旁有嫩竹一枝，自题款。云林写竹梢一枝，细如丛苇，自题诗。前后有句曲外史、项子京、安仪周、成亲王印，后有笪重光题诗、成亲王跋。　《书画鉴影》著录。

元　赵雍　王冕　朱德润　张观　方从义　合卷

纸本，墨笔。第一段，赵雍山水，自题款。第二段，王冕墨梅，自题诗，为《墨缘汇观》著录。第三段，朱德润山水，自题诗。第四段，张观山水，自题款。第五段，方从义山水。各段前后有沈石田、李日华、项子京、梁清标、安岐、张洽诸印，乾隆题诗。

元　方从义　云林钟秀图　卷

纸本，墨笔。全用水墨笔法，云气氤氲，峰峦屏列，兼师北苑南宫，为方壶晚年之笔。后沈石田跋，自称后学，谓将化而入神，必心与天游者始可诣此。《江村消夏录》著录。

元　颜辉　煮茶图　卷

纸本，白描，细笔。《陆羽煮茶图》，后藏经纸自书行草韩愈诗，题云："迩来阴湿，手腕作痛，不能为书，而漫峰特揭此篇，命予录之，强勉执笔，秋月识。"图与平常见颜辉画不同，亦无款识，只右上钤"秋月"小印，左下钤"颜辉之印"方印。予断为北宋人画，而为漫峰所藏者，倩辉为书昌黎诗，不然手腕作痛，强勉为行草书而何能作细笔画耶。至行草书一望而知为元代在野派之书法。又有人谓颜辉方印"辉"应作"晖"。按晖、辉、煇古为一字，后人分日光为晖，月光为辉，灯烛光为煇。晋顾恺之诗"秋月扬明辉"，则颜字秋月应从辉。然书"晖"或书"辉"皆非误。昔见唐伯虎行书诗卷，至精，惟扬州"扬"字书"杨"，有人谓伯虎不应误书，断为伪迹。其实非

误，扬者为杨，抑者为柳，扬杨本系一字。未学小学而论字，误以断名迹真伪，岂不甚谬。按是卷宝熙、袁励准等审定，清宫书画原稿下注上上，并注清字，殊为有见。

明　陈叔起　王绂　合画　潇湘秋意　卷

纸本，墨笔。前为陈画，自平沙落雁后为王画(见后黄思恭跋)。笔意静雅，如出一手。两名家合画一卷者殊不多见。是卷为清内府旧藏。

明　沈周　胡山春晓图　卷

纸本，墨笔。仿米山水卷，前下方钤“启南”一印，后无款识。另纸吴宽诗并题语，陈淳跋。按，世称细沈皆石田中年之笔，此卷正石田中年所作，房舍树木皆用细笔。画家往往在用功时自留稿，不以赠人，故多不署款识，然数百年后，却使鉴赏者颇费心力。此图用墨淡逸，尝见米友仁《云山图》亦同此笔意，则知米家泼墨法以平淡静逸胜，并非深涂浓染者也。卷为麓云楼寒木堂旧藏。

明　唐寅　孟蜀宫妓图　轴

绢本，着色。蜀主孟昶令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曰“醉妆”。此写其图。绢素洁白，气色鲜妍，人面傅粉用唐三白法。右上首自题诗并题语，书画俱为精绝。《墨缘汇观》著录。此图曾见改七芗有一摹本。

明　唐寅　山水　轴

纸本，墨笔。山石以淡墨皴染，不加苔点，竹树房屋，人物舟船，均极精细。右上款识题云“晋昌唐寅画。似从汉老兄清玩”。钤“唐伯虎”方印、“南京解元”长方印。为商邱宋荦旧藏。

明　文徵明　三友图　卷

纸本，墨笔。墨兰、墨菊、墨竹共三段。每段自题诗。载《石渠宝笈》。

明　文徵明　桃源别境图　卷

纸本，着色。山峦层叠，石桥长溪，桃花满树，间以青松翠柳，竹篱茅舍，人家邻比，鸡犬相闻，足称世外别境。后小楷书桃源行。定王府旧藏，内府所赐。《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

明　文徵明　人日草堂诗画　卷

纸本，墨笔。小卷后另纸自书人日诗。朱存理、钱同爱、陈淳、陈津、邢参、朱正书和诗。彭文嘉、王世懋、王世贞、莫云卿、文震孟跋。为衡山一时兴会之作。清宫旧藏。

明　文徵明　闽荔吴栽图　卷

绢本，着色。写折枝荔枝，颜色鲜艳，小楷自题款。前引首徐霖篆书。后纸行草自书和沈石田诗并序。

明　林良　枯木寒鸦图　轴

绢本，墨笔。写竹石枯木，上栖寒鸦六七，瞑目冻缩。笔法遒劲生动，若有寒风萧瑟之意。下款署林良。

明　李东阳　自书诗　卷

行草书。载高士奇《秘录》。

明　顾璘　书　卷

行书。载高士奇《秘录》。

明　王宠　书　卷

藏经纸，行书。

明　王谷祥　写生　卷

纸本，着色。写桃花柳枝，燕子萱草，石榴绶带，蜜蜂残荷，蓼花水雀，蝴蝶梅花，竹枝麻雀，各有乾隆题诗。载《石渠宝笈》续编。

明　项元汴　书千字文　卷

行楷书。载高士奇《秘录》。

明　项元汴　桂枝香橼图　轴

纸本，墨笔。上自题诗，右下角署“皋谟鉴赏”小字，钤“项氏懋功”印。子京画最少见，是轴为麓云楼旧藏。

明　周天球　兰竹　卷

纸本，墨笔。清宫旧藏。

明　董其昌　疏林远山图　卷

纸本，墨笔。署款思翁并题语。引首乾隆书“虚明向远开”五字，卷中并题诗。

明　董其昌　春山欲雨图　卷

绢本，墨笔。上署款并题诗云：“七十二高峰，微茫或见之，南宫与北苑，都在卷帘时。”另纸李复堂跋，谓有书卷气，又有笔法，春山欲雨，至今墨气未干。后又有一跋，文虽尽而失款，当系后纸脱落。按，是卷为玄宰六十一岁时所作。玄宰在当时欲执艺苑牛耳，于书画必刻意求好，以折服他人。比至晚年，功竟名归，遂由绚烂而入于平淡。或有谓玄宰非晚年画体皆为赵左代笔，亦不尽然。此卷虽有

笔有墨，尚有迹象可寻，其题诗亦系其自鸣得意语，正是其刻意求好之作，似非赵左所代者。

明　董其昌　书画　卷

绢本，墨笔。前行草书论书画笔墨。款“董其昌书于吴门道中”，后画山水，无款识。此卷笔意苍老，墨气醇古，一望而知为玄宰晚年之迹。

明　陈继儒　雨过云过图　轴

绢本，墨笔。右上自题六言诗，有“雨过石分五色，云过山余数层”语，故名《雨过云过图》，笔墨极近董玄宰晚年之作。《书画鉴影》著录。

明　文彭　自书诗　册

草书七古诗花下吟。后小楷书款识。

明　李流芳　溪山秋霭图　卷

清　戴熙　临李流芳溪山秋霭图　卷

纸本，墨笔。两卷画境并不全似。李卷以林木胜，戴卷以石胜，戴盖临其意也。戴卷亦署款“溪山秋霭　李流芳”。后纸戴自题识。

明　周之冕　百花图　卷

纸本，墨笔。写牡丹至梅花三十种，自题款。张凤翼、王稚登、陈继儒、文葆光、杜大绶、文震孟、钱允治、陈元素各间题五七言诗。又每种有乾隆题诗，为恭亲王邸藏，盖受赐于内府者。

明　周之冕　芭蕉竹石　轴

纸本，墨笔，大幅。气魄雄厚，极见笔力。纸地稍剥落。

明　丁云鹏　佛像　轴

纸本，设色。画一苦行释迦，坐蒲团上。背景青绿山岩，老松一株，颇古拙。

明　陈裸　山水　轴

纸本，设色。上乾隆题诗。

明　来复　草书

纸本，大字草书，七言诗一首，下来复二字款。

明　郭振明　书　轴

纸本。行书五律一首，诗云："把臂栖迟地，悠然岁暮心。江云愁旅雁，庭树乱春阴。生计存吾拙，交情觅汝深。醉来看宝剑，莫遣夜光沉。"款署"郭振明"。按，郭振明见《明史·阉党·阎鸣泰传》博平侯太师，曾为魏忠贤建生祠于都督府锦衣卫。

明　项圣谟　花卉　册

纸本，没骨，设色，共十页。为梅花、千叶、桃花、兰蕙、海棠、梨花、石榴、蒲公英、荷花、菊花、莲房藕节。每页有汪家珍题诗及自题款。诗后款识为"壬辰八月十有二日写生"。是册笔法生动，设色浑厚，气韵功力俱到，为寒木堂旧藏。

明　程正揆　江山卧游图　卷

纸本，浅绛着色。款署"第一百十八，时辛丑十月，揆"。

明　叶欣　梅花流泉图　卷

纸本，浅绛着色。后有万寿祺跋。

明　薛素素　墨兰　轴

绢本。上楷书幽兰赋，下写兰蕙一丛，书画均极静雅。款署“薛氏素君”。

清　释道济　竹石　轴

纸本，墨笔。高凤翰左手草书跋云：“苦瓜画竹才数尺耳，而有千尺之势。”

清　王铎　书　轴

绫本。草书杜诗。

清　龚鼎孳　自书诗　轴

绫本。行书五律寄怀颙若诗。

清　顾眉　兰石　轴

绫本，墨笔。右上龚鼎孳题“丁亥季夏属闺人写似愚公年社翁正。”左下款署“顾氏横波写。”

清　查士标　山水　轴

纸本，浅绛，设色。自题诗云：“远水兼天净，疏林映日明。渔舟随去住，恰趁晚潮平。”款署“梅壑道人士标”。

清　吴历　兴福庵感旧图　卷

绢本，青绿设色。起首远山一角，间以白云，红墙曲折，半露殿宇，老松一株，上栖仙鹤，群鸦翔集于墙头。中段寒林萧瑟，细草披离，坡石作浓翠色。老竹两丛，重墨写之，笼以深青。结尾勾云，衬以赭色，绚丽之中具荒凉、岑寂之致，为墨井悼其方外友默容禅师之作。左上自识与默容交谊始末，缀以五律二首。末题岁月名款。此卷

为墨井四十三岁笔，正中年，画境入妙时，与《雪山图》并为杨荫北所藏，皆称精绝之作。 《雪山图》已落水损毁。

清　樊圻　柳村渔乐图　卷

绢本，着色。仿宋人笔法。垂柳多株，染以重草绿，人物精细。卷中，梁清标、顾贞观、吴农祥、沈胤范题词，周斯盛，陈僖题诗。卷前纸曹溶题诗，卷后纸顾豹文、王士禄、王士禛、曹尔堪、严我斯、汪懋麟、徐釚、韩魏、赵进美、高珩、唐梦赍、吴榷等题诗词。是卷为溥心畬旧藏。

清　王翚　观梅图　卷

纸本，淡浅绛着色，短卷。自题款识，为石谷老年之作，有元人意韵，与其寻常笔墨不同。清宫旧藏。

清　王翚　山水　轴

纸本，墨笔。上王鉴题，极致推奖，为石谷中年正师事烟客、元照时之作，非有款识则几疑为元照之笔。石谷此种画颇少见。

清　王翚　雪景山水　轴

纸本，墨笔。微有施淡花青赭石处。上有陆鸿仪、张远二题，年月署“辛酉腊月”，为石谷五十岁之作，已由元照笔意趋其晚年面目，于此幅可见石谷画法之递变。

清　王翚　山水　卷

绢本，青绿着色，长卷。为石谷本来面目。山石竹树，云水泉瀑，城郭村舍，行旅耕渔俱备，堪为学画者法度。

清　梅清　山水　轴

纸本，墨笔。石岩上松一株，姿势妖娇，盖写黄山之松。

清　陈鹄　紫云出浴图　卷

纸本，着色。像可三寸许，着水碧衫，支颐坐石上，右置洞箫一。发鬖鬖然，脸际轻红，凝睇若有所思。卷中及卷后题咏自张纲孙、陈维岳、吴兆宽、冒襄、王士禄、王士禛、崔华、尤侗、毛奇龄、宋荦等七十四人，诗一百五十三首，词一首。清末以后题者不计。是图盖写陈其年眷冒辟疆家伶徐九青故事之一，在当时已脍炙人口。雍正间图为吴青原所得。乾隆间有一摹本，为罗两峰画，陈曼生手录题咏。清末，是图归端方。摹本迄未发现。

清　禹之鼎　纳兰性德侍卫小像　轴

纸本，着色。侍卫官服纬帽，面容清瘦，微有须，坐方床上，持茗碗，左置一几，几上胆瓶内插荷花一枝。左上严绳孙题诗。此图与侍卫双凤砚并为三六桥旧藏。左右绫边。三六桥、傅岳芬及予皆题《金缕曲》词。

清　黄瓒　张淑　禹之鼎　沈宗敬　陆漻　戴本孝　严绳孙　恽寿平　程义　楝亭图　卷

纸本，图着色，墨笔。共十幅。盖曹完璧官江宁织造，曾于署中亭畔手植楝树一株。没后，子寅官苏州织造，再官江宁织造，楝树犹存，因为楝亭图咏，以追怀先德。于此图咏亦可探索红楼梦影射之人物。共四卷。第一卷，一图黄瓒，二图张淑，三图禹之鼎，并自题诗。卷后题咏者成德、顾贞观、潘江、吴暻、王方岐、唐孙华、陈恭尹、吴文源、方仲舒、顾彩、张渊懿、方嵩年、林子卿、袁瑝。第二卷，四图沈宗敬，五图陆漻，张景伊题诗，六图戴本孝，并自题诗。卷后题咏者姜宸英、毛奇龄、张芳、杜浚、余怀、梁佩兰、秦松龄、严绳孙、金依尧、王丹林、顾图河、姚廷恺、吴农祥、费文伟、王霨。第三卷，七图严绳孙，八图恽寿平，九图程义，并自题诗。卷后题咏者

何炯、徐乾学、韩菼、徐秉义、尤侗、杨雍建、王鸿绪、宋荦、王士禛。第四卷，十图禹之鼎，并自题诗。卷后题咏者，尤侗、徐林鸿、冯经世、田时发、邵陵、许孙蔨、潘炳义、石经。

清　恽寿平　山水　册

绢本，青绿，浅绛着色，墨笔。共八开。为南田早年之笔。山阴俞氏旧藏。

清　康熙　书　横幅

纸本。书“丛碧山房”四字。笔宗柳法。任邱博学鸿词庞垲号“丛碧”，此或赐庞氏者。为予收蓄书画之第一件，而予所居好植蕉竹花木，因自以为号。

清　康熙　书　横幅

描金黄蜡笺纸。书“嵩高峻极”四字。此为嵩山峻极宫匾额原本。

清　蒋廷锡　瑞蔬图　轴

绢本，着色，仿宋人笔，颜色鲜艳如生。为雍正三年十月，圆明园畦圃有莱菔一根，九枝，宣示绘图纪瑞。此为南沙画中之精品。

清　蒋廷锡　五清图　卷

绢本，墨笔，短卷。画牡丹、兰梅、松枝、竹枝。清宫旧藏。

清　蒋廷锡　写生　册

绢本，墨笔。写牡丹、月季、虞美人、丁香、荷花、剪秋罗、秋海棠、鸡冠、秋菊、凤仙、竹枝、子午莲、梅花、山茶。十二开，每开各有张照、励廷仪、王图炳、赵熊诏、薄海、陈邦彦、陈元龙题。

清　杨晋　兰竹　册

纸本，墨笔。为南皮张氏旧藏。

清　华嵒　山水　轴

绢本，青绿，没骨，着色。白云红树，悬瀑流水，宗法唐人而别具一格。新罗多画花鸟，青绿山水殊为罕见。为陈宝琛太傅旧藏。

清　邹一桂　芙蓉鹭鸶图　轴

纸本，着色。上有乾隆题诗。载《石渠宝笈》续编。

清　金农　梅花　册

纸本，墨笔。共十幅，每开自题。

清　郑燮　兰竹　册

纸本，墨笔。共八幅，每开自题诗。

清　郑燮　竹石　轴

纸本，墨笔。自题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清　乾隆　瓶梅　轴

纸本，着色，小幅。瓶插红梅一枝，自题诗并董浩、钱维城、张照题诗。

清　罗聘　竹　轴

纸本，墨笔。自题诗。

清　董邦达　山水　卷

纸本，墨笔。清宫旧藏。

清　金廷标　接梅图　轴

纸本，浅绛着色。清宫旧藏。

清　姚鼐　书　轴

纸本。行书。

清　永瑢　兰石　轴

纸本，墨笔。自题五律一首，另潘庭筠、张时风、程昌期、张埙、钱楷、唐瀛洲题诗。

清　毛上炱　灵岩读书图　卷

纸本。青绿山水，为毕沅画者。后有王文治、袁枚题。

清　江介　山茶雪竹图

纸本。着色，颇有逸致。

清　姚元之　秋葵　轴

纸本，着色。写折枝秋葵。

清　吴大澂　山居图　轴

纸本，墨笔。山水。

清　郑文焯　山水　轴

纸本，墨笔。款署“乙巳仲冬月，摹查二瞻小幅于延清小筑。鹤道人文悼。”

是录自壬申至己亥年写毕，其间重要之迹多半捐赠或让售于公家，虽属明日黄花，然于书画流传著录上亦可有此一录耳。

丛碧识

补　遗

隋人　写经　册

共六十二行，字势方整，存北朝笔意，而秀逸则又近隋唐之体。内“民”字不缺笔、避讳，当为隋人书。因非敦煌石室藏，故纸色稍黑暗。前后有蔡世松收藏印。后排正行次题不署名，另柬一纸云“六朝人书经谨奉还”等语。上款为“小石大兄”，应为义州李葆恂也。此册在敦煌石室藏经未发现前当为凤毛麟角矣。

宋人　楼阁图　轴

绢本，着色。图写楼阁台榭，宫墙高峻。墙外远山近树，楼旁垂柳湖石，人物凭栏望远，后张宫扇。楼阁及柳枝界线，人物衣纹，湖石钩勒，均极劲纤，的为南宋人画。惜绢地稍剥落。

元　赵孟頫　饮马图　卷

纸本，白描。《江村消夏录》著录云，神骏可观，起止无迹，即伯时当为之俯首也。后跋柯九思、宋濂、危素、刘基等二十四家。细审画不见精彩，跋极佳。然宋学士小楷书题于画之左方，当为元代墨迹无疑。岂子昂当时亦有晚辈代笔，否则当为酬应之作。

元　仇远　自书诗　卷

行书，七律十首。是卷《江村消夏录》、《石渠宝笈》二编著录。卷前纸末有“朱彝尊竹垞太史氏印”一。卷中纸尾有“毕秋帆书画记”一。另题跋后有“灵岩山人秘笈”之印、“毕泷鉴定”之印二。纸前下有“秋帆珍宝赏”印一。山村书颇少见，此卷书诗犹宋末体，颇与

张即之相近，而非为元一代赵孟频之一派。

明　杨廷和　书札　册

冷金笺纸。行草书，共八通，为致陕西巡抚蓝章者，多言蜀寇事，正其继李东阳为首辅时所书。书法矫健流畅，极具风度。此册为即墨蓝氏子孙保存至今者。

明　文徵明　双钩兰花　卷

纸本，墨笔，白描，双钩。花叶纷披，纤雅淡逸，风致潇洒，间以草石荆棘。前自题款识云“嘉靖甲午秋七月六日与子朗民望游虎丘，寺僧出纸索画，草草写此以应其请。徵明。”下钤“文印徵明”、“衡山”二印。卷后钦“停云”一印。另纸有文嘉、张凤翼、汪显节跋，后有高士奇题。此卷为洪洞董氏藏，为待诏写兰之精品。

明　谢时臣　山水　轴

纸本，墨笔，微浅绛著色。岩峦重叠，林木葱蔚，云气微以淡赭勾之，极氤氲苍莽之致。

明　董其昌　翠岫丹枫图　轴

纸本，没骨，青绿着色。下写房舍、竹树、坡石。竹树以花青点染，间以丹枫一株。隔岸山峦重叠，以赭石烘云，山石设色鲜妍。右上自题为“庶常时曾见张僧繇翠岫丹枫图致佳，忽忽已二十年，至今尚未去怀。今春为陈征君作此，尚未惬意，因忆向所见者仿佛摹此，虽不能追踪晋唐，亦不落赵吴兴后”等语。左上陈眉公题云：“予得宗伯画多矣，然以此图为苕帚庵中第一，因识其首。”右上题后又题云：“此余昔年为仲醇作也，用笔设色差强人意。若曰为苕帚庵中第一图，则吾岂敢。思翁重题”。按《明史》本传，玄宰万历十七年举进士，改庶吉士。此图当为玄宰五十五岁后二三年所作。右上自题书

体与题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字极相似。后晚岁重题，字体则稍异矣。此图以秀逸胜，为赵吴兴一派。南浔庞虚斋旧藏。

明　唐泰　山水　轴

绢本，墨笔。层嶂远帆，水亭奇石，笔意超脱。淡远担当和尚与八大清湘同为明代遗民，而其墨迹绝少见，盖居穷边深山，不接于土夫，遗迹世遂少留传耳。上自题诗云："烟云变幻本无形，墨汁模糊近水亭。空道斯名画可隐，转教众口说丹青。"款署"大来"，下钤阴文"唐泰""大来"方印二，字飘逸有姿。

明　曾鲸　画侯朝宗像秋江钓艇　轴

绢本，着色。图写长江茫茫，远山一线，近岸芙蓉芦荻，江中一扁舟，长须奴拨棹，壮悔儒服乌巾，倚钓竿，抚长剑，年少翩翩。右下隶书小字题识云："崇祯乙亥九月望后六日，为朝宗社兄写秋江钓艇图，闽中曾鲸。"左下有宋牧仲印二。左右绫边。王锡振、姚辉第题"摸鱼儿"词。

明　杨文骢　山水　卷

纸本，墨笔多用焦墨，不似平常所见龙友笔，然的为明末清初画，非后人所仿者。

明　八大山人　荷花　轴

纸本，墨笔。写藕一节，荷叶一茎，荷花一枝，古拙潇洒。款署"八大山人"。

清　王铎　山水　轴

粉笺，纸本，墨笔。山峦、林木、人物，笔意古拙，是以书法作画。右上题"岩荦戴先生道宗弟王铎"。字亦极古雅，有唐宋人意。

清　马雄镇　汇草辨疑　册

纸本。共十二册。雄镇官广西巡抚，吴三桂叛清，全家殉难。始三桂欲雄镇降，囚土室四年，作《汇草辨疑》十二卷，妾顾荃芬若按字为旁训，后顾氏亦死，蒋心余为作桂林霜传奇释帖一折，即本顾氏事也。册中旁注小楷真书即顾氏笔。

清　沈宗敬　山水　轴

纸本，墨笔。远峦重，长松悬瀑。右上自题款识云："康熙丙戌新秋，偶写元人笔意于秦，望山庄之话雨轩，时同观者杜子园蕠，琴僧锄云，狮峰居士沈宗敬识"。

清人　宫妃像　轴

绢本，设色。写宫妃搴帷立，手持团扇，鬓插兰花一朵，貌秀美绝伦，汉人而旗装，用色鲜妍，衣折仍用西法。团扇上画兰蕙一枝，极似乾隆笔，或为希旨故学乾隆笔意者。此幅为热河行宫物，为毅军将领米振标驻军热河时所劫出。于此图亦可索证清宫闱之秘史。惟下宋体字郎世宁款系不解事者伪书。假使为汉人宫妃像，臣工绝不敢书款，而郎世宁画凡款书宋体字皆伪作也。

清　汪士慎　梅花　册

纸本，八开。写白梅、红梅、绿梅、墨梅，每开自题诗句，书画并透逸有韵。后曾熙致蒋孟苹信二纸云，�庵弟来书称，汪巢林梅花册，其夫人曾临数叶，并未临成，闻已售出，不无怅怅，筠弟平日不敢触其夫人意，因备上前代垫之款，志在反璧归赵等语。此亦应为巢林梅花之一段小故事。

清　黄易　山水　册

纸本，墨笔，小册，共十二开。笔墨淡逸雅致，无款识。末开钤“易”字一小印，后有阮元一跋，谓为友益斋所赠，盖小松暇时戏笔留作传家粉本者。款书“阮元识于长沙节院”。

清　陶润山　万横香雪　顾莼写雪赋　卷

纸本，浅绛着色。图写雪后邓尉探梅。右上题“万横香雪。道光丁亥涂月大雪，连朝闭户不出，戏用文衡山笔意写成此卷，遥思邓尉，山中春信传芳，未识何如耳”。润山后洒金月白笺，顾南雅楷书雪赋。前引首叶道芬隶书“梅雪双清”，后庆善王汝玉题诗及跋语。

清　吴昌硕　自书诗梅花　轴

乾隆粉笺，未裁，对联。上联隶体行书，诗云“茅亭势揖人，顽石默不语。风吹梅树华，著衣幻作雨。池上鹤梳翎，寒烟白缕缕。”款题“又一村看梅，辅之老兄两正，庚申四月吴昌硕年七十七”。下联写红梅枝干遒劲，花朵秾肥。又题诗云：“华明晚霞烘，干老生铁铸。岁寒有同心，空山赤松树。”款题“灌佛日老缶又画”。此幅丁辅之曾为影印。缶翁以篆隶书法作画，上自金冬心、陈玉几、陈曼生、姚元之、吴让之、赵抝叔，下至齐白石，在画史中均应称为碑派画家，而缶翁则承先启后者也。

上补遗于庚子岁写毕，至清末书画著录，宋元团扇，明清便面，皆属册类，对联则多不录。余所收便面、对联是录亦不另列入。

从碧识